

《赛金花》余谈

编者先生：

你出的题目太难了，本来就不敢写，今天看了高尔基的《论戏曲的创作方法》，使我更加不敢写了，那论文里面有下记的一段：

残念的是在我们周围，下面所说一般的事情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就是，写了一两篇戏曲的年轻人，就将自己看作“此道的专家”，很快的在报纸上写文章，演讲，讲述自己的创作方法之类，有时候甚至还要写什么《戏曲理论》。……

高尔基很谦逊地说，“我自己不仅写过两篇、五篇，大致曾经写过二十篇拙劣的剧本”，但是他还并不以一个戏剧作家而是以一个“一般文学和剧场观客的立场”，对年轻的作家讲话。那么，很明白，编者先生，像我这样只写了一篇拙劣的剧本的人，对于您的“征文”，还能写些什么？

至于您所说的“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态度”，那是我在别一个机会已经犯过一次“不逊”了：“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刺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隶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一点也不愿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

的确，这剧本的女主人公历来就被人描写做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一切赛金花的传记作者，都将她写成一个逾越常轨的淫娃荡妇，和“一泓祸水”，这差不多已经是“定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相信我同情她的理由的正当。过去批评她的根据，不外是下列的三点：第一，责备她不替洪状元守寡，“主人”死后有了“不检”的行为；第二，责备她不该奇装异服，在京畿招摇过市；第三，责备她不该“夜事夷寝”，“秽乱宫禁”，伤害了华国的尊严。其实，第一第二两点，都是封建士大夫见解，到现在已经不值一笑；第三点她虽则有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护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可笑的举动。当时名小说家吴趼人的《赛金花传》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里面，的确是“颇有贬辞”，可是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贬辞”，难道我们也有“祖述”的必要吗？

也许可以说，赛金花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不仅在妓女里面，就是在清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这决不是“誉辞”，从下面的一二片段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例如：詹堉著的《花史》里面，讲到庚子事变的时候，他说：

文忠（李鸿章）与诸大臣惶迫无能为计，有谓傅（玉莲，即赛金花）能办此者，乃

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瓦帅欣然曰：“诺”。即日宫禁肃清。文忠喜，酬金，不受，以所被华服饰赠之，亦弗受。无何，车驾回都。……

同时，有清一代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也有下述的一段：

苏（按指苏元春）下刑部狱，狱卒乃以杖毙沈荃（革命党人）之处居之，苏见地上血迹斑斓，大为骇异，询知其故，因以银三百两贿狱卒，使迁焉。其后狱卒以待苏元春之法待赛金花，金花毅然曰：“沈老爷我是认得的，为什么要怕他？”狱卒无如何也。夫赛金花一贱妓也，而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段事实在铁屑所编《中国大运动家沈荃》中也是一样：

狱卒牵苏元春入，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放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再按刘半农所编《赛金花本事》“所述金同”，（虽则将沈荃误作沈进），可知这并不是捏造的事实。那么，和那“久历戎行”的大将，中法战争中丧师辱国的苏元春比较一下，赛金花对于当时还是地下党的革命党有了如何的观感，单在这一小事里面也可以概见的了。

赛金花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以我就借用了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当时的庙堂人物，说同情，就在这么一点。

大热天，一时想不起要讲的话了。收到这封信，您也许要失望的，因为您所得知的并不是有意义的文，而只是没意思的信了。

匆匆即祝

编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
（原载《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包身工》余话

在我写《包身工》的时候，曾经替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和给了我许多便利的冯先生，托人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接到这信就连忙赶去，这样，我们就在她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见面了。

叫她冯先生，就好像她已经上了年纪，其实她还只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本来她是沪西某大学的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把学业丢了，现在日间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还在青年会办的工人补习夜校里担任功课。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做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拿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她将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来客，自己拘谨地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阳。

和她并坐着的还有一个补习夜校的学生，在东洋纱厂做工的杏弟。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临时事态的才干。她带着我和她十五岁的妹妹，怀着一点危惧的心情，去“视察”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时候，我们事先并不曾约好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一跨进她所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她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一般地指着她嫡亲的妹妹对那老板娘讲了：

“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指着我说）这是她的‘爷叔’^①，在水电公司办理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没有觉得意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爷叔”的我却掩饰不住有些窘态了。

“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她继续说，回头对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对那老板娘敷衍几句。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但是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面，她的那种丰富的创造能力，却又毫无形迹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单纯的个性里面去了。

“轮着夜班？”我说。

她带笑地点了点头，拆开了方才捏在手里的一個报纸的包卷。

“上次你托我问的，只有十一份，许多人不肯讲。”

冯先生在旁边带笑地替她补充：

“她还垫了本呢，有许多是用‘粢米饭’^②请了客才讲的。”

我想起了这是四个月前为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托她搜集的资料。当时在杂谈中随便地对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说，到了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搜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望着写在水渍了的拍纸簿上的那些小学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骤然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对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地难受起来。

我一张张地翻看下去：

^① 即叔叔。

^② 糯米饭。

陈××，粗纱间，十七岁，泰州，（已做）一年三个月，（父亲）当兵，（包身钱）不知，（作主）叔叔。

明××，粗纱间，十六岁，泰州，（已做）八个月，（父亲）种田，（包身钱）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脚气）很厉害。

蔡××子，筒子间，十七岁，镇江，（已做）两年，（父亲）不知，从小做童养媳，（包身钱）不知，（作主）公公。

陈××，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钢丝车间，十八岁，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陈××，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

（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

我叹了口气说：“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样。”

杏弟将上半身靠近一点，指着最后的两行说：

“还有两个绍兴帮，待遇比江北帮好一点。”这两份是：寿××，粗纱间，十八岁，新昌，（已做）一年六个月，（父亲）在杭州做工，（包身钱）五十元，父亲作主。

李××，粗纱间，十七岁，盛元（嵊县之误），（已做）两年，（父亲）种田，（包身钱）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满。

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数是新昌、嵊县，间或也有萧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这个例子一样，除出和江北帮一样地“一次包绝”之外，还有包做几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过据我调查，能够有李××一般待遇的，还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领人”当时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满三年，“工作巴结”，才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块钱左右的“节赏”。不过绍兴帮因为人数不多，最大的包工头也只带这么三五十个工人，所以管理和待遇上也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度”的残余。她们每天两饭一粥，中饭也像“外头工人”一样地自己带进厂去。当然，除出这一点尽少的——但是足够使江北帮羡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压迫和虐使，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了。

我感谢了她的帮助，将这些纸片收拾起来，随便地问：

“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们厂里有什么反响吗？”

杏弟和冯先生差不多同时地摇了摇头。杏弟抢着说：

“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里面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地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

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

“奖赏什么？加工钱？”

“哪有这样好！生活巴结的车间给一张‘名誉奖状’，一个钱也不值。”说着禁不住苦笑了。

“在补习班，为了报上登的这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关心。”冯先生递给我一张团得很皱的小报，继续着说：“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这消息看到了吗？”

四条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视线，集注在我的身上。

那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立报》，内容是一个读者寄给编者的一段报告：

××先生：

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想定是新闻记者所不会记录的，因为这事既无关风化，其主角儿又不薄具姿色，也许就只等于人们任意扑灭的一只小虫，能引起谁的注意呢？然而，事情是极其平凡，却也是极其惨痛。今天早晨没有事体，走进某法院去旁听，头一起案子问过以后，第二次提上来的是一个乡村打扮的姑娘，听了捕房律师报告，知道她以前是杨树浦一家纱厂的女工。被她包饭（即包身）的老板告了，说她五月八日离开杨树浦的时候，偷了他一副金耳环，两件衣服，在捕房调查时并没有得着什么证据，但因他将她告了，终于是由包打听在曹家渡将她捉来受审。

在推事数问数答的当中，知道她跑的原因是五月里眼睛被打肿了，厂方要她请假，包饭的老板娘却不答应。打是经常有的，每月作的钱交给老板，作得少了挨打；病了说是懒惰，也要挨打；而这次打却是因为老板要同她轧姘头，她不愿意。当她满口操着泰州话急遽而哽咽地苦诉着的时候，并出示两踝腐烂过的伤痕的遗迹。

整个法庭的人们目光都注射在老板的身上，推事也转过脸来问他，她是否就是他的“包身工”。他却嚅嚅地加以否认，可是他承认吃住都在他家里，作了的钱也承认归他。

他还异想天开，请了律师向她提起附带民诉，因为捕房律师在最后陈述的时候，已说到证据薄弱，那律师似不好意思说到赔偿的话，只是说：“她走了之后她父母问老板要人，纵然判决无罪，也要请对她的身体加以处分。”

判决是无罪，并且即行开释。先生：就只这样，她已受到这人世的欺负太多了。许多有着权势的人合起来欺负她一个，这是世界吗？上海是不知有几千几万这样的包身工。更不知是暗地里排演了多少人世的惨剧。然而，人们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却不曾——也不愿去看挂在那里活尸眼角上的泪珠，更少有人想到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下略）

白水

“这是你们厂里面的人吗？”我问杏弟。

她摇了摇头。冯先生说：“她们花了几天气也找不出这个人的所在，有人说是同兴的，但是去问了也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样的人多着呢！……我在上夜课的时候将这件事告诉了她们，很多人对于律师的请求法庭‘处分她的身体’这一点发生了疑问，……”她用手指指出了报纸上的那一句话，声音渐渐地兴奋起来，“从今年起，报上说，不是买卖丫头也算是犯罪了吗？那么包身工……”

“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得很，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坏了的时候，东洋人常常不准她们工作，没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还算‘大本事’呢。”杏弟补充着说。

我知道了她们约我来商量的来意了，于是我问：

“这问题我可以去请教熟识的律师，可是，即使这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为‘公开之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多吗？”

“不！”杏弟很快地说，“要是真的是犯法，那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她们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时候自会到巡捕房里去告的！”

“那不是跟报上编者先生所说的话一样吗？即使‘法庭判她无罪，当庭开释，恢复了她的自由，可是进一步想，她的前途不是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么？’”

“那总比现在好啊，即使在街上讨饭，……她们饿着肚子或者害着病赶生活的时候，真的在羡慕讨饭的呢！”冯先生提醒她一般地说，多少带着一些讲堂里授课的姿势：“可是你跟她们说话要当心，要是带工老板知道了这是你教给她们的聪明，恐怕……”

“我不怕，顶多杨树浦不做，到沪西去做也可以。”说着，她也禁不住笑了，在她，好像沪西是另一个天地了。这种毫不计及自己利害的精神，深切地使我感到了惭愧。谁说世界上没有同情？真真的人和人的阶级感情就存在在这种连自己的衣食也照顾不到的人们的心里！

第二天下午，我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和一位以道义和刚直著名的郑律师谈话。

我将“包身工”的情形概略地告诉了他，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

“真有这样的事吗？”

“岂止有，多着呢，上海就有几千几万！”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叹地说，“假使她们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状况和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地是构成犯罪的！”从桌上取过一本袖珍的六法全书，指着其中的一条说：“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这样的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条：‘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照你所报告的那种工房里的‘包身工’生活，简直是‘奴隶’生活，即使退一步讲，总也可以说是‘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吧。很明白，带工老板这样的奴役工人渔利是一种非法行为。”

“方才说包身制不合法，那么带工头到乡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长们订立的包身契约可以‘自由废弃’吗？”我问。

“当然，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第四章对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这儿所说的善良风俗，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做‘有背于善良风俗’，所以这种契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的犯罪。

我可以诚实地告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所谓法律的“功用”！可是这制定得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果真能够有效地保护那千万无告的奴隶吗？我不能不进一步地追问了：

“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的了？”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

他沉吟了许久，慢慢地说：

“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这样的事不违背工厂法吗？”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工厂法主要的对象是劳资的纠纷，所以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书，“‘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

方才感到的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像轻烟一样地消失了。天哪，到任便什么工厂里去看一看，照现行的法律讲，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不是太多了吗？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然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代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

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上海屋檐下》自序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大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几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着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六月底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卢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戏剧时代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版。）

《上海屋檐下》后记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丹（匡复）、赵慧深（彩玉）、陶金（林志成）、王为一（赵振宇）、章曼苹（赵妻）、叶露茜（施小宝）、施超（小天津）。

但是，这出戏当时没有能够在上海演出。

因为，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排，预定十五日上演。而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打响了。

为此，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忘掉这个剧本，忘掉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情调，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因此，这个戏以后的命运，我一直没有关心。我重新翻阅这个剧本是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一个我的剧本选集，由于几位对这个戏有感情的朋友们的怂恿，我把这个剧本收进去了。后来，出版社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写儿女情的剧本在新时代没有教育意义，主张从选集中抽掉，我没有话说，就同意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剧本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其它两个剧院“发掘”出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戏已经排了两幕。我想，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已经在白纸上用黑字写下来的作品，要藏拙、要抹掉，恐怕也是不可能了。而且，让新时代的青年人知道一点旧时代的辛酸和苦难，也不是有害无益的事吧，我点了头，这个戏在北京上演了。关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对剧中人的看法，在演出前我曾和“青艺”的演员同志们谈过。谈话记录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剧本》月刊上，在这里不赘述了。我要说明一点，第三幕结尾时小孩们唱的一个歌，是施谊同志作的词，“青艺”说明书上没有注出，我不敢掠美。新版本基本上没有改，我只删掉了几句话，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

谢谢关心和辛苦地演出了这个习作的朋友，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了这个戏的上演，无疑的，演出给这个习作增加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五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版。）

关于《一年间》

为着替《救亡日报》筹募基金，在桂林上演拙作《一年间》，已经有了四个月的筹备了，承文化界先进的支持，和差不多可以说是全桂林艺术界的朋友们的不眠不休的努力，终于在今天和观众在舞台上相见。启幕之前，我感到了双重的惶悚和感谢，作为一个这剧本的作者，和作为一个《救亡日报》的编者。逾分地重视这一草率的作品使我惶悚，为着要上演这一作品而耗费了朋友们的不能计算的精力和时间，又使我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语汇才可以表示私衷的感谢。这感谢的今天，在我的生涯中将成为永远不会遗忘的一日。

《一年间》在重庆公演之后，最使我不安的是远近友人们对于剧作的逾分的誉扬，和过于宽容的指责。这剧本写作于去年九月，未曾付印，广州就沦陷了。嗣后奔波了差近一年，正像对一个产下了就给交旁人的孩子，直到重庆上演之前，我简直不曾有过再看它一遍的机会。上演之后，从友人们的来信和报章评论中，发见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也因为人事匆匆，到今天不曾有过仔细检讨一下的时间的余裕。那么就让我利用今天，作为一个陈述作者意见和自我批判的机会吧。

写作的动机

去年八月，在“救报”周年纪念招待读者的茶会上，有一位年轻的读者站起来讲话，他说：“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他用“吝啬”这两个字来责难了我一年来写作上的“怠慢”。这句话真有点使我憬然！《上海屋檐下》以来，不写创作一年半了。我自觉到“工作繁忙”这四个字并不是辩解的最好借口，我答应了他，我在最短时期之内一定写一些剧本。接着九月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了以双十节为中国第一次戏剧节。田寿昌兄从武汉打电报来，要我转达广州戏剧界的朋友，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公演。可是，当我把这意思告诉给戏剧界朋友们的时候，一个问题立刻提出来了：“你给我们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

我答应了这个要求，因为我知道在我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只有若干冒险地将负不起的责任先加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逼榨出写作的时间。

“什么时间交卷？”我问。

“预算排三个礼拜，你在九月二十号以前交稿吧。”

我还记得和我约定时间的是艺协剧团的蔡碧青君。

算一算日子也正还有三个礼拜，我决定了分出每天上午的时间，第一个星期整理材料和结构，第二周的第一天开始执笔，写作的时间规定了两个星期的上午。这在我确是一次冒险，我从这天起谢绝了来客，把自己反锁在上九东路那间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洋铁店的三楼。九月十九日，在预算之前一天，我草率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在我贫弱的写作过程上这是一个时间最短的记录：《赛金花》两个半月，《自由魂》一个月零五天，《上海屋檐下》整整六个月，而《一年间》却只有十二个上午，从这一点，剧作的粗杂疏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今年初夏偶到了上海，许多久别了的朋友们都像遇见了自己亲人一般会到了。在一次茶话会散会之后，我和健吾、于伶两兄在傍晚的霞飞路上漫步，突然，健吾笑着说：“我提你一个漏洞，在《一年间》

里。”

我倾听着他。

“究竟你离开上海一年半了，第四幕，艾珍要分娩是在晚间十二点钟之后，那时候喻志华从外面回来，接着又匆匆地出去，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上海十二点钟以后是禁止通行的了。”

结构方面的粗忽尚且如此，性格的刻画和氛围的描写上更可以想象的了。

我这样看那些人

写这剧本的时候，如上所说，正在徐州失守，敌人以全力进攻武汉，而突破了外国重镇田家镇的时候。在广州，六月轰炸之后，经过了一个暂时的安静。九月初又差不多每天都有警报和轰炸了。加上，国内若干抗战没有信心的人，还在鬼崇地准备投降，陆续地放出了各种各样的悲观和沮丧的空气。广州迤近香港，对于谣言的反应特别敏锐。所以在那时候，我想提高抗战必胜信心，抨击悲观主义，和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生长，应该是艺术工作者当前的主题。我从这观点出发架空地设了一个故事，我想忠实于现实主义，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乡沦陷，妻儿寄寓上海，“身居南国，心向江南”（这是于伶兄说我的话），所以我就在比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环境里面，寄托了这个主题。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我写的地方是上海，是沦陷区，是一个古旧的家，所以我实在不敢违心地把瑞秋、艾珍之类的人物写成铮铮的斗士。即使是刘爱庐吧，他可以博得观众的同情，但他也不是一个英雄，我写他，只想表现地主里面的一个保有正义感的封建儒生的一面，使他站在抗战这一面，使他同情下一代的，也不是由于阶级而是由于民族的感情（我此次在香港替大地影片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地交响曲》，又重复地写了这样一个脚色，但是只因为他所处的地方是游击区，社会动荡的震幅很大，所以他的生活和意识的变革也和刘爱庐的有了很大的差分）。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敢对他做过大的期待，因为六十年的生活已经把他定型化了。

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今天看昨天

说到同情，就不能不接触到于明扬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抗战前后，我看见过许多个典型的人，就是平日叫嚣跳踉，大语壮言，可是一朝他自己号召别人的行动到来的时候，他却遁入天空，在云端里摇头叹气，不满现实，但是又不愿以行动去争取更好的现实的到来。嘴里喊着光明，而自己则藏匿在最阴暗的角上，这样，小有挫折，立刻就会对于昨日的主张，作全盘的否定。我憎恶这样的人，甚于最不容易进步的绣笙。我写于明扬，我想用这样一个典型来对比那徐徐地——但是着实地进步着的另外一面。但是，在写作中，我说不出什么因缘，忆旧的小恶魔玩弄了我，使我将他写成一个参加过学运的亡省的青年，更因为对他的介绍只限于“预备说明”，没有余裕充分地说明他的过去，于是先天的矛盾就存在了，憎恶他呢？还是同情？我不想有意识的对他同情，但是“他的过去”使观众对他发生了怜悯，——这怜悯，正像一道护身的符，使我对于他的批判受到了绝大的阻碍，他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十足的汉奸，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死去终于还免不了——一抹难以排遣的不忍。有人批评我说，喻志华讲给他听的都是空话，所以不足以驳倒他的理论，我想这批评是出于印象。喻志华比不上毛泽东先生，她讲不出——在舞台上也不容许她讲出“新阶段”和“持久战”中的光辉的言语（不幸我写这剧本的时候，还没有读这两本书的幸福）。而她所讲，在前进的人看来已经是空言和常谈，可是对于刘爱庐、艾珍之类还不失为通俗易懂的勉励和鼓励，我以为真实地使喻志华不能克服于明扬的，不单是理论的贫乏，而更是一种因为他的身世而早已生根在善良观众心中的怜悯！处理题材的时候一发可以牵动全局，在此我得到了一个教训，两年之后，他的理论变成了汪精卫的理论，那么对于他的同情，也已经是罪恶了，我残念着社务羁绊了我，使我不能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重新考虑和纠正这一个问题。

旧的，腐朽了的，恶的，一切都要在矛盾中死亡；新的，善的，也都会在矛盾中生长，让于明扬死去，但，使这样一个青年如此地死去在我终觉得是一件黯然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九月
（原载《长途》，集美书店一
九四二年十二月初版。）

《小市民》后记^①

一九三五年夏，我在上海不能继续活动的时候，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把日常习惯了的工作骤然的放下来，人往往会反而觉得疲劳，我在一个白俄办的小公寓里“休息”了几个月，写下了我最初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这一年冬，用“徐佩韦”的笔名发表在《文学》上。第二年春，星期小剧场决定了上演这个剧本，而第一次上演，就遭到了意外的麻烦，为了最后两句教科书上常用的“东北是我们的”这句话，突然的遭到了工部局的禁演。我当时自己没有去看戏的福分，但是去看了的朋友来说，演员和观众，都是始而哑然若失，继而愤极而涕。那成问题的两句话的用意只是在唤起人们的注意，沦陷了多年的东北四省仍旧是中国的领土，而这话在当时也有被禁上演的资格了，——我叙述这往事的原因，是在请大家想想，当时，蒋汪当政的“敦睦邦交”时代，是怎样黑暗的一个时世！可是结果，还是我们胜了，这禁演的消息在上海引起了相当的激动，在新闻上登出来，都说被禁的原因是由于剧中有“东北是我们的”那一句，因之，“东北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反而成了人们嘴上的无法禁说的口号，而使我那应该是被人忘却的拙作增加了意外的“光荣”。

同在这年冬，写了另一个喜剧《中秋月》。这一直到第二年才以“徐至”的名字发表在《妇女生活》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写《赛金花》和准备写《秋瑾传》。

《重逢》（《上海屋檐下》）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依旧是在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黄梅天一般的忧郁时代，形式也依旧是喜剧。喜剧，本来大都是产生于忧郁时代的。一九三六年我曾译过果戈理的《两个伊凡的吵架》，那里面的作者的话：“我们的俄罗斯是如何的忧郁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句话者是留在我的心头。

黄梅天之后来了一阵大雷雨，抗战开始了。我离开了住了十年之久的上海，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一直没有写文艺作品，到广州沦陷之前的一个月我才写了《赎罪》和《一年间》。前者是“搭题”戏，后者是“急就篇”，粗杂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九年夏，为了探宁儿的病，我从桂林回到上海，那正是“汪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工作中心是集中火力，打击抗日反汪的言论，我在那短短的一星期中看了各式各样的人，五月回香港，就在那里一晚上写了《娼妇》。

将这些看了一遍，全是写“小市民”的东西，就把这集子叫做《小市民》吧，对于“小市民”，我曾经在一个机会写过：

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老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藉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愿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

^① 本文收录进《小市民》一书时作者对史实作了订正。文中第三句：“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原文是：“我到了阔别的东京”。当时是为了迷惑敌人，事实上作者并未离开上海。此外，作者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的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地……抗战中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这样的人物还不可能是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我想也还是应该争取的对象，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单单责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这意见，到今天还不曾改变，所以有机会，“小市民”戏还要写下去（最近执笔中的《愁城记》，就是这一例）。

从一九三五年到今天，是五年了，而我留下的，是那么贫弱而可怜！集起来，作为这些忧郁的日子的纪念吧！

一九四〇年四月
（原载《小市民》，新知书店
一九四〇年七月初版。）

《心防》后记

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对于我成为一个可爱而又可恼的地方。不论离得多少远，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总是那样的强烈而鲜明，在这迢遥的山城里，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伤，苦恼，她的愤恨，斗争……

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戏剧与文学》杂志提出了一个“表现上海”的号召，那时候，我正计划着写两个以上海为舞台的剧本。我响应这个号召，把计划提前，在五月里写了《心防》。

也许是由于感情上的反驳，也许是由于计划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一种三年来不断地在心里起伏着的对于在上海苦斗着的朋友们的感慕与忧戚，我把场面安放在斗士们的一面。三年以来，由于我们剧作者的无私与勇敢，我们已经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我们自己朋辈里面的最丑恶的一面，《残雾》里的红梅，《乱世男女》里的大部分的角色，我们的笔力似乎都集中在对于这一些人物的鞭笞，沉淀是泛起了，而对于沉淀以外的呢？除出公式化的中央社电讯之外，我们的创作年代记忆上还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虚空。中国旧戏里本来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丑，于是我想，假如拿沉淀粪朽来逗人哄笑的风气继续下去，恐怕几年之后，在那些惯于笼统地用一两个特例来概括其余的人们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会定型成一个奇妙而丑怪的形象。我们不辞替我们的同时代人背了十字架游行，但是我想对于在上海那种特殊环境下辛苦挣扎着的朋友们终于是一种残忍和亵渎，我不自量力地担负起了这个填补空白的分工，我只想说：“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一面！”工拙，是不想计较了，我总算在空白上“涂鸦”，留下了一点墨渍。

因为这种原故，我所写的便不能涉及到上海文化斗争的全貌，这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阳光下做人，有的在阴暗中做鼠，对于那些耗子的面目，我自问也还认识得清楚。过去十年中，一直到今天，也许可以说，一部分精力还是支付在对于这些耗子的斗争之中。这些恼人的小动物变化多端，神出鬼没，一忽儿钻进来，一忽儿逃出去，它躲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齿，破坏着人们辛苦建造起来的东西。为了中国要有进步的电影，从前我们就被软性电影论的耗子纠缠过三四个年头。去年五月在上海，冯执中之类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无耻方法，破坏那用血汗凝聚起来的上海戏剧工作的基干。记得在广州听到刘呐鸥附逆的消息，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算旧帐》，但是在《心防》里，对于这些耗子的描写，终于轻轻地略过了。要不是约翰·斯坦贝克已经抢先用了那个《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这魅人的书名，我真想也在这个题名之下，另写一部人鼠之间的剧本。

一年来自己也觉得写得太少；办报和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过来想，涂鸦终于胜过了空白，也许，我涂得使人看了不快。但是只要有持久抗战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都能打胜，只要诚意地和要写而该写的戏剧搏斗，斗败了也不失为长期战争中的一次锻炼。差幸身心都还健康，性子也还不肯苟安于怠惰，凝视一下这作品之后，我仍将以拙劣的工具，忠实地去刻画人生的严肃。

一九四〇年九月

(原载《野草》，一九四〇年九月第一卷第二期。)

《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记^①

××兄：

得手书，知沪上友人有意把《两个伊凡的吵架》印成单印本，我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的话：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小册剧本不是无益的。

是真的，要不是你来信提起，我可已经把这个译本忘记了。与上次回上海时，你谈起健吾兄在旧书铺中买的《流火》，和你代我收集的《乱婚裁判》等等一样，完全记不起来了。

讲到这个剧本的翻译经过，我记起的，是那时对“情节戏”、“服装戏”的小小的反感。先“戏译”了伊马鞑平把果戈理的小说改编的单纯朴素、风趣盎然、神韵逼肖的《两个伊凡的吵架》，后来又“戏作”了《上海屋檐下》。

从你简短而深长的孤岛演剧通信中，觉得我那时所谓对“情节戏”、“服装戏”的小小反感，不幸非但未能不存在，而且有“于今为烈”之感。

抗战三年来，悲壮热烈、惊天地泣鬼神的现实而又似神话的题材，真是写不尽的。可是我们希望有成就的年轻剧作家，还“偏爱”着走“出奇”的路，写虚构的“曲折的情节，巧合的人生”，他们甚至复制着“乱伦”之类的故事，我想说这实在是“太浪费”了。这与“金玉其外”的“服装戏”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更同意你已经代我同意了这个小剧本的出版：让年轻的演剧同志们手头多这样一本小书，不是无益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写于桂林
(载《两个伊凡的吵架》，一九四〇年上海旦社版。)

^① 原标题为《〈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言》，后由作者改为“小记”。《两个伊凡的吵架》，果戈理著，夏衍译。

别桂林^①
——《愁城记》代序

去年阴历除夕，我离开了滞在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的要下雪了吗？

尽管战乱损钝了易感的心，但是离开一处住惯了的地方，总还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战争以来，经验这样的离别在我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别离过妻儿所在的上海，我也别离过使我至今眷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别离我抱着振奋与斗志，第二次别离怀着愤怒与信心，而这一次呢？我带着的是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欧阳予倩先生告别的时候，在我的《心防》剧中演过一个角色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可是难以置答的疑问：

“你在《心防》中不让刘浩如离开上海，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的离开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

“那是因为逼着刘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敌人和国贼，而现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却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和他们合作的‘友人’！”

当时心情的黯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不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勉竭弩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

在削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中的山城，“赴难”而来，“避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这样，我以一个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的感觉，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来的疲惫，突如的逆袭过来，待我舔愈了创伤，平复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来了。世界正在战争的坩锅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忧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驱散了我的忧伤，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条战线转进，三年半的记者生活迫使我懈怠于剧作，现在应该是复归到这一战线的时候了。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

^① 本文最初发表时题为《一个旅人的独白》。

《心防》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

《心防》和《愁城记》，同是在去年春末执笔的，本来的计划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来的那一幕丑剧为中心，上海新闻戏剧界友人们的壮烈战斗激动了我，在北欧战事最剧烈的两周间，我草率的写完了《心防》，而《愁城记》，则为着要使之在愁城里上演，临时执笔的时候在构思和布局上又费了绝大的周章。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空前无耻的出卖，对于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伏尔泰，有过左拉，有过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民族运命，给与了我以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我得自承不能涵养，我忿然的写了《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这两篇短论。事出意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主持着的那张小小的报纸招来了绝大的非难，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对我们开始了卑怯的罗织与攻讦，恐吓，禁压，和封锁，必要的抗辩和处置化费了我这以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国同盟成立，滇缅公路重开，国际上再换了一个局面，我喘了口气，再把《愁城记》的底稿翻开，时间已是仲冬，上海剧艺社已经把这难产中的剧本作为预告，而发表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西，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

是困难的事吧。

正像读者无法究诘这些小儿女们今后的行踪和运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关注这一类习作的运命了。这算是从《上海屋檐下》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终结。除出预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难，而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这一难关之外，我如实自供，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欢欣。

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一

九四一年五月

（原载《愁城记》，剧场艺术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忆江南 ——《水乡吟》序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

这已经是差近两年前的事了。

从香港回来，途次柳州，有了一天的耽搁。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地想到江边去撷拾一些回忆。在广州沦陷的战乱中，我也曾凄惶地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路远天长，陡然感到凄苦。这几年来像孩子似的想把瓦石搭起一座宝塔，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人的一蹴之下就粉碎了么？夜静无声，更像是独行旷野，至桥堍，风传来了一阵琐碎的男女絮语的声音：

“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憬然耸耳，因为这正是百分之百地保存了杭州上城人语调的乡音。暗淡中看不清面目，估想起来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吧，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那是从他们怨诉一般的声调和拖着淡影的脚步也可以看得到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的”生活的人像。就从这一对小儿女讲吧，生长在富庶的江南，乡土赋予了他谨慎保守到“怕出远门”的习性，要不是残酷的战争，要不是日本法西斯给他们的“想也想不到”的生活，要不是他们还幸福地保有着想要挣脱这种生活的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恐怕一生中再也不会漂泊到这江南人心目中认为蛮荒瘴毒的地方来吧？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儿女们已经不再是独特的例子了。我从这一句平凡的，可是凄寂的言语后面听到了一种平凡人的悲壮，展开在我回想中的故乡也已经不再是含垢垂泪的西子湖边的桃柳，而只是驰骋在莫干天目间的被迫着用原始的武装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了。叙述这些人的故事，今天不已经像神话一般的流传在故乡来人的口碑中么？

这一年夏，敌人攻陷了金华。苟安的幻想在凶残的三光政策下面粉碎，金和铅在战火中判别了他们的坚实与脆弱了。眼看得见的是几乎无可挽救的土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阻力而更显出了它威力的春潮。要不是浙西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一再的出击与阻挠，这一年夏季的法西斯洪水也许会冲得更远一点吧。我明白了浙西人所谓“浙西人的柔弱”这个概念只能正确地适用于上层知识分子，于是而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们故乡的夸耀了。

《水乡吟》四幕，是在这样心情下所写。但我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真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诘究的后景与效果。惯于用教条来呵斥的批评家们也许会指出我的怯弱，但这剧本在“中国万岁剧团”所遭遇的“想也想不到”的歧视与冷遇，不就是一个我的最好的辩解么？这本书没有写序，我只在卷首抄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句：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者会觉得太晦暗么？那么我说：这正是此时此地不得不然的风习。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 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 Y 的介绍，认识了 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 T 和 W 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 Zinsser 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将我魅惑住了，我贪婪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

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 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

“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

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胭脂·油画与习作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 *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 *étude* 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 *étude* 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告诉我从偶然的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 *master* 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公式·符咒与“批评”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这两篇短文本来是写了作为拙作《法西斯细菌》单行本的“后记”用的。应需要，前者曾发表于桂林《大公报·文艺》，后者曾发表于《野草》，这都已经是去年秋间的事了。现在遭遇阻障，单行本出版无期，不能不变更性质，而成为“无书之跋”了，趁机会，我想添写几句，作为后记的后记。

这出戏上演前上演后，我有幸听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意见，除在此次成都公演中改正了一些缺点之外，我得再在这儿对朋友们表示友情的感谢。但，我更有荣幸，也一再的拜受了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我懂得作为一个作者应有的仪礼，所以即使是不能拜嘉的“批评”，我也保持了沉默。可是，中国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出于常情思忖之外，不仅一方的沉默可以产生奇怪的揣测，而且，被判为“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和“难免失败”也可能在流言中被认为定案。我从不讳言失败，这本戏的技术上的失败也早在意料之中，但，对于企图用教条和八股来代替批评的“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尽管我手头还没有一部“名词大全”和“术语观止”，我还不想避忌论争。

说实话，我的理解程度（不，应该说是语文程度）实在读不懂黄芜茵先生的“批评”，环诵再三，我才好不容易从一大堆术语中间找出了一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责难。责难之一，说我没有“彻底击破”“一般寡头统治阶层所发明和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的”“虚伪理论的背景”，说我“企图从另一路径来接近它”，我给主人公（科学至上主义者）“不断地布置下不幸的遭际”，而“最后使他转变”，于是而他（“批评家”）发问了：“重要的问题是作者所布置下的种种不幸的遭际是不是有着必然性和普遍性呢？”他（“批评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了，他说，中国科学至上主义者如俞实夫其人者所遭际的并不是“典型环境”，看，他说：“显而易见，假使这个科学至上主义者底工作地点不在东京、上海或香港，而是战争尚未直接（？——引用者，下同）波及的地方，随便说四川（？）或是美国，他就无法接受作者给他所布置下的许多遭遇。”又是一个“显而易见”，“即使在那同个都市里工作，也未必（！）一定（！）会碰到（！）那些变故，那么，时至今日，他不是仍然是屹立未动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吗？”这高贵的“典型环境”论，真有点使我惘然。假如说，在法西斯主义开始荼毒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大家都能承认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科学至上主义者”们并没有受过种族歧视，并没有受过工作干扰，并没有受过生活压迫，乃至并没有受过战争的“直接波及”，并没有受过我所“布置”的一切不幸遭际，那么我将坦白承认，我所布置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事件”，否则，假如我们同时代人每个都曾受过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就想诉诸于读者的判断，我和我的“批评者”之间总有一方的论断是抹杀事实的胡言。举一个例，假如说，四川——遭遇到那样残酷轰炸，遭遇到那样严重的战争威胁，遭遇到那样不可补救的文物的毁坏，书籍仪器的饥荒，生活条件的困顿，而依旧可以公言这是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而科学家们依旧可以丝毫不受“环境”干扰地“屹立不动”，——假如有良知的知识人对于这一切可以承认，那么我只有低首认罪，俯首无言。再假如说，假如回

答是这位“批评家”的相反的一面，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至上”论者或不“至上”论者）——不论在上海，在北平，在香港，在四川，乃至在天涯海角，即使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遭遇到乃至可能遭遇到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坚持我的看法，“显而易见”，俞实夫所遭遇的正是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环境。

责难之二，又是一个奇妙的名词，说我犯的“理论错误”是已“被清算过的”“前线主义”。这“错误理论”被清算于何时？在什么地方由何人所清算，浅见的笔者还不知道。但假如说，让科学工作者走出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看一看现实的世界，更“本质地”（这是我们批评家爱用的一个术语）看一看使伤寒病菌不能单用科学家的研究来绝灭的原因，于是而得到结论，要科学家在战争的“实际工作中来研究”（俞实夫语）……这一切都是“前线主义”，都非“清算”不可，那么我今天依旧要站在千万人面前傲言，我所主张着的正是这样的“前线主义”。我们高贵的批评家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例子的，那么，我也“随便”举几个美国的“实际的”例子吧。例一：五个月前，《法西斯细菌》重庆演出之后，我有幸遇见了万里扁舟、干犯险阻、回祖国来参加抗战医疗工作的 Hangs Zinsser 先生的私淑弟子刘秉扬博士，他告诉我，在美国不仅专攻细菌学的中国人如他自己，战争开始以来，Zinsser 研究室的全体工作者，已经把他们的全心全力倾注于战争。美国参战以后，这些科学家们“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波及”，但也都已经离开研究室，跑到盟国的“前线”去了。我不相信这些人已经放弃了研究，我更不相信他们离开了研究室而美国的细菌学研究就会陷于停顿，我更不相信这些“前线主义”者都需要“清算”。其实，我不妨先推荐我们的“批评家”先读一读 Zinsser 先生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和更详细地记述了伤寒，特别是斑疹伤寒研究过程的他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

（在《大西洋杂志》上连载时题为：R·S—As I Remember Him）。实在说，斑疹伤寒的研究本来就是开始于“前线”的战场上的。例二：最近为了协助中国抗战医疗工作，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的代表福克脑先生到了重庆，从他谈话之间使我们听到了一段使人感奋的事实，美国医学界为着表示盟国之谊，恐怕苏联在那样剧烈的抗战中荒废了医学研究工作，曾经电请苏联派遣一些医师和医学研究员到美国去研究，一切费用全由美方负担。但出于意外，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复，苏联医学界回答他们说，衷心感谢盟邦的关切与友谊，但是苏联还在抗战之中，全国医学工作者都已经把全部精力集注到“前线”去了，所以在战争获得胜利之前，苏联甚至没有法子派出一个到外国去“研究”的人员。——这，又是如何彻底的“前线主义”者啊！其实，这样的例，是“随便”可以举得出的，威尔基新著《天下一家》中，西蒙诺夫回答威尔基说苏联不能派遣萧斯塔科维奇到美国去的话，不也表示了苏联艺术工作者正全是十足的“前线主义者”吗？假如说，这样的将全民技术人员的全能全力毫无保留地支付于求国家民族之生存的抗战是“前线主义”，是“理论错误的”“泥沼”，那么，我没有话说，我们大可不必再说抗战，更不必欲歌颂从辽远的加拿大到中国“前线”来的白求恩大夫们了。

后记的后记已经“尾大不掉”，应该是打住的了，可是，利用这一个机会，我还想表白一下我对于这“论争”无可言喻的寂寞和悲凉。我们要有“批评”，这呼声已经很久了，而接触到实际从一种教条到另一种教条，从一种专制到另一种专制，不仅万水千山，望不见彼岸，在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基础，

而惯于以文字为游戏和泄愤的所在，有时候我想这期待简直有类于沙上建塔般的事了。十几年来法西斯毒焰传遍了大半个世界，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我们的同胞骨肉遭受着屠戮和奴役，颠连无告的苦楚，反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旁贷的天职，可是看，平时用尽了一切术语教条作种种进步状的“批评家”，此时此地，连祖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需要”也可轻轻的加以否认而傲然以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姿态而出现了。用高贵的“艺术”观点来看，那么我的习作本来就不值我们“批评家”的一盼，可是在今天，在这窒息时代，在我们高贵的“批评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拟似形态未曾遗以一矢的今天，我还自傲着曾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和恶势力斗争，我在这被人忽视的领域里最初提出了“科学与法西斯不两立”的口号，我也自傲着居然像小草一般的钻过重叠的石块，在若干观众前面暴露了法西斯强盗的残虐与暴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人类敌人的法西斯主义投掷了最大限度的出自衷心的憎恨与愤怒，尽管我的拙作只博得了“批评家”的蔑视和冷笑，但我相信，在另一方面即使微弱到不足挂齿，我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与欢欣。今天是恶棍墨索里尼塌台的日子，听着号外的呼声，我将在这儿搁笔。我仿佛看到，人类的前面已经有曙光了，假如，用全世界人民生命和热血来换得的这一个胜利之中，我仿佛也曾参加了一滴眼泪，一份惊骇呼喊的真情，那我将感到满足。法西斯应该死灭，人应该清醒，老调子应该休息了吧。一九

四三年七月写于重庆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关于《法西斯细菌》

《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写在十二年之前的一九四二年，我只看过重庆的演出，桂林和上海的演出都没有看。因此对我自己来说，对这个剧本的印象也已经不鲜明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要演这个戏，而且标上了“五四以来中国优秀剧目之一”这几个字，对我来说，着实有点惶恐。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我的剧本选，许多朋友都主张把这个剧本选进去。我迟疑了一阵之后终于同意了，因为在我的那些习作中，这本剧本的“演出”——只是在“演出”上——比较的受到观众的欢迎，演出的次数也比较多些。至于剧本本身，我一直感到不满意，一直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剧本，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这决不是讲客气话，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上、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我在“选集”的代序中有过一段自我批评。在技术上，我在早期出版的单行本（开明版）的后记《胭脂·油画与习作》中，也已经把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交代过了，拿绘画来作比喻，我“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剧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成为“作品”之前的“习作”而已。

那么，这个剧本在今天看来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意义呢？我想，假如还有一点的话，恐怕就在于这个戏的主题——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这一点了。这种思想过去有，今天还有，最近及将来似乎也还不会很快的绝灭。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许多科学技术界、医药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同时，中国的科学家又还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的洁癖，分不清楚现象与本质，把政治看成很脏的事情，对现实政治戴上白手套来，觉得还是关起门来研究干净一些，而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成了被统治阶级玩弄、利用，和作为点缀装饰的工具。原子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大量杀人，细菌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制造细菌弹，这些“好心肠”的科学家成了人类的罪人，不是太冤屈了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也亲自看到过他们被逼着而不能不走的各种不同的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以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农艺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等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经过艺术，从旁吆喝一声而已。

我同情这种人的遭际，可是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和做法，我们团结过他们，我们也批评过他们。我说过，对这些人，我们的鞭挞是常常带着眼泪的。

在这个戏里，俞实夫是主，其余的是副，赵安涛和秦正谊，所起的只是烘托与比较的作用。赵是自命懂得政治的，但他不知道接近人民，他把自己的位子放在人民之上，他想抓到一个地位，一种权力，来施展抱负，可以说天真，也可以说愚蠢，最愚蠢的是他不懂得处身在阶级社会，不懂得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出来，自命聪明，东碰西抓，为善不足，为恶又还有一点点顾忌，结果是烂额焦头，百无一事。对这样的人，鞭挞应当严一点，我太温

情了。至于秦正谊，那是等而下之，是帮闲，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丑角，我用漫画笔法勾抹了他，只是限于能力，不能把他写得更可鄙可耻而已。

至于其他的角色，我不想多说了，有的是为了烘托，有的是为了作剧结构上、叙述上的必要，也有的甚至于只是一碗菜里的几片木耳和香菜，一服药里的一点调色料、糖衣，乃至水分、填充剂。甚至，也有一些人物、过场、对话完全是可有可无，可以适当地裁减。例如，香港酒店那一场的几个商人，当时这样的人很多，兴之所至，不免顺笔写了一点，今天看来，对广大观众来说，也许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事了。

我同意洪老的说法，这是一个喜剧，我欢喜用这种形式。但是我不同意有些朋友的说法，拿这样的习作来和契诃夫的喜剧比拟。这是对我的过高估价，也许是对我的鼓励。但是，用粗糙的习作来比完整的油画，我觉得是僭越而不当的。有些朋友说我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说，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样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也许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卷进在政治斗争中的缘故。假如一定要问，我在外国作品中受到过什么人的影响，那么我说，迭更司对我的影响要多一点，大一些。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办报。那些剧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我也一直认为我的写剧本是业余性质，写的时候，又大都是即兴式的，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偶有所喜，偶有所感，就不免在画本上勾描几笔”的性质。戏的主题，我欢喜“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一服药治一种病。我不相信真有一种“能治百病”的膏丹。我也不大赞成一个厨司在烹调之前就预先计算好这只菜里有多少维生素甲、维生素乙，或者多少卡路里。替人家作菜，一定要照顾到营养，营养价值自然是愈高愈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人家的口味和胃纳。就是，有时得加一点调味料，加几茎香菜。这些东西有没有营养和医疗价值，我没有研究过，更说不出它们的化学成分，所以假如有人问我，这一些偶尔露面的角色，这些随口讲到的台词，对主题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自传”如何写法？那我就完全答不上来。这一切，自然只有听导演同志来作适当的安排和取舍了。

我把演出时的处理和安排完全交给导演同志，只要戏的主题能够表达出来，要删要改，哪些地方要重一点，哪些地方要轻一点，洪老和逸生同志可以放手加工。我再说一遍，拿这个剧本来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剧目演出的第一炮，我有点惶恐。十二年，仅仅十二年，时代变得太快了，社会风气变得太快了，有一些朋友，对今天演出这样一个剧本的意义也许会发生疑问的吧。

注：五月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夏衍同志的《法西斯细菌》，由洪深同志导演。现在夏衍同志根据演后收集的意见进行修改。八月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根据修改本再次公演。这个戏在初排时，夏衍同志曾和导演及演员们作了一次谈话，这里发表的就是经过夏衍同志修正后的谈话记录。

（原载《新观察》
一九五四年十五期。）

改编《复活》后记

一九四二年从香港的战乱中归来，我在嘉陵江边的北温泉度了一个静谧的长夏。尽管世乱时艰，忧思沸郁，但是能够俯瞰着嘉陵江的清流，啸傲耽读，自己觉得已经是难能幸福的事了。我利用北泉图书馆的藏书，读了一些古今贤哲的传记，可是当我读完了罗曼·罗兰的《托翁传》的时候，我又被引起了再精读一些托翁作品的意欲了。在这书荒时代，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部郭译的《战争与和平》，耿译的《复活》，残缺强半的孟译的《克里采长曲》，以及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大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一卷的《戏曲集》而已。

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笔前面低头，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顶礼，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诚实的生活态度前面肃然起敬了。

我打算不计有否上演的可能，重译一些托翁的未曾介绍过的剧本，但这计划不久就被另一个小小的野心所打断了。

为了使旅舍的斗室免得过于落寞，我在壁上挂了一幅帕斯特纳克所绘的《复活》的插画，我常常凝视着它，白衣的卡丘莎像是祭坛前面的牺牲，我也说不出被帕氏笔下所描绘的那双卡丘莎的茫然若失的眼睛所勾起的是怜悯呢还是苦痛！这一年有三个剧团在北碚“过夏”，我有了和阔别多年的友人们放谈的机会，于是《复活》常常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如何表现卡丘莎的苦痛常常成为我们演员朋友们争论的中心。《复活》是不知多少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的，我在银幕上看过德丽奥和安娜·史丹的卡丘莎，我也从书本和舞台上看过法国巴大叶和田寿昌兄所改编的剧本，因此，当鲤庭和君莉一再怂恿我再来一次改编的时候，压服了我不自量的冲动的依然是忸怩和惶恐。改编本来是不讨好的工作，加上我的对象又是山一般崇高，海一般浩瀚，大自然一般丰饶与壮美的托尔斯泰！君莉、鲤庭两兄热心地给我找来了巴大叶的陈绵译本，寿昌兄的改编本，以及一些可供参考的书籍与画片，可是人事匆匆，山城挂上了雾幕，戏剧季一开始，我就像带着一个“宿题”的学生似的回到重庆来了。

我几乎是无为地度过了一个冬天。朋友们说今年的戏剧季不够热闹，但是首次到首都来的人已经充分满足于剧目的丰富和演技的精进了。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黄金色的理想，因之从这些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中就可以产生各自的不满，我常常觉得在今天这种现况之下，从事艺术的追求很像一颗企图从瓦砾中萌长的弱草，生根的不是沃土，瓦砾是那样地无情，可是执策而临的人们却又是那样地对瓦砾宽容，对弱草苛厉！滋兰于 菀之中，在沙漠和废墟上点缀一些绿彩，使枯渴的人群已经隐约地感到在地下还有一些盎然的生气，那不仅可以宽恕，而且值得怜悯了吧？我同情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贫穷、病弱、遭人白眼，可是依旧九死无悔地坚守着戏剧岗位的朋友们的际遇，我相信也只有从他们无言的谛执之中，才能懂得他们的心情，才能体会出他们的欲求与苦恼。我不想在这短文里面絮絮于对于上記几位朋友的“负债”，我要说的只是我无法拒否他们用无言的凝视来代替催促的要求；在朋友们忙碌于准备一九四三年春季剧目的时候，我又明知会失败而冒了一次大险。

我得感谢巴大叶和寿昌兄的两个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剧本，我借用了他们的许多场面，不自白也许会被指斥为剽窃，老实说，我不忍割爱他们。迫使我冒险的理由第一是为了适应于目前的上演条件，这儿所说的“上演条件”自然不局限于舞台；我不想絮述困难，时代已经使读者变成了敏感——

第二，那当然是在这条件之下的微弱到不足道的使我冒险的冲动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磋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读托尔斯泰，常常使我苦痛，在这次冒险过程中不知有几次使我掷笔歔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我觉得在托翁也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精神上的负担，“学习使你们自己和人民血肉相关”（Learn to make yourselves akin to people），该更不是一蹴即达的事了，何况，用托翁自己的话来说：

我还想加上，学习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所不可缺的部分。但，这种同情不该单用你们的头脑（用头脑来同情是容易的），而应该用你们对人民的爱，用你们的心！

对多艰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Virginia wolfe（英国女作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论文里引用过上記托翁的名言，可不是最近有人确切地批评她说，她过于洗练的感觉，终于限制了她停止于“懂得应该”而实际上不能 Akin to people（和人民接近）吗？使压损（strain）了的物体恢复原状，使为着适应“社会”这座奇怪的机器而变形变性了的曾经叫做“人”的动物回复到平直，朴质，具有正常感觉的有人性的 Human being（人），是如何困难的事啊。——在“复活”这两个字前面，我真的感到森严的恐惧了。

冒险是失败了，但在失败之后，我竟像仿佛摸到了真理的边缘。假如能够因为导演和演员朋友们的努力，让我的观众们或多或少的能从涅赫留道夫的苦恼之中感到一点人生的严肃，那么这已经是我这次冒险的收获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写于重庆
（原载《新华日报》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戏剧春秋》后记

今年九月七日，是云卫兄四十初度的日子。当日朋友们在各报副刊写了些回忆与杂感之类的纪念文章。其中我在《新民报》上写的文章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朋友们对这提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午，之的找我说：“抗战以来我们表扬过新闻界，歌颂过教育界，因为他们在抗战的宣传教育上都尽了常人所不曾想象和估计的力量。但，我们戏剧界呢？我们不想怨尤别人没有提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走完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之后，我们也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二十几年来的足迹，我们就来写一个戏吧，戏名就叫《戏剧春秋》……”他又说：“方才和于伶谈了，他也非常兴奋，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后，就没有戏了，《云彩霞》不能通过，那么几个人赶一赶，这题材是容易引起每一个人的写作兴趣的。”

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子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的。”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

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会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某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戏剧春秋》新版后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和金山等一行人，从太平洋战争中沦陷了的香港，偷渡海洋，登岸澳门，经台山、玉林、桂林等地，先后辗转到了重庆。在廖承志同志的周密安排下，于伶、章泯、宋之的跟着茅盾、韬奋和柳亚子等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人员，逃出香港，分批安抵我广东东江游击区。遵照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曾生将军指挥，陆续分散安顿到各个适当的地方。宋之的领着部分“旅港剧人”到了重庆。于伶、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留在桂林，等待党的交通，去上海，转往新四军驻地苏北盐城的“鲁艺”。

在重庆，金山参加演出了郭老的《屈原》。夏衍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和《水乡吟》，着手改编《复活》。宋之的创作了《祖国在召唤》。

秋冬间，党直接领导的由应云卫、陈白尘与辛汉文主持的“中华剧艺社”被迫去川西南一带旅行公演后，将久驻成都。周恩来同志认为话剧演出是当时在敌人的心脏重庆作斗争的重要而有效的阵地，指示夏衍立即筹组一个大型的新剧社，电召半年来被湘北、浙西战火所阻，滞留在桂林的人员。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先行，于伶在桂林演出《长夜行》后，于四三年元旦前夕到达重庆。

这样，在周恩来同志与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由章泯、宋之的、金山、司徒慧敏、于伶负责建立了“中国艺术剧社”。主要骨干还是一九四一年初，为抗议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从重庆与桂林等地疏散到香港，组成“旅港剧人协会”的舒强、沙蒙、蓝马、凤子、王苹、虞静子、凌琯如、戴浩、奚蒙、林朴晔、罗毅之等人。原在重庆的张瑞芳、吕恩、胡子、岳建中，和上海来的黄宗江、柏李、蒋天流、苏石凤等都参加了。同时吸收了恩施与柳州的演剧队队员田稼等五六人，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画家丁聪等；次一年，从新疆狱中出来的徐韬、赵丹、王为一和朱今明也都参加了。阵容是相当强的。今天，我们两人之所以要在这里列举这个阵容，明知记忆的名单还很不完全，是出于衷心的怀念，怀念四十年前的这个战斗的集体；怀念为这场艰苦而有成果的集体战斗，尽了心出过力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同志与战友：宋之的、章泯、洪深、史东山、辛汉文、徐韬、郑君里、沙蒙、蓝马、贺孟斧、孙师毅、盛家伦、虞静子……。还有当年主办桂林“西南剧展”时导演《戏剧春秋》，去年含恨而终的瞿白音同志。还有为新兴戏剧运动受难忍辱了一生，当时以他苦苦撑持的“中华剧艺社”来同“中国艺术剧社”配合、并肩，互为犄角作战，“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批斗游街，倒毙在上海马路上的应云卫同志！还有，剧社的总务沈硕甫同志，为能开出剧社的一顿大锅饭而张罗，心脏病突发，倒在都邮街口，路毙了的戏剧无名英雄！

中国艺术剧社，由洪深导演《祖国在召唤》，从四三年春节起，首演于“银社”剧场。到了九月，一连送审两个剧本不被统治当局通过。剧社无戏可演了。怎么办？我们三个人慨然、愤然、奋然、决然地合作写了《戏剧春秋》。我们写戏的冲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创作过程，我们在写作中与写完后的的心情，这在夏衍写的前一篇“后记”里都说了。在第四幕的第二场戏中，我们还特地写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苏 菲 就只能牺牲，只能演出这倒霉的戏。只能
这么痛苦，痛苦，永远的痛苦。

伍觉群（感慨系之）说起来，问题就很大，要有现代化的戏剧，要一切都合现代化标准，先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吃苦，就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我们当时一九四三年的一心的向往和虔诚的信念。今天，临到一九八〇年，我们面对现实，忆想过去，展望未来，再一回味当时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我们却不仅仅是“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欣”，而是一种很大的慰安啦！我们在《献辞》中曾写着：

“……

已经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这里所指的明天，早已成为今日的昨天，遥远的昨天了。感到慰安的是我们当时“非常卑微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样一个急就章的戏，一九四三年的白区政治环境与审查制度下的产品《戏剧春秋》也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随着当年它在重庆、成都、桂林、永安、上海等地的演出，《戏剧春秋》在重庆与上海印过四版。“文革”之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列入题材规划，陈鲤庭、黄宗英等同志，二次决定改编《戏剧春秋》，拍摄电影；江苏省话剧团张辉和田野同志等，也曾准备上演《戏剧春秋》。而张春桥在上海文艺界一次四个影剧院同时拉线听他的大报告中，痛骂：《戏剧春秋》是为三十年代老家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戏，搞它干什么？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呢。十年浩劫，抄撕烧毁，劫后余灰的剧本所剩无几了。

今春，受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盛情邀请，于伶随着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去访问时，日本著名的左翼老戏剧家千田是也先生热忱地对于伶谈了一九六四年他亲任导演的《戏剧春秋》在日本演出的情况。于伶曾有诗奉赠千田。东京大学讲师，著名的中国戏剧研究家黎波先生也对于伶讲：他收藏的一本《戏剧春秋》，连同译文，供千田先生他们拿去用了；要于伶寄赠一本原书。于伶表示一时还难以应命，因为这剧本难于找得到了。四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戏剧春秋》时，听说是好不容易才觅得一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重印《戏剧春秋》。于伶校了一遍当时排错的行与字。他是泪眼如花地读校的，怕也难于尽校清楚。为了要写一篇新的后记，于伶把《献辞》和《后记》读给夏衍听。夏衍沉默了一阵，说：“倒也是真的，自己写的戏，很少坐在场子里看一遍以上的。可这个戏，在重庆，在上海演出时，倒是看了不止一遍。”这也是我们一种共同心情吧：不是在看自己写的戏，而是一次次的“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的心情。

之的不在了，我们两个人在写这新版后记时，只是想：让我们凭借这本急就章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戏剧春秋》，来表示由衷的祝愿。祝愿在党中央的雨露恩泽滋润下的中国戏剧艺术在伟大的四化进军中发挥战斗作用与深远影响！

一九八〇年六月三日 北京

注：此文与于伶合写。

（原载《戏剧春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

《边鼓集》后记

这是我的第六本杂文集子。但是《从春到秋》、《转形期》两本一九四〇年在桂林夭折，不及和读者见面，《桂林论集》在香港排好付印的时候战争爆发，尸骨无存，因此，这就变成能够勉强出版的第三本了。——我用勉强这两个字，因为这本集子的篇幅本来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原来打算定名《屋上盆栽集》的，后来因为某种连自己也明白的原因，剪贴好了的原稿“卧病”三月，最后是自己动手术，割掉三分之一，剩下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部分，而这部分恰好都是谈到剧运的文章，于是就把名字改成《边鼓集》了。

边鼓，是站在旁边敲敲边鼓的意思。大家知道目前的戏剧运动是在紧张、散乱而又使人焦虑的状态之下，替当事人着着急，打打气，有时候代人捏一把汗，出出外行主意，或者指出一些当事人忙迫中不及看到的现象……这就是在写这些文章当时的心清和目的。白尘兄《习剧随笔》的出版鼓励了我印行这个集子。船在险滩中不上不下的时候，不背纤不掌舵的乘客有时也难免惊骇呼号一下的，即使明知这呼号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写了这些文章之后的寂寞。譬如《论正规化》这一篇发表之后，骏祥兄就从成都写信来代我寂寞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二十个人在想这些问题。”有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引不起一点波纹却是事实。有人说，“形势比人还强”，那么好吧，也许在将来，形势会逼着我们去思考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秋瑾》再版代序

将“三八”这个日子当作妇女的节日，在中国也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路程。风雨晴晦，影响着纪念这个节日的规模，一年盛大，一年消沉，也许下一年又因为特种的机会而“隆重”，但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兴衰，我没有感慨，我也并不感到寂寞和悲哀。

从一个出类拔萃的先觉秋瑾创办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学报》，也已经四十历寒暑了。四十年间，日月盈昃，妇女杂志有过了不少的绝续与兴衰，一个时期像雨后的春笋，一个时期又如残秋的落叶，但，对于这种往往为外在原因所约制的杂志发行数字之高低，我也并不觉得这就真真表征了妇运工作的兴衰。

三十年，四十年，为着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为着中国妇女的平等独立，流血，奋斗；奋斗，流血，秋瑾的墓木已拱，为女权而呼号的书籍和刊物也已经汗牛充栋了。可是，在四十年代的今日，在抗战中的中国，“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乃至“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还遍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女子真真的地位是在家中”的理论，依旧为最高学府的大教授们所倡导，而仅有的妇女刊物，还不能不分出大部分的篇幅来讨论“男女是否应该平等”，“女子是否应该走出厨房”，这不是真真值得寂寞，真真值得悲苦的事么？

“五四”产生了若干中国的诺拉。小鸟冲出了樊笼，体味了什么叫自由和平等，但，当她们同时也体味了风雨的力量之后，若干“勇敢”的诺拉又用眼泪来忏悔了“年轻时代的莽撞”，而重新回到“和平”的樊笼里去了。“五卅”与一九二七，跟历史上的新登场者一起，我们也有了刘和珍型的英雄，有了轰轰烈烈的女斗士，有了女兵，有了无数个无名的踏着荆棘的道路来争取解放的女性。但是，疾风一过，劲草几何？才十五年的岁月呢，昔年头角峥嵘的女斗士，今天已经是母仪足式的夫人太太，已经是母以子贤，妻以夫贵的命妇，甚至于已经是抄经念佛，谋幸福于来世的“信女”了。当女权和男女平等被当作少数人的敲门砖的时候，“妇运”窒息了，而真真的妇运，真真的新的女性，却在并不辩论着什么平等之类的名词的人群中诞生了！这儿没有英雄，这儿没有辉煌的演说与理论，她们要，她们做，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成员，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了。

过去，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岩石上的耕耘。一方面也可以说，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温室花卉的培植了。不炸毁压在地层上的岩石，作物是不能生根在土里的。把种子播在温室里，得到的收获也不过是用以炫人的一两枝奇花异卉罢了。我们珍重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俊杰与英雄，这都是民族的光荣和瑰宝，但我们也还觉得假如全民族的文化能够提高这么一分一寸，却是更比一二人的光荣更值得珍重的事情。

路，很远。但不停脚，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人类永远拒绝死亡，不合理的一切必然要在永生的人类社会中消失。

一九四四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

社一九四四年十月版。)

记《离离草》

五月初开始写这个剧本，今天校改完毕，已经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风雪，据说这是重庆罕有的严寒。我没有在北方度过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积雪，挂在茅檐下的冰柱，炕床，炉火，和紧围在煤油灯下谈话的人们的时候，倒反而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温暖。这些印象，大概是从书本子里得来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和已经胜过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长在江南，在北方所耽的时间和全生涯比较起来几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于常情之外，我永远永远地怀念着那一片渺无边际的在风雪中受难的地方。我攀登过金刚山的高峰，凭吊过牡丹江的战迹，在泰山之巅看过日出，在八达岭上听过驼铃，我也曾像一个哑行者似的呆坐过异国情调的哈尔滨的酒馆。我不能忘掉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发生亲切之感的却是那些数不清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暑假期内，我曾经在朝鲜、满洲作过一次无目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条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见过一队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了整个的菜市。在奉天车站，我目睹过一个日本路警任何一点借口都没有地把一个苦力推下火车急驶中的轨道。而在这种场合，一方面说，我在周围群众脸上看到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表情的悲伤，一种没有言语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威压之下，我也看到了为着维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们也就不自觉地学会了一种应顺一切压迫和作践的习性。在奉天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天清晨我听到了一种奇妙的叫卖声音：

“Nappa 喔，白菜， Kiuri 喔，黄瓜！”

Nappa 和 Kiuri 是白菜黄瓜的日本语发音，在中国北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贩的农民也已经不能不为着生活而学会几句日本话了。在最初的霎那，我想，在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主人而只求做一个和平奴隶的人，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将眼前的苦难认为命中注定的人，被祖国的官僚军阀遗忘在关外，除出租税劳役之外，永远不会记起他们之存在的那千千万万的蝼蚁般的曾经为人的动物，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也许在他们心中脑里该早已经全不存在了吧。可是，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时候，我是一个日本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学生制服，在朝鲜在满洲，为了言语不通，我通常用的也只能是日本言语，在全旅行中，由于这种服装语言的原故，我和我们同胞兄弟以及亲如骨肉的近邻民族之间，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酿成了异常险恶的充满了敌意空气。在从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中，一位同座的朝鲜女学生峻烈地拒绝了我对她的谈话，我从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几乎是一个虎狼一般可怕，毛虫一般可憎的对象。我惭愧当时的钝感，我还以为她的冷若冰霜只是由于少女应有的羞怯。可是，这样的敌意继续了一昼夜之后，当她在手提箱的名刺上发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她的态度突变了。她告诉我平壤的宿屋，可以找到中国人的地方，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了她对这个远隔了的邻居的向往。她，我记得非常明白，还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吧，在她开始懂得世界的时候，那一幕“日韩合并”的血腥悲剧也该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件了吧。但，从她那不经意的一憎一喜之间，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个和平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这样的琐事，在今天似乎再没有絮述之必要了，在我们国土的沿江沿海，不也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妇孺老弱，在无言的敌对中

等待着复仇的时候么？血总比水浓厚一点，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欺骗，一切怀柔，不是连对一个天真的女孩子都完全失败了么？我想起了无数个敢怒而不敢言的表情，我仿佛听到了千万个被作践者的无声的哭泣，“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了么？关里的人呀，已经十多年了，‘九一八’那一年出世的孩子已经进了中学，已经会讲流畅的日本话了！”

从严格的观点上说，“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可是，十三年以来，从日本法西斯起，里里外外，有多少人不愿意将这惊天动地的武装侵略定义为法西斯性的战争，而只愿轻轻地将它叫做“满洲事变”？在汪精卫秉政，执行着所谓“不扩大方针”，“睦邻政策”的时候，在关外是血海尸山，在关内是遗民泪尽，一年年的过去，在今天，我们之中也许已经有人淡忘了争取到“七七”这一天的经过是如何的九曲三回，千山万水了吧。但，作为一个和东北这块土地这些人民有过爱情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战争的日子中，也曾有人一再而三，企图以东北三千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作为少数人苟安和平的代价。我控诉这些人，我不止一次曾在我的剧作中“勉强地”插入了“九一八”和“东北”这些“非艺术”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我懂得感情是一匹难以御制的野马，所以听到东北的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经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这，在我只能说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一个偶然的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由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瘫痪的，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那么从那些敌人笔下所记录的材料，不是也已经够使我们远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原载《艺术志》创刊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

《芳草天涯》前记

“你没有写过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朋友们这样对我提议。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不承认这事实出于故意。

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

托尔斯泰说：“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我同意他的话，但我不像他一般的绝望和悲观。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来”这两个字，因为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

我望着天痴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吧。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同意托翁的话，而把“现今的”恋爱定义为人类生活中最苦痛的悲剧的。

我谴责自己，我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亲爱的读者，在叙述人生的这些愚蠢和悲愁时，我是带着眼泪的。

一九四五年春

（原载《芳草天涯》，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学出版社出版。）

《野草》复刊私语

《野草》这本小小的杂志六年前在桂林发刊，那时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与诅咒。把自己的身分规定为自然生长的野草而不愿意做点缀沙龙的盆花，这一念就决定了这个小刊物的六年来的运命。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几年的岁月就在这种不断的摧残下面支持过来，一九四三年以后，他们也居然做到了不让我们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现在，我们不又从瓦砾堆中透生一棵新芽了么？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诅咒，我们不相信暴君们的压制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无声。当然，这一次的发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复刊号。）

《劫余随笔》前记

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里，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小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

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蜗楼随笔》后记

这里搜集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所写的文章，大半都是应杂志报纸编者的要求而写，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最重大的年头，但这一年我主要的时间几乎完全消费于琐碎的“事务工作”。过去若干年来勉强做到每天有一两小时读书和思索的时间，这一年连这习惯也打破了，几次想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让我能切实地读一点书，反省一下过去，缺点和弱点，但这希望都没有实现，生活像“车轮上的洋老鼠”，整天的跑着。结果呢，依旧在原来的位置，表面上的动，成了实质上的停滞。

因此，在这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勉强由编者先生们逼出来的，过后看看觉得很没有意思。一则由于答应了给人间书屋一部稿子无法交卷，二则由于洪逾、华嘉二兄已经把这几篇稿子剪辑起来，所以只能让这毫无分量的集子出版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

（原载《蜗楼随笔》，一九四九年五月香港人间书屋出版。）

《考验》后记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尽管这些年来一天也不曾偷闲，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可是每次参加戏剧界集会，或者听到戏剧界朋友抱怨没有“新戏”可演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不想写么？不，我还常常有创作的冲动；没有时间写么？也不，过去我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下来的。那么，真的如某些先生们所说，我的创造欲求被“理论的刀子”和“棍子”“吓哑”了么？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九年来自己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懂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作品原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我的剧作选中，我写过一篇代序，里面说：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

这几句话是我自己长期摸索之后所得到的体会，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我自己对于过去那些作品的看法。

解放之后，我一直在党委和行政机关工作，我有了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开始明确和逐步解决了多年以来早该解决而迄未解决的问题。总路线学习和工作实践再一次唤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在一九五三年初夏写下了这个剧本的初稿。翌年三月，学习了“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作了一次修改，作为一个“未定稿”打印出来，征询了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再经过一次改作，就由几位同志热心的怂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明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或者说应该说是有许多缺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发表了它。我清醒地认识到，同志们怂恿我发表是为了对一个九年不写剧本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而对我自己来说，则只是想借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适应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以为，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微弱的积极作用，那么，尽管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尽管可能被嘲骂为“政治语言”和“公式概念”，也就“非所计”了。

值得感谢的是发表之后我就陆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批评，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有替我设想得非常周到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真正来自群众的激励和批评。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讨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和上面所说的读者们的意见，我又对方克和丁纬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了若干的修改，但是，限于认识和生活，限于时间和能力，这只是极其浮浅的修补，而不可能作较大和较深的重塑了。

感谢所有关心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单行本出版之后，还希望能得到更多、更严正的批评。

一九五五年一月

（原载《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杂文与政论》后记

抗日战争时期，我写过五六本杂文集子，在桂林和重庆编辑的，几乎全被禁止出版，连原稿也丢失了，在香港出过两本，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了。杂文与政论，我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自己很不珍惜，上面所说的那些集子，也都是报社和出版社的同志代我编辑的，现在，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解放以来，这一类文章写得少了，但也没有完全搁笔。去冬，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个集子，凑集起来，也只是薄薄的一本。我自问并不懒散，也还经常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写得少，朋友们替我解释，说是忙的缘故，其实，这一类文章不是长篇大论，过去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写少了，不外是旁人不来逼，和自己不通自己的缘故。

现在搜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事实上都是逼出来的。报社和刊物出了题目叫我写，限期截稿，逼着写了，有时候内心激动，觉得非写不可，也就写出来了。由于这样，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急就章”。文章的好坏、工拙，表现着作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在此，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没有伪饰，出自真情。

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
(载《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夏衍选集》代序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写了十一个多幕剧。在这里选了的五个，是上演次数较多，而比较为观众所喜爱的。

写这些剧本的时期正在抗日战争前后，所以十一个剧本中，除出两个历史剧和一个外国名著的改编之外，内容全和抗日战争有关，剧中人物，则由于自己生活圈子的狭窄，写的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

一九四一年我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寒》，出版之后有位读者给我写信，提出了为什么我的作品着重地写知识分子而没有写劳动群众的批评。这封信还谈到许多我们时代的小说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当时我写了下面这样一封复信。

你读了许多新文艺作品而疑问到为什么具备了进步世界观的新文艺作者也会那样深挚地对旧社会的事物和典型性格“钟情”？这理由，在理论上是不难回答的。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说过：

“受两种历史力量——小市民阶层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吸引以后，人们显然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他们大声地嚷了许久，然而我不感觉到他们会安心地相信：一条非常固定的道路已经断然地、坚决地被选定了，虽然这条道路是历史充分地指示出来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普遍地发生这种情绪的与理智的根源的分裂？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里面一针见血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继承的遗产太痛苦了。人民对于新文化的要求毕竟还不如对新政治、新经济那样热心。他们对旧文化也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的仇恨。相反地，还留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经验也还不足。因此，这不但是一场艰难的，而简直说得上是一场微妙的战争。”

由于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背负着“太痛苦了”的“遗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在理智上接受了新世界观，可是他们的“灵魂深处”，却依然还保存着一个难攻不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因此，对于一个向旧政治、旧经济进攻的政治斗争，他们可以带着满怀的仇恨去作不屈的斗争，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和艺术的问题，——当斗争的对象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的时候，那么不仅他们的斗志会缓和下来，而且甚至会理智上早已否定了的事象和人物开始同情和眷恋。你说我“鞭挞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带着眼泪”，我除出同意你的说法之外，觉得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的缘故，由于在今后的残酷斗争中，他们可以也必须和革命主力长期合作的缘故，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那么对他们鞭挞的时候还“带着眼泪”，和他们斗争的时候不忘记团结，也许还是必要而应该的；在这种场合，真真的错误所在我以为只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由于作者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对一切旧时代的残余还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我们只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察觉：当我们的笔尖接触到小有产者纤细、优美、温情、洗练、诡谲、高傲，乃至避忌实际斗争的所谓“洁癖”、“孤独”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仅一点也不带着憎恶和反感，而且还毫不掩饰地抱着同情、赞叹和欣赏的态度么？对于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那篇高尔基的论文中，也说得非常明白：

“青年作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强大力量来鼓舞读者憎恨过去。因此，他们不但不使读者离开过去，而且——在我看来——不断地使读者留恋过去，在读者的记忆中巩固、确定

和保存过去。

“要很好地说明和了解过去那些恶毒的、磨难人的卑鄙龌龊的事情，就必须发展自己从现在的成就的高处、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处注视过去的才能。这种高度的观点一定会、而且将会激发起那种骄傲的、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创立我们所必须的新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不用说，只有靠社会主义经验的事实才能够创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白透彻，更加具体：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在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他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由于此，假如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作家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坚决完全干脆地转移到“方生”的工农兵方面，而还要保留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停留在“未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理论上口头上不能和实际上、行动上合一，该爱不能真爱，该恨不能真恨，该鞭挞不能尽情地鞭挞，该歌颂不能尽情地歌颂，那么很自然的写出来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强烈的力量，去“唤起读者对过去的憎恶”了。

假如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假如我们认识了这依旧是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那么接着你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应写些什么”也就容易解决了。我想，这不单是题材的问题，而依旧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可以写太阳，我们也可以写乌云，我们可以写“方生”的春天，我们也可以写“未死”的寒冷，我们可以写新，我们也可以写旧。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使写同一个事象同一种人物，常常要因为写作者的立场之不同而在读者之中唤起不同的印象效果。高尔基曾经慨叹过人民力量迅速发展的过程在文学上反映得非常的微弱，他说：“这个微弱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乃是由于这事实：文学的注意力主要地放置在正在死亡的东西上，而没有放置在已经开始生长和活动的东西上”的缘故。他用一个“对于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的年轻医生”来比喻了这样的作家，他说：

“也许，并不是为着安慰那快死的人，而是为着解决他自己个人的问题，他向着没有希望的病人说，病人惯于生活的那些条件仍然存在：古旧的偏僻的地区还是完整的，那可以使人悠然生活的古老时代也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般讲来，许许多多的‘消极现象’还存在着，它们甚至比那些具有相反性质的现象还占优势，并且在走向新的生活的人们的道路上堆积着种种不同的障碍。”

这些旧事象还存在着是不是真实呢？高尔基回答说：“当然这是真理，而且对于一

切丑恶的存在的指出，都是对于真理的服务”，问题只在于这个医生站在什么立场，对于自己的医术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坚决地诊断这个病人的“没有希望”，和对于这些“未死”的东西有没有好感和爱惜的地方。假如“他自己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一方面认定了这个“未死”的必死，“未死”只不过是“暂时起作用”的现象，对它再没有任何的眷恋；另一方面认定了“方生”的必生必长，现在的“萌芽状态”正是明天迅速长成的起点，它才是“永远起作用”的东西，而对它充满了爱和热望，那么，当他的笔尖接触到新的和旧的“方生”和“未死”的时候，他的好恶，他的爱憎，哪一方面应该催生，哪一方面应该送葬，不也就随带着可以决定了么？

真的，文艺工作者的事业是困难而又复杂的事业。我们要正确地诊断出这个“未死”而必死者的病症，指出他的传染性而唤起一般人的警惕、提防，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无保留地参加“方生”的一面，全心全力地去同情他们，歌颂他们，肯定他们。毫无疑问，当我们要描写新生力量的时候，必然地会接触到腐朽的一面；在此，我们就“必须学习观察，在旧的腐败物冒烟的余烬中，未来的火花是在怎样的爆发起来，怎样的越烧越旺。”（高尔基：《论现实》）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任何以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自诩的人，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是决不会肯定“未死”而否定“方生”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太过于被动地遵从着客观主义的传统，没有鲜明的立场，不能狠心地斩断对于旧社会旧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描写陈旧的真理当中没有指出新的真理，没有指出在崩溃的古老事件的混乱中人的内心已经产生的那种新的东西”。更没有用最大的力量去指出这种新的东西已经存在，已经长成，而且，也只有这种新的东西才能起永远的作用和不可战胜而已。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有机会重新把自己作品的病源检查了一遍，并请你致意参加这一讨论的朋友，我感谢他们的指教和关切（见我的《蜗楼随笔》）。

以上所说，我想完全可以适用于这儿所选的几个剧本，所以转录于此，作为这本书的代序。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这条路，是漫漫而修长的，让我们上下求索，继续前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明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一九五九年五月
（原载《夏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出版。）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去投稿，记得大概是我十六岁那一年。中学生写的“作文”，被录用的机会当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时报》的副刊录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书局书券二角”，就是凭这张券，可以到有正书局去买两毛钱的书。五四运动之后，我参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随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但是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好像还在《觉悟》上发表过几篇，可是连题目也记不起了。

一九二〇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除出一篇之外，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〇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略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六七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

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另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原载《夏衍杂文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

《夏衍论创作》自序

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里，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

（原载

《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

《蜗楼随笔》自序

一九八〇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一九四一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这个专栏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十一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三十五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今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三十五年，所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所谓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得不多。据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不仅读过艾奇逊白皮书的人不多，甚至连毛泽东同志为此而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似乎也渐渐淡忘了。可是，我们淡忘了，人家却“永远不会忘记”“多年的盟友”。我写的这些杂文，正好是在这个暗礁的形成时刻，所以读了《历史的考验》之后，我的那些拙文也许可以向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和

感性知识。

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算是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

（原载《蜗楼随笔》，人民日报
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

版。）

《杂碎集》自序

翻翻英文词典，就会看到 chop—suey 这个怪字，它是中国话“杂碎”的音译，意思是“什锦饭”或“炒什锦”。我为了好奇，在西菜馆试尝过一次，原来就是上海的“盖浇饭”，即在米饭上加一点肉丝、青菜之类的“浇头”而已。这是一种廉价的“中国菜”，但有一次我在一家瑞士高级餐馆的菜单上，却看到过“李鸿章杂碎”这样一味名菜，这大概是供高级洋人品尝的中国菜吧。现在，中国菜馆，普及到全世界，鱼翅海参，乃至满汉全席都有，“杂碎”这个名称，大概不久就会消失了吧。

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我的“近作”。去年冬，他们又约我编近年来写的文章，叫它“近作二集”吧，那就得“三集”、“四集”地出下去，可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书名，再翻阅了一下那些文章，觉得又杂又碎，于是就想起了“杂碎”。有人说不如用“什锦”，那就带点广告性了，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急就文章，什而无锦，最多也只能说是中档品，用“什锦”，就不免过誉了。

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报刊编辑逼出来的，其中一部分书简，也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催”出来的。我这个人做了半辈子的统战工作，五湖四海，九流三教，认识的人不少，经过十年内乱，一位朋友去世，或者平反昭雪，编者就会要我写点悼念文章，我长期在文艺界打杂，于是文艺团体开会闭幕，出文集，会有人逼着我写稿。催和逼，“文革”之前，我是不怕的，可是年逾八旬之后，接到“务请×日前交稿”、“已给你留了×千字的版面”，乃至“过了期编辑部要被罚款”之类的函电，我的心情就不是愉快而是苦恼了。我看过一幅题为“老正兴”的漫画，是讽刺报刊编者看不起青年作家，专登老作家的作品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常有的，我假如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么这个集子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两倍吧。我想，现在是“老正兴”出盘或者停业的时候了。

这些又杂又碎的东西大都写于一九八一年以后，长短不一，涉及的面又杂，所以很难按写作年月或内容性质来编排，我只粗略整理了一下，把序跋、书简、怀人和有关电影的分别拼凑在一起，其余的，只能让它当拼盘了。在书简这一辑中，除了“答友人书”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外，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底稿，文责自负，不再征求受信者的同意了。

一九八三年春

（原载《杂碎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第一辑

《懒寻旧梦录》自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

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一九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里所说的对立面，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

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〇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〇〇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转辗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弢、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欢喜，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一九八四年冬

（原载《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

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一

《懒寻旧梦录》的部分章节经阿部幸夫先生翻译，即将由东方书店出版。去秋译者来京，要我写一篇序言，向日本读者讲几句话。青年时期我在日本呆过七年，垂暮之年又担当过中日友好协会的工作，要讲的话很多，但往事如烟，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我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今年八十七岁。这一段时期对中国、对日本，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时代。我出世的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小学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毕业前一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二十岁那一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到日本求学。如所周知，这时候我的祖国已经衰亡到了快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学既读“诗云”、“子曰”，也学过地理、历史；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懂得了一点国家和世界时事，少年人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解不开的疑问：教科书上说希腊、印度、埃及都是文明古国，现在都衰落和亡国了，中国还没有亡，但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而同在亚洲，为什么印度会亡国，中国一再受到侵略，而国土小得多的日本，却蒸蒸日上，可以战胜俄国、中国，而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成功，为什么三十年之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就失败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带着一肚子不能回答的问题，冒冒失失地到了日本。

本世纪初，每年都有七八千乃至一万人去日留学，要考取官费是困难的。可是我拚命一搏，居然不到一年就考进了素以严格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九州工业大学）。起初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工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动摇了。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起码的现代化工业，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我在“明专”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时中国不仅不能制造发电机、变压器，连最普通的机器配件也都被外国厂商所垄断，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成套设备要靠进口，连安装、维修都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手里。在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在工科大学毕业了，当上了工程师，究竟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呢？中国现代有两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也都是在日本学医的。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感觉到治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先要治中国人民的贫穷、愚昧和甘为奴隶的“国民性”。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和他们相似的道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当然，我的弃工从文，可能和“明专”的校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有点关系，我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我的思想开阔了，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十年代中叶的日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秋田雨雀、藤森成吉和大山郁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感受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顽强拼搏的“顽张”（Ganbaru）精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阿倍仲麻吕、小野妹子 and 空海法师，日本人民也不会忘记鉴真法师、朱舜水和黄遵宪。在古代，日本多次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化、艺术和工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废弃了锁国政策，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锐意改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成为一个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从这时起，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人志士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彭湃，终身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廖承志，中国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驰誉世界的大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都是本世纪初和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生。

两年前，我看了一部为纪念空海法师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而摄制的日本电影《空海》。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当空海随遣唐使留学长安，学成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对大唐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唐朝像一只老虎，不论怎样硬的东西，他都能把它嚼碎，吞下去，消化掉。”这是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我想，到了二十世纪，用这句话来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想法，也许是更恰当了。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来的人，我觉得日本民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敢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能够把它嚼碎、吞下和消化，而且还适应本民族的需要把它融化加工，变成为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又通过中国，引进了印度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日本特有的人生哲学。思想意识上如此，文化、艺术、技术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书法、围棋、茶道乃至许多民间习俗，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过千百年的溶化，提炼，加工，到了现代，都已经超过中国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这样的技术就更多了。汽车和电子工业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现在，日本的丰田、日产已经赶上乃至超过了美国的福特、克雷斯勒和西德的奔驰。日本的电视机、录像机都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现在，美国正忧心忡忡，深怕日本会抢先生产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走在它的前面。日本民族对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有一种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了。

中国和日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决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作则互利，对立则两伤。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仅亲身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伤痛，也多少知道一点战争中和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人民承受过的灾难。因此，珍重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两国人民更友好、更合作的时代，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提到文化交流和民族传统的关系，很自然地想起了许多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战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一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二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能真的会迫使他们“一亿玉碎”。可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太片面了。一九四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在新加坡看一本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

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迪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迪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近邻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拚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九八七年元月

（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致读者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二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

《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九八二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一九〇〇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〇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记者生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四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奉命回上海办《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不久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参加了《南侨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为止。

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一九八一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亘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

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

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郭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怒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一九四〇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

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是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来的一九八八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十周年，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我在这里祈愿：

让世界永远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写于一九八七年冬日
(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
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第二辑

《小小十年》

这是一部以革命为穿插的言情小说。

梗概很简单，——就是主人公叶，从小就爱上了他的女同学茵茵，但是他的祖父，却给他订下了一个名义上的“妻”；同时，茵茵也由她的家庭许给了叶的同学泌。叶对于茵的爱着，还是热烈，但是茵，终以“环境太坏”的缘故，拒否了主人公的爱情。主人公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妻’”，同时觉得“四年的单恋”，也“换不到她（茵茵）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所以，便“愿马革裹尸”，和“革命的敌人在战场上肉搏”，于是他便到广州去“考黄埔”。此后，经过了入伍，出发，战争，革命失败，而仍旧流浪到上海，——这时候，他还是继续地和茵茵通信。他的母亲用假病骗他回去，在路上，他去访问茵茵的故乡，在那里，茵茵方才接受了他的爱情。——但是，回到“家”乡，他的“妻子”已经住在他的家里。经过了不少的周折，他终于挣扎出来，陶醉在茵茵的怀里。但是，茵的“未婚夫”泌，还是坚决地跟在茵的后面，到后来，终于突然的使茵写了一封对他断交的信。于是，主人公完全绝望。发出了“哈哈！爱人！美丽的天使！未婚的爱妻！”——的 Hysterical 的惨笑，放出了“我疑问，我疑问一切！”的悲声。全书“终结”之后，加上一章“重上征途”，表示出主人公“终结过去”，和“展开未来”的决心。……

和上述的梗概一样，革命的描写，完全淹没在恋爱的大海里面。使我们读完这一部书的，只是对于男女主人公恋爱的关心，而绝对不是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我同意于鲁迅的“小引”：——这是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

和作者在“后记”上说的一样，这是四十个小篇的集合。形式上，可以说是一种追忆的摘记，——是一种以年代的顺序而写下的笔记。对于这些，我不想参加任何的意见。但是从一个完全的作品上看来，上卷和下卷之间，似乎缺少着一种有机性的统一。上卷的后半，大部分是描写着主人公的革命时代，但是读者的兴味，都已经集中在主人公和 Heroine 之间的恋爱问题，所以对于这种革命的描写，只感到一种插话的兴味。对于恋爱与革命的关联，——以及和这个问题直接间接地接触着的一联的问题，作者都不曾为着一定的目标，而赋予一种艺术的，具象的解决。——对于这些，作者单单直接地发表了一些说教式的结论。在最后一章，作者也只是漠然的愤恨，漠然的忏悔，他不曾说明这种应该愤恨的社会制度和恋爱问题的关系，——就是：在现在社会秩序之下，和其他一切被夺取了的一样，恋爱也是无××级被掠夺了的东西。更进一步，就是他不曾说明恋爱问题的解决，必然的也是非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合致不可——的问题。

在内容，我觉得遗憾的，就是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写成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物！主人公到广东去，不是内心有了革命的要求，而只是为着对于婚姻的不能解决，和“四年的单恋，换不到一张小小的照片”。此后，对于“考黄埔”，对于“入伍”，对于“出发”，也不是出于自发的愿望，而由于环境的压迫。他最初想考中大，因为“国民政府收入充裕而免费”，同时“北京著名的教授为了犯着‘三一八’惨案的嫌疑”而跑到了中大。他考黄埔，同样的不是为着想要革命，而是为着“求学”。主人公在革命的怒潮中如何

的不忘“求学”，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一节里面看得出来。

在南昌总算住得很久很久了，雪也已经下过，英勇的工农大会常常在大校场里开，使我们看见都感到紧张和兴奋。然而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升学问题。这问题不晓得为什么竟迁延得如此之久？我们真有些不解了……（页一八八）

在此，我们并不想否定“求学”的重要，但是，和主人公的那种“怕吃苦”的性格对照地观察起来，总觉得这种希望求学的背面，总不免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那里作祟了。至于主人公的“怕吃苦”，那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事情。

我心里以为到黄埔是太苦的事。（页九九）

我最短了，站在最后的一个。……然而又暗想，短也有好处，因为自己太短了连长也许不把吃苦的事情给我做吧。（页一一〇）

最初，我度着这样入伍生活时，在肉体上真觉得有些痛苦。这使我回忆起过去生活的安适，也滴过几点不该滴的清泪。尤其是每天黎明，听了“达达……的”起床号时，真是比“死”还要难过几倍。（页一一一）

因为主人公的意志薄弱，和作者不能将事件有机地联系于当时的情势，所以作者虽则也曾描写了些革命的高潮，群众的力量，——但是这些仍旧不能使读者的心灵兴奋，而使他们走上了正确而革命的途程！他们的注意，和主人公因为“领袖”们叛变而流浪到上海一样，也从集团的争斗，转换到主人公个人的恋爱问题。假使，艺术的目的是在唤醒读者的空想将他们的感情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组织起来，而使他们认识一条正当的出路，那么，这一篇作品，即使没有和作者的意图相反的效果，最少，可以说和作者所期待的效果，已经相差得很远很远的了。

在暴露封建社会之下的买卖婚姻之矛盾这一点上说来，这一篇作品当然并不是全无价值，但是，紧要的一点，就是恋爱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一致这一点，作者不曾明白地表示出来。在作品里，主人公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尽可能的想要追求恋爱的实现，但是这种追求，结果是一场幻梦。使这种恋爱失败的，女主人公的意志薄弱，当然是一个原因，但这决不是原因的全部。在这一点，作者也不曾将茵茵不能不屈从的那种社会的机构用艺术的手法描写出来。——虽则稍稍有了一点直接的说明。

其次，在革命战阵中的这位战士，对于同僚的兵士（除出几个黄埔的同学之外），对于广大的市民，——对于用群集的力量来夺回了汉口租界的大众，全没有一点联系，——作者并不企图，将主人公和包围在他身体的一切世界，构成一个有机地结合了的个体。所以故事的中心，——主人公的恋爱事件——显然地变成了和事件的背景游离，而使后者变成了前者的附属。在那个急速度进展的大时代（作者只将他当作“小小十年”，而我们却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空前的伟大时代。）里面，作者将主人公写成一个超大众超阶级的人物。否则，这位“已经（！）——为大众的幸福而斗争”（鲁迅序）的斗士，即使根据他自身的体验，也该写些更深刻更现实的场面出来。

最后，我们还得观察一下作者对于革命和恋爱的见解。

在原则上，我们赞同主人公的主张。他说：“我们革命者并不完全反对

恋爱。我们仅仅是反对恋爱妨碍了革命的工作。”（页三八七）但是，事实上如何呢？主人公一方面尽是这样的主张，他方面还是沉湎在接吻和拥抱的世界里面。紧接在这种主张之后的“看茵茵去”一章，描写恋爱生活至六十页之多！作者假使以为这个长期间的恋爱生活也不曾妨碍革命工作，那么我们没有话说，否则这里主人公最少是犯了虚伪和对革命不忠实的嫌疑。“第一，艺术家非诚实不可！”（罗那却尔斯基）这种主张和行动的分离，我以为大多数的读者都会感到矛盾，而灭杀了作品的效果的。

此外，主人公还有一节充满了天真和爱娇的自己辩护。他说：恋爱茵茵，为着不愿意使茵茵走到敌人的方面去，若是茵茵和他（主人公）的恋爱成功，那么可以使她也担负革命的工作。如果，他恋爱茵茵，就是把革命（?!）的势力扩大了！（恕我不抄写原文了，见原书页三八八）——换句话说，就是主人公将爱人当作了唯一的宣传和鼓动的对象！他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书本子里面，我们仅看见了那么接吻，拥抱！这是一件值得惊奇的发见！我们知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紧赶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在那种时代，我们以为除出茵茵之外，似乎还存整千整万的群众需要主人公一般有革命经验和理解的人物去宣传和鼓励。什么也不知道的读者，或许要觉得彷徨：对茵茵的工作和对大众的工作，不知哪一方重要？假使说，对茵茵的比較的重要些，那工作者又明明的写着：——“当然，革命要紧些！”——（页三八七）。无论如何，茵茵真是一个太贵重的对象了！

混沌，——有些地方，我们真觉得主人公的见解，有点混沌，他是一个革命的青年，是一个主张打破一切封建势力和现存组织的勇士，一方面呢，他不仅要想茵茵做他的“恋人”，而且想茵茵做他的“妻子”。

一路上，我们听到娶亲的地方有好几处。茵茵虽然不大动心，但总觉得也有些欣羨。就是我，也欣羨的。我心里想，不论那顶轿子里，倘使坐着茵茵，而又向我家里抬，那，我真快活死了……（页三九九）

……确实，我以为茵茵几乎是我的妻了！（页四三七）

有了肉体关系的“恋人”和“妻子”不知在新时代人的眼中还有什么区别？否则为什么主人公一定要斤斤于妻和恋人的区分？

重复地说一句，——这是一部以革命为穿插的言情小说。滤去了游离性的革命的 Impurity。在滤纸上剩下来的只是些“情书一束”的 Amorphism。

（原载《拓荒者》，一九三〇年第一卷第一期。

《小小十年》，叶永榛著长篇小说。）

关于《蟹工船》

假使有人问：最近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之前，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一位作家的存在。其实，在很久之前，山田清三郎编辑的小说俱乐部及新兴文学杂志上，已经发表过几篇作品。他是一个励精刻苦的作家，也是一个在冰雪的北海道地方，为着普罗列塔利亚的胜利和解放，苦心惨淡在那里从事组织运动的先锋。

《蟹工船》在本年五、六月号的《战旗》杂志发表，确是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上的一桩划时代的事件。这一篇作品，不仅事实上痛快地回答了前田河广一郎一党所统率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文学集团文艺战线派的恶意而傲慢的要求，——就是向着战旗派说：“不要多讲理论了，拿出作品来看吧！”的那种逃避理论斗争的要求，而且在暴露文学上，得到了比辛克莱的《屠场》更加深刻，更加伟大的收获。

“蟹工船”（Kani Kosen）是一种“工船”（工场船）而不是“航船”，所以这种船舶，并不需要适合于航海法的规定，“系留了二十多年的旧船，——除出让它沉没之外什么用处都没有的那种梅毒患者一般残败的老船，不知羞耻地在表面搽了一层浓厚的化妆”，便不管船员死活地将他开到了函馆地方。在那里，在大日本帝国军舰的保护之下，从事于“俄国领海”之内的渔捞事业。据渔业监督的训示，“这种蟹工船事业，不单是一个公司的营利事业，而是国际上的一大问题。”——就是：这是俄国鬼子和“大日本男儿”比较长短的试验，所以“为着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他们便非抛弃了家里的妻子，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在这种狂涛怒吼的北海洋上“奋斗”不可的了。

蟹工船虽则叫做“工船”，但是因为它在海洋上面工作，所以并没有工场法的拘束。在那里，监督可以拿了手枪命令，可以将逃匿的杂夫禁死在厕所里面，可以将学生出身的渔夫缚死在船栏上面。因为，“在北海上面死掉几个工人，对于坐在丸内大厦里面的公司的老板，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当博光丸接到了秩父丸遇险的时候，监督宁可牺牲了几百条的性命，而不愿意耽误了自己的船期。在榨取者的眼里看来，“这些都是公司的佣船，而且已经付了租钱”，所以假使不去捕蟹而去救人，“那么一礼拜的工夫，便会完全消费”。况且，“秩父丸已经保了船价以上的保险，所以让它沉了，公司反而得到好处。”

这里，有一节可以将读者的感情压碎一般的描写：

这种时候还要说什么不相干的人情，这样还能够和外国较胜败吗？——监督说着，用力的咬了一下嘴唇，一口痰沫唾在地上。

在无线电报室内：不断的发出了××的，青白的火花。大家为着知道秩父丸的经过，都跑到电报室来。

“你看，这样的在打电报呢！——渐渐的快起来了！”

电报室隔着，对船长和监督说明。……

Ji——Ji——i，拖长了尾声，发出火花。忽然，声音停了。这一瞬间，大家的心里，

感到了钝重的打击。电报生狼狈地旋着机械，弄着开关，但是，只有这一次，以后便没有信号来了。

电报生扭着身子，将回转椅子旋转身来。

“ 沉没！—— ”

头上降下了受信器，用低声说：“ 船员四百二十五人，这是最后了！没有救助的希望！S，O，S，S，O，S，这样的反复了两三次，此后便没有声音了。—— ”

在这种血腥臭和蟹腥臭混渚着的冰冻也似的空气里面，渔夫们渐渐地知道了“ 团结 ” 的事情。是的，只有团结，他们才能够不死在北海上面！“ 一个一个的，那是不行的，危险的！但是，在他们那面，连船长在内，不是还不够十个人吗？我们呢，差不多有四百个！四百个人团结起来，一切还不是我们的吗？四百个对十个！格斗吗？那么干一下吧！ ”

“ 不愿死的都来！ ” ——这是学生出身的工人所发见的宣传标语！对的，这也就是鼓动成千成万的工农，使他前仆后继地去完成解放争斗的口号！

这样，他们终于一致地罢工，他们终于举出了代表拥到监督室去要求，痛快地打倒了监督，一时占领了全船。但是，这时候，“ 不是民众之友人的帝国军舰 ”，已经监视在旁边，上了刺刀的水兵，已经好像海贼一般的一个个的跳上船来！

于是，代表——被当做不忠，不逞，仿效俄国鬼子的国贼的代表被捕，事件就是“ 这样简单地终结了！ ”

这篇小说不在描写个人，而在描写一个集团，所以指导者的被捕，不就是作品自身的终结。剩下的大众，因为这种训练，方才知道了：

“ 在我们，除出我们自己之外，什么帮手都没有的！现在方才知道！ ”

“ 什么帝国军舰，顶多也不过是大财主的走狗！国民的友人？呸！放你的屁！ ”

他们知道，仅靠代表，是不行的，他们为着“ 要活 ”，为着“ 不愿死 ”，所以“ 老实说，结果怎样，已经管不得了！死或者活，所以—— ”

“ 他们起来！重新再来一次！ ”

使一切布尔乔亚批评家也发出了惊异的叹声的这一篇作品的力量，存在于他的主题和题材里面。一定数量的利润，阻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路，他们为着维持自己阶级的生长，为着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使命，“ 不论什么事情都做 ”、“ 不论什么地方都去 ” 地，伸展到了靠近北极的海上。——这本小说，很调和地将每个工人的生活要求和历史的事件之进展，织成了一种特异的织物，而在这种纤细的经纬结合里面，储藏了无限的力量。作品里面，没有一定的主人公，没有表示出一个特异的性格，但是，我们“ 全体的 ” 地看时，立刻可以看出，在这种血肉相搏的斗争里面，有两个代表的典型，就是，一个是噩梦里面的魔鬼一般张牙舞爪地笼罩在北海上面的帝国主义，一个是在这种死的胁威之下不断地生长急速地认识了自己阶级的力量的勤劳大众！许多赤裸裸的描写，——例如描写那些饥渴于女性的渔夫的性生活的场面——粗俗的字句，乃至土俗的言语，这些，或许都足以使我们唯美主义批评家和绅士淑女们的文学（？）爱好者龁蹙不堪，但是，我们假使承认，艺术的使命是在鼓动读者的感情，艺术的目的是在兴奋读者的心灵，使他们获得光明，确实有益的意识，而使他们从这种意识转换到组织化了的行动，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荐：《蟹工船》是一部普洛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

(原载《拓荒者》，一九三〇年
第一卷第一期。)

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五日》

假使照普通方法，依据作品内在的事件，来做一篇《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五日》的介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不，也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完的事情。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没有一种贯穿作品全体而使内容展开的内在的事件。内容，只是关联于所谓“三·一五”事件的一联事象和一群人物的描写。同时这种人物和事象之间，也没有构图的联系，而只是一件件地罗列着的多元的描写。一个普洛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作家，当然不能像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一样，毫无选择地单从“客观”的立场，来描写一切周围的现实，但是，假使我们认定了新写实主义是阶级地艺术地表现现实的手段，那么我们当然也不必局限于自己的主观，而将现实的事象牵强地粉饰，空想地改造。“三·一五”事件，是一件现实地决定了事变，当时的前卫——先锋——分子的情绪与气氛，也是客观地赋予了的内容。所以写实主义者的作者没有构图地，多元地，将这种事件和人物描写出来，非但不会灭杀他作品的价值，——而且，在以这种事件为题材的作品里面，或许可以说开拓了一条新的进路。

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五日，谁都知道这是日本社会革命史上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日。这一天清晨五时，田中军阀内阁，命令全国军警，从全国的工场，农村，学校，职场里面，一齐的检举了几千个革命的前卫分子。他们用尽了一切诬告，伪证，私刑，拷问……等等卑劣狠毒的手段，造成了所谓“某种大事件”的日本×××事件。当时，军阀布尔乔亚的政府，恐怕全国民众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而引起了对于他们不利的事变，所以禁止一切新闻杂志的揭载，而想利用拷问和伪造出来的“口供”来欺骗全国的人民。这一篇作品，就是以这种历史的事变为题材，而在革命的文艺杂志《战旗》一九二八年十一期十二期发表的作品。因为过分深刻地暴露了“留置场”（拘留所）和警察官的不法和残暴，所以这两期的杂志，都受了发卖禁止的处罚。后来和《蟹工船》合订单行本发行，发卖当日也就受了“发禁”的命令。这一篇在日本普洛列塔利亚文学上划时期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在他本国公开的机会，这一点，更足以证明，狂暴的反动官宪，如何的震慑于这一篇战斗的作品的面前。

藏原惟人批评这一篇作品说：

在《战旗》的作品里面，我们非第一个举出小林多喜二不可。他的《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五日》，已经有了许多人的批评，关于他的缺点，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议论。……这篇作品虽则有了许多的缺点，但是在日本普洛列塔利亚文学发达的历史上面，依然不失为一篇划时代的作品。第一，这篇作品开创的在伟大的规模里面，描写了我国革命的工人生活；第二，不描写死了的类型，而描写了活着的人间。……

在别一个地方，更切实地说：

以北海道×××检举事件为中心，描写了战士们的各种的典型，和各种的生活。这种素描，不是一般常有的那种概念的，英雄的描写，而是具有各种长处和缺陷的活着的人物的实写。……

下面，节译出几节精彩的描写，当作内容的介绍：

最初，就是几个战士被检束去的描写，和三个不同的他们的家庭。

第一，就是主人公（？）龙吉被抓去当时的情景。

忽然，幸子好像懂了，而且，好像一切都是懂了。她想，这一定是“列×”了！他们，都是为着列×的缘故了。父亲用功的房间里面，贴着许许多多的××的照相。他的相貌，和学校里的那个秃了头的叫做吉田的佣人，完全一样。而且——而且，工会的人们来的时候，父亲总和他们一起唱歌。幸子因为小孩子对于唱歌的敏感，比大人们更快的学会了“×旗歌”和“五一歌”了。……父亲决不是坏人，而且，决没有做坏事情的理由。所以，在幸子看来，这一定是“列×”和“×旗歌”的缘故了。——对的，一定是这个缘故了。

父亲站了起来。——幸子好像火烧的晚上一一般，牙齿格格地抖着。大家跟了出去。母亲的发了青的颜脸，在那里抖动。嘴唇，好像要说些什么话，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或许说了，但是幸子却不曾听见。……父亲整一整帽子，望着母亲。解开了背心上的一一个扣错了的纽扣，重新将他扣好。似乎很不镇定，再向母亲望了一眼。——父亲的身体一半走出门口的时候。

“好好的照管阿幸吧！……”

他用干哑的声音说着，勉强地呛了出来。……

第二个，是工会书记的工藤。

阿由从他长期间的生活，已经体验地知道了这些“可恶到了极点的东西”。尤其，自从丈夫进了工会之后，他们的事情，似乎更加明白了些。

……

家里的纸窗，已经剩了些木头格子。冷风吹送进来，但是没有买纸的铜钱。从工会里面，讨了一些《无产者新闻》和《劳动农民新闻》的报纸，一张张的贴在窗子上面。煽动的罢工的记事，和火一般的刺目的标题，横七竖八的贴在上面。阿由有空的时候，慢慢的读着。孩子们问着“这是什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读给他听。墙壁上面，胡乱的粘着许多选举当时用剩的广告，传单。渡和铃本到工藤家里来的时候，总是惊异地望着，说道“这才是我们的家庭”，而像孩子一般的欢喜。

……工藤坐起身来，穿了衣服。穿衣服的时候，觉得今番是恐怕不能很快的出来的了。这样，家里没有一钱的积蓄，一家大小，如何的过去？……

阿由帮着他，穿好了衣服。对他说：

“那么，去吧。”

“哦……”

“这次为着什么？你知道？”

他默然不响，但是过了一会，

“怎样，能够过下去吗？这次恐怕日子很长吧。”“将来？——不要紧。”

阿由照例的用着明快不有力的声调说。

虽则不很清楚，但是已经知道了一些的一个大的孩子，对父亲说：

“爸爸，去了就来。”

“这种人家，可真受不了。”警察吃惊地说，“好像平常的事情一样，全家的人都说着什么去了就来。”

“这一点事情就要哭喊，我们还能做运动吗？”……

工藤为着除掉心里阴郁的感情，狠狠地回复了一句。“这忘八！再多嘴，就打你！”

警察奇妙地气愤起来，怒吼了一句。

对于妻子，他想交附几句，但是不会说话的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当他想到妻子又要受苦的时候，奇妙地觉得有些沮丧起来。

“当真，总可以混过去的。”

阿由望着丈夫，再说了一句，丈夫，默然的点了点头。

最后，被运动者当作憎恶的对象的警察，究竟怎样呢？他们，也是被压迫的同伴，他们，也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从下面这一节描写里面看得出来：

……“哦，”警察好像仔细的想了一下，呆呆的站着。“……你想，这是想象不到的悲惨的生活！你，是做过教员的人，不妨和你讲一讲。昨天，觉得身体是无论如何也是受不了了，所以嘱咐了旁人，想要尽量的熟睡一下。哪里知道，正在这个时候，又是检举命令。没法子，勉勉强强地四个人走了出去。路上，我们谈起了罢工的事情。……”

“嘿，警察的罢工？”但是警察摆着非常认真的脸嘴，所以他立刻停止了自己的玩笑。

“说到罢工，你们这里尽有此道的专家，请你们，教就是了。……”

龙吉对于他的说话，深切地感到了兴味。

……………

所谓文明国的司法如何的黑暗，监狱生活如何的悲惨，以及被夺去了自由的人们如何的在那种“休养所”里锻炼他们铁一般的意志，那是只好让之于这本书的翻译，不能在这里列举了。引用一句惯用了的话吧：

——只要冬深，那是不愁春天不到来的。

（原载《拓荒者》，一九三〇年第一卷第二期。）

杨译《我的爸爸》序

几次拿起笔来我就感到心酸。这本书是杨潮（羊枣）在监狱里翻译的，原稿和盖着美国新闻处蓝印子的《现代文库》版原书都在我的桌上，可是书排成铅字，译者已经开过追悼会了。杨潮已经死了，这句话在我至今还好像不是事实，可是我在上海再看见他，他已经被装在一只木匣子里了。愤怒使我流不出眼泪，几次看见哭肿了眼睛的沈强，我甚至于还得装作十分平静，可是，当出版者要我在这译本面前写几句话的时候，拿起笔来我禁不住就落泪了。中国只有一个杨潮，杨潮只有一次好死，死了之后，他的声音笑貌，他的才华气概，他三十年来孜孜兀兀地用功努力，累积起来的学殖经验，他决心用这些来替中国人民做事的可能，就此不存在了，为什么那些坏蛋偏偏要虐杀杨潮一般的人物？为什么杨潮不死于日本侵略者而死于中国法西斯？那些用善良人民的鲜血来滋养自己的人，恐怕在他们虐杀了千万人的名字里面，早已记不起杨潮这个名字了吧，可是，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他的同时代的为着自己的民族运命而斗争过来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杨潮这个名字，他们是会以杨潮的受难，作为这个悲剧时代的象征的。

认识和不认识杨潮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才人，从此引申开去，人们就以为杨潮也许有什么奇矫的不平凡的性格，那么从他在牢中译出了克拉伦斯·戴氏的这本书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这想法的错误了。杨潮是一个平常而正直的人，唯其平常，所以和任何人一样的都有正常的喜怒哀乐。但是，也唯其正直，所以他不很世故，不很知道取巧逢迎。从我和他近十五年的交游，我觉得他的性格，是在豪爽任性之中带着强烈的不知道虚伪为何事的诚实。丝毫没有老庄气味，他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可是在中国，有了这样的性格就不能适应这个奇怪的社会，有了这样的性格就随时有丧生的危险了。

从这观点来看，杨潮爱这本书而把它译出来，就不是偶然了。戴氏的这本书成为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一直在使他的观众重新经历一次儿时生活，而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为什么这样一本平平凡凡的叙述家常的书能够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照常理，真应该是常道，真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而在今日中国，真就可以获罪，就可以致死，写在这儿我就只有黯然了。

算是侥幸，从牢狱里居然还译成了这么一本书，杨潮死了，他的译著永远不会死。杨潮死了，休息了，但是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译出这本书，还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的。

一九四五年

（原载《我的爸爸》，一九四六年生活书店出版
美·克拉伦斯·戴著，杨潮（羊枣）译。）

《夜店》回忆

柯灵、师陀二兄改编的《夜店》即将由苦干剧团演出，在剧运低迷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喜讯。中国新剧运动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而三十年来居然不曾有人上演过这一出世界名剧。现在，这一缺陷终于由柯灵、师陀二兄的名改作与佐临兄的名导演而填补了。

说起来这出戏也着实和我有过一些因缘。一九三〇年我曾翻译过它，当时直译《下层》，和高尔基其他两个剧本《太阳儿》、《敌人》合成高尔基戏曲集，由西谛兄介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排校将竣，“一·二八”战事爆发，这书的原稿遭了火葬，就一直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此后，左明兄几次想演这个剧本，和我商谈过多次，也曾代他奔走计划，接洽上演关系和筹钱，可是在当时，上演这么一出外国的冷门戏终于是一个冒险，所以直到“八一三”战起一直没有成功。

现在抗战胜利，这名剧经过了完璧的改作，已经有了在上海和观众见面的机会，我相信，除出广大的戏剧爱好者之外，去年病逝汉中的左明兄有知，也将引为慰事的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原载《周报》第十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出版。）

《母亲》在中国的命运

——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七十八岁诞辰

五年之前，我在桂林的时候，苏联《国际文学》的编辑梯航诺夫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怎样翻译了〈母亲〉》的文章。当时很忙，同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就搁下了。今年是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再度接到《时代》杂志的要求，还是同样的一个题目。

实在说，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的情景已经很模糊了，今天还能想得起的，只是翻译过程中这篇伟大的作品所给我的感动。当母亲发觉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危险的秘密组织，当时的恐惧与忧煎，偷偷地听到一些“真理的言语”的喜悦，两次探狱的那些激动的感情，终于勇敢地喊出了“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消灭的”这一句口号而抬起了那面红旗的悲剧的场面，都是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记忆鲜明的事情。

讲到翻译这部作品的动机，应该回溯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候我是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分，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大部分朋友从实际斗争“退却”到上海，新文化在这时候再度开花，我便不自量力地从事于这本《母亲》的翻译了，我用的两种日本译本，间或参考英译。当时蒋光慈兄住在我楼下，译完了每一章之后，他再仔细地给我从原文校对了一遍。

《母亲》在中国出版之后所受的欢迎，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上下分册的本子，一年之内就印了两版，这两版题名《母亲》，译者“沈端先”。但是不久之后，外埠的邮寄被禁止了，书店的发行人很聪明，说禁止的理由是封面上画了鲜红的血迹，当时“红色”是招忌的，他们改印了一次淡绿色封面的三版，但是运命也似乎并不比红色封面的良好。一九三一年，这本书列入了禁书目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听说也曾有许多学生因为看这本禁书而遭遇了不幸。此后绝版了三年，北方曾经有一种偷印的翻版，热心的读者曾把那种粗杂的翻印本带来给我，认为这是侵害著作权而要我追诉。可是一则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追诉别人的自由；二则觉得让这廉价的本子流传一下也好，就置之不问了。一九三五年再度改名出版，书名改成了一个《母》字，译者改成了“孙光瑞”，这本书才能侥幸地再在几个大都市里面发行。当时禁止发行的方法很奇妙，除出禁止指令的某些著作之外，又常常将某个作者的作品不分性质地完全禁绝，以往三年的发禁，据说译者“沈端先”这个名字也是“不无关系”的。

抗战前后，我换了现用的这个笔名，但是那本《母》上依旧沿用着“孙光瑞”这个译者的名字，我不想改正它，让它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个被污损被作践的纪念吧。

这本书在抗战中又印过两版，在桂林，在重庆我都在书坊中看见，有个时候卖到一千元以上的高价，但是据书坊中人说，这书的销路一直是良好的。

我私自庆幸这样一种不足为训的重译本能够多少的把这本名著的影响和感动带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每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反射地感到惶恐，我不知道在过去十五年间，有多少青年单单为了爱读这本书而遭遇了比沙皇更残暴的反动分子的迫害。抗战胜利之后的这本书的命运如何？我今天还不能想象，但是有一句话我可以傲言，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原载《时代》，一九四六年
第六卷第十二期。）

谈《侵略》这个剧本

在一家小戏院里看完了《侵略》的试片，我想起了战时在重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在重庆支持着一个唯一不受官方支配的民间戏剧团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戏剧运动的黯淡似乎还没有超过今天，因为第一，当时国民党还挂着抗战的招牌，尽管每一个戏的上演都要经过三次审查，但标榜着抗日的剧本，他们总还不好明目张胆地禁止；第二，当时他们还没有控制到所有的剧场，所以只要能够筹得到租金，民间剧团也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当时最大的困难，无疑的是剧本，进步作家创作的，十九不能通过，侥幸通过了的，也一定会删改到体无完肤，前句不接后句。人民对戏剧的要求非常热烈，剧团工作者的生活也要靠不断的演出来支持，于是，当几个创作剧本不能通过而预定了的节目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们就想演一些苏联的抗战剧本来试一试了。当然想上演的剧本，就是《俄罗斯人》、《前线》和这儿要谈到的李昂诺夫的《侵略》了。

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剧本，是曹靖华先生的翻译原稿，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出色的剧本，但在重庆的物质条件之下，作为一个外国戏来上演，和我们排演了而终于不能公演的《俄罗斯人》一样，不论在装置、服装的演出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有一天，忽然宋之的兄很兴奋地跑来，好像透露了一个独得的秘密一般地告诉我说：“我已经想出上演这个剧本的办法了。”

他想出的办法是“改编”，就是将这个剧本改写成中国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而且这剧本的情节、气氛、人情习俗，也太和中国的相像了。”这想法是对的，李昂诺夫在苏联是一个老作家，他在旧俄时代已经成名，他深刻地懂得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性格，他一面衷心地憎恨那些旧社会的残滓，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地相信在革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辈青年。虽则由于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环境影响而容易走入歧途，但是这一辈人在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的锻炼中，也还有“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而再替人民效力的机会。在《侵略》中，李昂诺夫所写的都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俄奸法尤宁是旧俄地主，革命后流亡在外而一直梦想着死灰复燃的“白俄”，这是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的。费多尔是出生在旧俄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宠纵过甚，思想生活未能彻底改造而带着虚无倾向和自弃性质的中年人。他自己不能适应新社会而感觉到“世情的冷酷”，他心身俱病，很难有改造成为一个新时代人的可能了，但他只是走错了路而还不愿意彻底堕落下去。所以当他一方面看见了民族敌人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又发觉了抗战中的人民还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还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用他“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来代替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他的父亲，是李昂诺夫笔下的英雄，也就是在抗战中作者竭力要求表扬的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传统的典型人物。至于党部书记游击战士安特烈·费多尔的妹妹奥丽，那就完全是新时代的新人物，李昂诺夫将这些人物的典型个性刻画得十分清楚，故事曲折而又入情入理地配合着这几个人物的个性发展，而在此特别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就是这个新旧过渡期的悲剧，不论从人物性格和故事构成来说，都和我们抗战中的中国现实有着许多酷似的地方。

我同意了宋之的兄这个提议，并且竭力怂恿他赶快完成这一个改编的工作。可是国民党的反动远出于我们的想象之外，当中国艺术剧社准备改编上

演一个苏联剧本的消息传出之后，剧本审查会方面很快地就派出一个特种人物来警告，要我们不要作此种“无谓的精力浪费”了，“只要和苏联有关，是决不可能通过的”。这是我们一再试探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一个穷剧团不能作绝望的冒险，这个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名作就这样地失去了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机会了。

因此，当我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部杰作的演出，我个人的喜悦是双重的。作为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我可以以极大的信心，把这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影片推荐给任何一位过去对苏联电影有偏见而不愿意接受的观众；而同时，作为一个戏剧电影的工作者，我们更可以细心地向这部完整的艺术品学习，而获得我们创作实践中所该遵循的教训。假如说一种艺术品对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所应有的任务是使“顽者廉，懦者立，伤病者皆起”，那么像李昂诺夫的这部《侵略》，才应该是十足地符合了这要求的标本。

一九四五年

（原载香港《正报》一九四八年五月总九十期。）

《三毛流浪记》代序

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不仅孩子们熟悉他，欢喜他，同情他，连孩子们的家长、教师，提起三毛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笔下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而真像一个实际存在的惹人同情和欢喜的孩子了。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能够得到这样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情、喜爱，和将他当作真有其事的实在人物一般的关心、传说，甚至有人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这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家的成功和荣誉。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的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了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这是作家从残酷的生活中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而开始对这野蛮的制度发生了反感和敌视的缘故；而同时我们相信，假如三毛的作者不这样做，不去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作斗争，而架空地给他布置一个神话一般的可以搭救他的幻想的境遇，那么即使是天真的孩子们，也就不会这样的清早起来就要抢着报纸看三毛了。

值得庆幸的是三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就要使鬼变成人。三毛是善良的，勇敢的，经得起磨炼的，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社会中的三毛的发展和进步吧。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
(原载张乐平作《三毛流浪记》，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关于《女儿经》的作者

季华同志：

四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整理出了一批“五四”以来的旧影片，其中所记《女儿经》一段，须作必要的补正。

报道说，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而其实，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集体创作。经过情况，简述如下：

一九三三年底，艺华影片公司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后，白色恐怖更形严重，明星公司也遭受到了反动派更进一步的迫害。形势已经很险恶了，受“左翼”文艺工作者支持的明星公司的编剧委员会还在苦撑，在一次编剧会议上，郑正秋先生建议拍摄一部集锦片，来一个“明星”大会串，让明星公司所有的著名演员都在一部影片里出现，也可以让每个导演负责导演一段。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当时明星公司已经和“左翼”合作，除出原来的编、导、演之外，各方面都吸收了一批新人，所以在一部影片中把所有导演、演员展览一番，不仅可以缓冲一下当时紧张的形势，在影片的营业上有把握，就是在公司的宣传效果上，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由于那个时期明星公司的女演员阵容很强，除出了当时最卖座的“女明星”胡蝶、徐来、宣景琳、夏佩珍、高倩苹、严月嫔、朱秋痕之外，新人艾霞、胡萍也加入了明星，所以很自然地想到了每一段都由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来担任主角的办法。接着，既然由女演员为主，洪深同志就拟定了《女儿经》这个剧名。

设想定了之后，公司就决定要我写剧本，我建议为了在一部片子中显示各种题材、风格，所以整部影片可以由明星公司所有的编导来分工合作，——即每一个编剧写一个短故事，然后由我汇总，把它们连接起来，加头加尾，结构成为一个贯穿一气的剧本。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写剧本片段的有郑正秋、钱杏邨（阿英）、洪深、郑伯奇、沈西苓，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编辑工作，把各个短故事串联起来而已。

故事开头是某一个女子中学举行毕业典礼，这班同窗数载的姑娘们就要分离了，于是有一些平时要好的小姐妹在分手的时候约定，若干年后，再聚会一次。影片用倒叙的形式开始，每一个人讲一段自己毕业后的经历，……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描写了社会百态，写出了当时女青年们的苦闷。摄制完成的影片，——特别是结尾的那一段，由于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的压迫，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和剧作的原来意图是有些出入的。

这部影片的导演有郑正秋、程步高、李萍倩、沈西苓、陈铿然、吴村、姚苏凤等，一头一尾则由老板张石川自己动手，好像赵丹同志也在一个片段里担任了一个角色。

往事如烟，忽忽已经三十年了，洪深、西苓……都已经去世了，要是洪深同志还在，他一定可以回忆得更清楚一些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

文艺与体育的因缘 ——《礼物》代序

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音乐和笑语声融成了一片。他们是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作家、画家、演员、舞蹈家、电影工作者，……他们是首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其中也还有不少正在北京演出的戏曲、曲艺界的演员。大家议论得很热烈、很兴奋，最初我以为大家还在谈文艺创作中的思想问题，还在交流创作和表演上的经验，可是当我在会场里走了一圈之后，才知道大家谈得最多、议论得最热烈的却是不久之前才在布拉格举行的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他们在谈中国一个冠军和欧洲冠军阿尔塞之战，在谈王志良的“过五关、斩六将”，一位电影演员谈得起劲，站起来做了一个张燮林“海底捞月”的姿势……

按照“隔行如隔山”的说法，文艺和体育应该是隔着一座山的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可是在今天的新社会，这种旧观念、旧思想完全被否定了。文艺和体育结下了因缘，艺术家和运动员交上了朋友。杨洁、丘钟惠都是“戏迷”；崔嵬、谢添、刘琼的篮球都打得不错，裘盛戎还是京剧界的足球“选手”，至于作家里面，体育爱好者就更多了，玛拉沁夫、康濯……我看已经不是一般的爱好者，而已经是入了门的“行家”了。要不，他们不会写出《女篮五号》、《关键的时刻》这一些作品的。

通过锻炼身体来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新的体育活动——体操、田径、球类运动等等，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在旧时代，国际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名单中，竟找不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真的是“东亚病夫”么？中国人的智力、体力、毅力都不如他人么？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是会用坚决的否定来回答这些帝国主义的诬蔑的。体育运动和运动员们在旧社会经历过来的是怎样一种惨痛的际遇，体育界前辈马约翰老先生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很动人的文章，我们的电影导演谢晋、谢添，也曾通过《女篮五号》、《水上春秋》这两部影片，用艺术形象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旧社会，体育和劳动人民是无缘的，体育和竞技成了有钱有闲阶级的禁脔，而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却和当时被叫作“戏子”的艺人很相似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喜欢他们，一方面又歧视他们。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能记起杨秀琼这个女游泳选手的名字吧，在一个时期，报刊上登过她的大幅照片，她曾被官僚买办们捧为“美人鱼”、“体育皇后”，可是曾几何时，像一颗发出闪光的陨星一样，很快地在黑暗中消灭了。

终于，解放的炮声一响，悲惨的时代过去了，短短的十三年，中国体育界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解放后的十三年，赶上了过去半世纪的落后。新中国的男女运动员全部刷新了田径赛的全国纪录；英雄的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一九五九年，容国团首先在圣·勃莱德杯上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接着，二十六、二十七两届的世界乒乓球赛，中国队都夺取了三项锦标；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在举重、游泳、跳伞、射击、射箭等各项比赛中，不止一次打破了和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纪录。当然，这还只不过是新的进军的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体育已成了亿万人参加的群众活动，我

们的后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布拉格挫败欧洲名将高基安的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青年李赫男，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同样年轻的吴浮山在女子跳高中跳过了一·七五米的高度。

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体育事业也正在以前人不能梦想的速度飞跃前进。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已经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旧社会，运动员只能靠个人奋斗，刺激他们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资产阶级的所谓“费厄泼莱”和“竞技精神”（sportsmanship），只不过是骗人的谎话，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场上的选手甚至于成了阔人们的赌注和筹码。而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年轻的运动员却都在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品质的、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荣的体育战线上的战士。没有这种高尚的理想、品质和风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不能想象的。新中国体育运动的目标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是“为运动而运动”，不是为锦标而比赛。他们胜不骄、败不馁，他们勇敢、机智、顽强、谦逊，他们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友谊和学习放在比胜负更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新的精神，这种新的风格，保证着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鼓舞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前进，——应该说，也正是由于从我国运动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和风格强烈地感染了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感情，这才使他们情不自禁地用他们满腔热情写出了真实动人的、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作品。我没有调查过“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中有没有过以体育为题材的小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解放前，我们作家不曾、也不可能塑造出像杨巧莲、吕家荣、章国栋、刘志男这样的人物性格。新人新事，新的社会，新的风尚，这就必然的会在文艺领域里产生出新题材、新体裁的作品。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因此我就特别高兴能看到《女篮五号》这样的电影、《礼物》这样的小说。我希望我国的体育事业百尺竿头，日新月异，我推荐这本小说，是为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七日《体育报》）

《南方来信》读后

薄薄的一本书，也许你可以很快地读完它，可是它会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占领你的心，使你久久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忘记。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作家、诗人，这些信里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美丽的词藻，也不曾引经据典，可是像一幅色彩强烈、人物鲜明的画卷，它会吸引你，感动你，使你愤怒，使你振奋，使你清楚地认识人民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这一真理。

这二十二封信都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可是，这些信里所说的并不尽是私情。这二十二封信共同塑造了一个崇高、巨大的形象，这就是宁死不屈，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到最后的越南民族、越南人民。

写这些信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些信会作为反帝斗争的最真实的文献，编辑成书，翻译出版。可是，看过这些信的人都会承认，这是真正的文学；这些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些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狰狞、丑恶的面目，这些信对那些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战略村”、在集中营、在屠场，能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和平共处”么？在轰炸机、坦克、刺刀面前，能“害怕得发抖”而放下自己的武器么？被侵略、受奴役的人拿起武器来进行正义战争，这“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因而必须予以“扑灭”么？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用血和火的言语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等待、祈祷、怕得发抖是不能得到和平的。要和平，就必须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战争进行在丛林中，进行在田野上，同时，战争也进行在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中。正如这本书的《代序》中所说：“在这场斗争中，首先，他（她）们要战胜自己的感情，要克制住对于离家的亲人——有许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的怀念；要战胜恐惧，消除贪生怕死的心理；要树立起坚定的胜利信心，相信以自己不屈的斗志和手中的简陋武器，一定能够击败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敌人。”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人，可是，他们是崇高、刚毅而坚定的。看看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再看看那些在帝国主义的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的“大人物”，那真是何等的渺小可怜、卑鄙可耻！

战斗还没有结束，可是，胜败之数，却已经很清楚了。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美帝国主义的泥足愈陷愈深。法国《国际论坛》报说：“美国在南越的沼泽中已陷到膝盖这样深”，连美国的《先驱论坛报》也说：“自从我们在东南亚被缠住以来，一直就没有任何可以采取的好的解决办法！”现代修正主义者看到这些话没有？这不就是“纸老虎”的真实自供吗？

感谢越南南方的战友们给了我们这样一本振奋人心的好书，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给中国人民，也将给全世界要革命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

雪垠同志：

三日手书拜读。非常抱歉的是由于视力衰退，大作《李自成》第二卷，直到五月下旬才粗粗读毕，接着又害了一次重感冒，以致稽复。

读后（第一卷主要内容，已由读过的朋友给我作了介绍）我首先要向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对你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

《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千万读者的欢迎，粉碎了“四人帮”的荒谬“理论”和一花独放政策。“四人帮”把毛主席不能让帝王将相占领舞台偷偷地篡改为“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舞台”，从而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局限今天，而完全排斥了“古为今用”，也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取消了“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这一重大任务。《李自成》的出现，和群众的欢迎，我以为是砸烂“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颗重型炮弹。

其次，使我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你基本上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你以列宁指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方法，来描写时代、刻画人物，也就是力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点，是和“四人帮”的否定历史，篡改历史，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的“三突出”“理论”针锋相对的。你写出了李自成起义当时的历史环境，你精心地刻画了李自成思想行动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他与其他起义首领的性格差别，特别是你恰如其分地——不那么露骨、而又从他的思想行动中，写出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种创作方法，在我国古典文艺中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可是过去十年，却被“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完全破坏了。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其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工作，不仅要把被歪曲了的张士诚、张献忠、李自成的形象恢复他们历史时期的、本来的真实面目，而且还要把甚至连老百姓也认为是一个“可以同情”的“好皇帝”的崇祯的形象恢复他本来的真实面目，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很成功的。你没有用长篇大论的“言论”来批评崇祯，而是用他的用人决策——乃至生活细节中，使读者自然地、信服地看出了他决不是一个“朕非亡国之君”的欺骗。

假如说，《李自成》（二卷）有一些小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以为是由于你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了刻苦的分析整理，因此，对于事件、人物、主次之间的安排等方面，难免有若干可以精减而还未能割爱的缺点。这就在有些场面使人感到松散。不知是否还可以稍加精炼。

其次，在写黄适周的问题上，我不知你写作中是否也受到一些“儒法斗争”的影响？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这一段有些“现代化”，这可能是过分了，但是这中间似乎可以删去或改写一些使人感到“现代化”的地方。

我热烈希望你的三、四卷早日出版，期待着这部巨著的，是千千万万希望能看到优秀文艺作品的读者。匆匆布复，并祝健康。

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

（原载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忆谷柳
——重印《虾球传》代序

一九三八年，我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我们有可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大约在三月初，《救亡日报》同人应余汉谋部的一位姓吴的团长的邀约，到广州附近的罗岗参观。吴团长是十九路军旧部，参加过淞沪战争，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新文艺的爱好者，他认识郭沫若同志，并读过茅盾、巴金的小说。我们在罗岗，参观了他的营地和一些名胜古迹，最后他要一位校级军官送我们回广州。当我们穿过挂果累累的梅林时，这位军官笑着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次时机不好，早几个月来可以看到著名的‘罗岗香雪’，迟几个月来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糯米糍荔枝，但现在只能请你们望梅止渴了。”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像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只听吴团长叫他黄秘书，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战争年代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整十年之后，一九四七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罗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们参观罗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拼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

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谈，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国外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觉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于广州
(原载《花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这四十七位义士成仁取义的壮举。诗中有云：“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

黄遵宪（公度），嘉应州梅县人。一八七六年中举。翌年，因中国出使日本大臣（公使）何如璋的推荐，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他深受“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在钱萼、孙仲联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曾述说：“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又在诗后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何如璋）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他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论是很有见解的。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由于他的名著《人境庐诗草》的传诵一时，文学史家都公认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但他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诗词方面。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新闻记者和颇有建树的外交官。他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曾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在日本时，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共御强俄。他在一首诗中说：“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又说：“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送宋户公使之燕京》）。特别是在清末国困民穷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变法自强是颇有信心的。

一八九六年，他在奉旨入觐光绪时有一段话很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召见时，载湉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载湉初甚惊讶，旋笑颌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当他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近人司徒美堂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历任驻日本、英、法、意、比参赞，一直受到何如璋、薛福成的信任。一八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因为他是“新派人物”，遭到当时德国政府的拒绝。同年，又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特别是光绪召见时，他的革新主张受到了光绪的赞许。戊戌政变后，他就被“遣返乡里”，因此近代史家都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事实上，由于黄遵宪较早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虽和梁启超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康、梁都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乃至对立，在他给梁启超的信札中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反对康有为的“尊孔立教”，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一种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而不能把它当作宗教迷信。又如论到曾国藩时，他与曾绝然相反，同情太平军。一九〇二年十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彼（曾国藩）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潜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他的这种“民为贵”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最近重读《人境庐诗草》，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驻外时期对驻在国的历史、经济、文化都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在日本五年，就写下了《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的人民生活、风土习惯和政治动态。一八八七年他还写成了《日本国志》四十卷，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史书。

黄遵宪出使日本、欧美，正值清廷内外交困、日趋崩溃的前夕。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官，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一方面以不卑不亢的精神，为保卫国家主权、保护海外侨胞作出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以豁达的态度、平易的作风，和驻在国朝野人士（上至王公，下及庶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孜孜不倦地对欧美、日本现实的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了解。日本历史学家称誉他是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美国侨胞对他的保卫侨胞权益——特别是他任劳任怨地劝阻华侨械斗这一件事——至今惦念不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我认为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时间已经跨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驻节国外。我希望我们的外交工作者能写出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那样的诗篇，写出《日本国志》那样的史书，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共同反霸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各自的贡献。

（原载《世界知识》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秋瑾不朽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代序

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 and 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革命，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

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绔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〇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询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

《文坛繁星谱》序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〇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工、青、妇、文），文联当了殿军。一般人都说文艺界的十年浩劫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事实上这场浩劫的序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界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的迫害，时间最早，损害最大；而重整旗鼓、恢复自己的组织，则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三年之后。在周扬同志、阳翰笙同志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只是文艺界较有声望的同志，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统计出一个全部受害者的数字。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熬过了十年灾难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能再次主持这次盛会，可是，他和不少老一代作家如阿英、冯雪峰同志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从原订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劫后余生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二十年来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以及近三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能有相聚一堂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摄影家协会把这次会议的一些场景拍摄下来，收集成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次会上，都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在会场上和休息室常常碰到似曾相识而又叫不出姓名的朋友，直到相互自报家门，才知道是相隔十几年乃至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战友。有些人两鬓皆霜或满头白发，有些人拄着双拐或坐在手推车上，心情愉快地来参加会议。在这种场合，我奇妙地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象征性的文章。但再琢磨一下，觉得《病梅馆记》所说的情况和作者所象征的情景，和我们的遭际有很大的不同。使龙蟠、邓尉、西溪之梅“皆病”的，是文人雅士，而使我们文艺界遭到灾难的却是一批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恶棍。病梅还可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等方法，使之复苏。龚自珍预期的治梅期限也只是五年，而我们文艺界的情况，为了“解其棕缚”、“毁其盆”就已经花了三年多时间。看来使我们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年近或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大量的有成就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诬陷和打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暴力与重压之下屈服，保持了知识分子固有的节操。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品德。我们常常听到“能够活下来看到今天就是胜利”、“要以有限的有生之年，夺回十年来的损失”这样的壮语。巴金同志曾充满感情地倾吐过的“噩梦醒来，人已衰老，但我要抓紧时间，抓紧工作，我要奋笔写下去”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当然，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还在辛勤地工作，那些遍体创伤的中年一代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了一批新的闯将，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为文艺界带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坚信，群星灿烂的我国文艺复兴，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

一九八〇年
(原载《收获》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不能忘却的纪念 ——《两种美国人》代序

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是王莹同志的遗著。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个序言，我当然不能推卸，这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现在从某些老革命大姐和女知识分子身上还常常能够见到。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还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特点，王莹和我有了工作上的关联，并比较接近。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展开工作，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的电影明星。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曾经腐蚀过不少年轻有为的女演员，毁灭她们的高尚理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是王莹是受过严酷考验的革命者，能够抵拦住物质的诱惑。这在王莹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王莹每次和我谈话，总是提出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寻求答案。这显现出来王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王莹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而始终保持了节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倔强。后来，王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随即离开上海，出走日本。

一九三五年王莹从日本回国参加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影片，参加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光彩。

返回重庆后不久，就听说她和谢和赓同志到美国去了。王莹一去十三年，这期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

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〇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一九八〇年春写于北京

（原载王莹著《两种美国人》、《宝姑》，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今日谈》代序

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到全国解放，我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写社论，写时事述评，也写杂文。我还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政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或有所感而不写出来，就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偶有警句很快就會在社会上传开。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之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怨互嘲，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闹伪选，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欢畅。但是后来想想，问题也还不少，这就是在势如破竹的胜利条件下，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这个节字，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九四九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报迟，新闻单调，社会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同时，尽管当时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十之八九都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有感而就想动笔这种习惯，也还是很难改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弢、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多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卡得很死很死，号召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这都是和恩来、少奇同志的意见相违反的。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同志给我看了由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

必要。“时弊”，指的是“当时之弊”，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党八股，任何一篇文章都得戴帽穿靴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教条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一九五四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两年一再受到批评，却又未能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无知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各地报刊上的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等）的气势和锋芒，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弱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几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么？

以上看法，主要是对一般的政论、杂文而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的“心有余悸”，提倡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今日谈”并不是单纯的杂文专栏，它的作者除了报社的编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报社外的干部、专家、学生、工农群众。因此，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有相同的文风乃至观点。但是，值此振兴中华、厉行改革的时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直到今天还想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人，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来抵制体制改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而歧视、欺压、折磨知识分子的人……我认为，受到全国人民爱读的“今日谈”的文章，即使不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还是十分必要的。长期的习惯势力，正像积厚了的水垢和铁锈一样，轻轻地揩擦一下是清除不掉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文风犀利的作者来为“今日谈”写稿，我希望“今日谈”在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树立新文风这一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

《学人谈治学》代序

《浙江日报》为了鼓励青年认真学习，相继开辟了《勤学佳话》和《治学经验一席谈》两个专栏，介绍古人勤学成才的故事，发表了当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几十篇治学体会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题为《学人谈治学》，无疑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贡献。在付印之前，编者要我写篇短文，作为此书代序。我算不上“学人”，也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但一则是“君自故乡来，不忘故乡事”，不好推辞；二则在四五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也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因此，只能在各位前辈和乡长面前，班门弄斧，讲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近年来收到不少青年的来信，也从报刊上看到许多青年作者的文章，使我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基本功较差，知识面较窄，他们有生活、有见解、有勇气，但是语文和知识这两者阻碍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同情他们，因为这是极左思潮和十年内乱中，喧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口号所造成的苦果。读了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成“家”之前，绝无例外地都在文、史、哲，数、理、化等方面经过艰苦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建筑百丈高楼，不先打好地基是不行的。苏步青教授说：“语文是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工具，文理相通，语文学得好，阅读写作能力就提高了，就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和思路的敞开。有的理科大学生数理化还好，但写实验报告文理不通，错别字很多，这样，即使你很有创造性，别人还是看不懂。我劝青年们千万不要忽视语文学习。”这几句话是对理科学学生说的，而今天，“忽视语文学习”，竟还是文科学习的通病。

学理科的要打好语文基础，学文科的同样要有一定的数理化知识。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管你学哲学也好，学史地也好，学文艺也好，没有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我说的只是常识），在你的专业中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再去学马列主义哲学，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对一分为二，对遗传基因，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就会容易学懂。

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都谈到“勤”和“恒”这两者的重要性，我深有同感。假如有人问：治学有没有诀窍？那么我想，勤和恒就是最基本的诀窍。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这是中国的古话。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从勤学、勤思、勤问中得来的。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从沈括、李时珍到华罗庚、陈景润，从杜甫、白居易到老舍、巴金，他们的勤奋，真的做到了“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的程序。当然，勤和恒，是不可分的。事实上，勤字中间就包括了恒的意思，譬如我们劝人多读书，决不是希望他读一本书，读一天书，而是希望他天天读，持之以恒，把每天读书养成习惯，“嗜书成癖”，习和癖，都只能持之以恒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治学，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从博到约，从浅入深。

博和专，是一对矛盾。我读了这本书中学人们的文章，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了博的重要性。我不反对“学贵专精，不尚驳杂”的道理，但是我同时也深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昌明、世事日繁的社会里，要专攻一业，不及其

他，恐怕要真的攻克这一业，也是有困难了。在科学范畴里，本世纪六七十年起，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边缘学科，文学艺术就更不必说了，因为电子科学已经“侵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你不理会科学，科学毫不客气地向你渗透。看来，“杂家”这个词，已经不必有贬义了。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要研究人，反映人，要刻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作家的知识就非博不可，非杂不可了。读了戴不凡同志的遗作，他说：“要博，什么书都可以看看、翻翻，记不住内容，或对内容没有兴趣，即使只去知道一下书名、作者、出版年月，积而多之，有时也会有用处的。同时，不但是‘开卷有益’，也得注意社会上的种种（自人情世故以至风俗景物）。”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人情世故，风俗景物”之类，在教科书和正式的社论、文件中是学不到的。

谈到博和杂，就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浅字。对此，梁启超有一段话讲得很坦率，他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又在给他女儿的一首诗中说：“吾学病爱博，用甚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我认为不论治什么学，“学问欲极炽”和“集中精力”，都是完全必要的，学海无边，对这一门“沉溺”了一阵之后又“移于他业”，看来也是很难免的，而且，要是真的集中精力地钻研了一阵，要“尽抛”也是不可能的。茅盾在少年时代就通读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这些不都成了他毕生文学事业的用之不尽的潜力么？我认为梁任公所说的“尤病在无恒”，只是他的自谦之辞，他在学海里浮沉了几十年，直到晚年还保持着“极炽”的求知欲，这种恒心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我还想引用梁启超提倡的“善疑、求真、创获”这六个字，来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善疑，就是不迷信旧说，坚持独立思考；求真，就是实事求是，上下求索；而创获，则是独辟蹊径，敢于创造。循此途径，持之以恒，那么积跬步致千里，集细流成江海，也就庶几近之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

老骥不伏枥 余热可传人
——《于伶戏剧散论》代序

知道《于伶戏剧散论》即将出版，并看了这本书的编目，使我既高兴，又感慨。

使我高兴的是，这本早该出的书终于出版了，而这又是一本有益有用的书。我不属于“九斤老太”这一类人，我坚信未来属于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一定会超过我们——事实也正是如此，我说过：王安忆、陈祖芬、陈建功、凌力……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代水平。但同时，我也不想讳言，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和这之前的极左思潮的为害，在今天，不少青年人中还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最显眼的是，他们不了解百多年来、乃至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同时，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的遭际又是一部血泪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中国戏剧运动也就是和中外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批评某些人崇洋媚外，某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叛逃出国，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追溯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都是这些青年受了“四人帮”极左思想——例如“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思德、雷锋文化不高也很革命”之类的影响，把历史看作“四旧”，以大老粗为光荣的结果么？我讲这些，并不是无的放矢。我的确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青年，他们不仅不知道洪秀全、谭嗣同，有的人连孙中山就是孙文也不知道了。对祖国的现代史尚如此，对祖国的现代戏剧史就更难说了。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革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很困难的。搜集在于伶同志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写于四五十年之前。因此，书中所叙所论，可能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很难理解了。难懂，但它是真实的历史。中国话剧这棵嫩草，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艰苦环境中，由一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的青年人闯出来的。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认为让“后来居上”的今天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从这本书中知道一点“前事”，对于党的十二大号召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肯定会有良好的作用。

在这篇短文一开头我就说了“既高兴，又感慨”，那么，我的感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我和作者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夜认识的，屈指一算，正好是半个世纪。我们一起走过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犯过不少错误，这是大家都一样的；不怨天，不尤人，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也都是一样的。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历史的悲剧，往者已矣，不必赘述。只是他折磨得比我久，精神负担也比我重，我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和“一小撮走资派”一起被“监护”的，而他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受“潘汉年案”牵连就罢了官，“立案审查”。明知他问题不大，却不审不查，让他“暗中靠边站”着。拖了十一年，拖到“文革”开始时的八月

二十六日再被“收监”，直到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之后，才获得“解放”出狱。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长期认真的复查，终于给沉冤二十七年的潘汉年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于是，压在于伶同志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才得到了消解。这件事，想起来使人心酸。潘汉年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可是由于康生之流的诬陷，就在他以中共华东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时候，以“内奸”的罪名被捕了。危言耸听说是“挖出了埋藏最深的反革命集团”。这件事震惊了上海（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第一副市长），当然也株连了不少人，于伶只是罢了官，没有被逮捕，“还算是轻的”。但是请想一想，一个有自尊心的共产党员头上，被戴了一顶“内奸”、“同伙”的帽子，欲诉无门，呼天不应，究竟是什么滋味。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九六〇年春，为了要开第三次“文代会”，我们几个负责做筹备工作的人到西华厅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谈完了之后，总理忽然问我：“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迟疑了一下：“听说还没有。”

“这次他能来参加？”

“他是文联的全国委员，按理是……”

“假如身体可以，要他一定参加。”

大会期间，总理单独约见了。然后对周扬和我说：“于伶的问题要赶快解决，还要给他安排工作……”周扬同志通过中宣部把总理的话告诉了上海市委，结果呢，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给上海的那位“好学生”卡住了！

再说一遍，往者已矣，不多说了，可悲的是平白地使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闲白了少年头。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毕竟是正确而伟大的，潘汉年死了，董慧死了，他们没有子女，可是，“四人帮”一倒台，就有不少过去和潘汉年同志共过事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信，希望对这桩冤案重新予以审查。死者是不能讲话了，可是档案还在，来往的电文还在，和他一起工作过——特别是在最危难、最机密的情况下共过生死的人还没有死尽。于是，冤案终于平反了。

《于伶戏剧散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于伶是一个“老病号”，近年来还做过两次手术治疗，可是今年八月我和他一起去访问朝鲜，他还登上了金刚山。老骥不伏枥，余热可传人。编者孔海珠同志要我写几句话，这就算代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原载《于伶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

《憩园》后记

这个本子改编于六十年代初，一直没有发表过，这中间有一段经过。

五十年代中叶，香港几家进步电影公司闹剧本荒，国内剧作家又怕“海外关系”而不愿意给他们写剧本，于是廖承志同志就逼着我“带头”给夏梦写了一个适合于她扮演的剧本——我当时是“侨委”委员，但是工作太忙，拖着没有交卷。大约过了一年，夏梦一再催促，才于一九六一年冬或一九六二年春改编了这个剧本。夏梦很喜欢巴金的作品，我也认为让她演万韶华这个角色是适合的。

改编前征求过巴金同志的意见，我也力求忠实于原著，但动笔时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我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把原著的男小孩寒儿改为女孩子等等，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黎先生，也删掉了。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要在八九千字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刻画出万韶华、姚国栋、杨老三、寒儿这几个主要人物在四十年代这个特定时期的形象、性格，尽可能地再现这几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常见的人物的欢乐和苦痛。

这个本子由朱石麟先生导演拍成了电影，可能也是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他们把片名改为《故园春梦》。片子拍完后送到北京，廖承志同志看了很高兴，但我没有看，因为那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刻，文化部的整风正在酝酿之中，好在片头上没有我的名字，不看，不公映，就这样“混”过去了。

但是，我不想讳言我欢喜这部小说，我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又善良的人物，我同意原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话，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这个改编本我没有留底，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也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前年在杭州，香港的中国电影研究家林年同先生和我谈“名著改编”问题，忽然提到了《故园春梦》，并承他给我复印了一份，重读一遍，正像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适值四川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就同意让它和读者见面了。现在有不少人在谈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花工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而《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韶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

一九八三年八月

（原载《憩园》，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

之的不朽 ——《宋之的选集》代序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话说长江》系列片放映到重庆那一段时，解说员说：“重庆多雾，故有‘雾重庆’之称。”这句话使我心头一怔，想起了我的一个最亲近、最有才华、最敬爱的挚友，他就是宋之的（汝昭）同志。可能是那位解说员不知道“雾重庆”这个名称的出典，其实把“雾重庆”作为国民党陪都的代称，它的起源是由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重庆上演的宋之的的杰作《雾重庆》。这里所说的雾，指的不是自然界的气象，而是当时笼罩着重庆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这一年的冬天，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酝酿时期。

我认识之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天。开完了一次“影评小组”的谈话会之后，陈鲤庭、于伶、之的和我四个人沿着四川路东行，他忽然提议由他作东请大家喝一杯咖啡。在一家小咖啡馆坐定之后，他天真地问于伶：“我们在北平参加了‘苞莉芭剧社’是不是等于参加了共产党？”于伶笑了，对他说“苞莉芭”是北平剧联的一个外围组织，连上海的剧联也不一定都是共产党的组织。他点了点头说：“那对了，我没有说谎。那次包打听抓住了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时，我大声回答：吓是！”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所以他的那种又天真、又勇敢的话，使我永远记在心。

大约有两年时光，我和他经常见面，很快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我在搞电影工作，他又是影评小组的长期执笔者。他下笔快，真可以说“倚马可待”。常常看了电影出来，花十来分钟就把影评写出来了。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这三年，我计算不出他究竟写了多少战斗性的文章。当然，不止写影评，写剧评，也写小说，写剧本。一九三四年冬他去了西北一趟，写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一九三五年一回上海，可以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和鲁思主编的《影谭》上，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用各种笔名写的文章。最少我记得他在《动向》上写过一篇连载长篇。他和我有一种共同的习癖，从不“敝帚自珍”，文章写了交出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就造成了他的爱女宋时为他搜编文选造成了不少困难。一九三五年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年，可是奇怪的是这一年也是被叫做“杂志年”的一年——其实，这也不是奇怪的，华北事变起来了，民族矛盾激化了，英美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对抗日救亡这一点也不敢正面出来反对了。这一年，新杂志，新书店确实增加了不少，——生活、新知、读书三家进步书店，《中流》、《光明》、《世界知识》、《奔流》、《妇女生活》……等等，记得都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出世的。当时我和洪深、沙汀、沈起予在编《光明》半月刊，凡是我向他约稿，他总是“随传随到”没有二话。他的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和多幕剧《武则天》也是在这时候脱稿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和他先后离开了上海。他随马彦祥的救亡演剧第一队经南京、武汉到西北为抗战宣传服务；我则到广州、桂林办报，三年不通音问，直到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之后，他和一大批理论、文艺界人士，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再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名叫海景楼的小饭馆，同席者有廖承志、我、于伶、章泯（记得还有戴浩、虞静子）。廖承志给我们的指示是赶快办一个剧团。首先是掀起一个抗日演剧高潮，这样也可以让重庆撤退到香港来的文艺界有事可做。我们很快地组织了“旅港剧

人协会”，演出了《雾重庆》、《马门教授》、《北京人》。他写剧本，做团结统战工作，当舞台监督，可以说够忙的了，可是就在这个时期，他还在《华商报》、《大众生活》和其它报刊上针对敌寇汪伪以及一切“与抗战无关”论者写了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短论，这些文章大都是在《华商报》的那间烟雾弥漫的小会客室里写的。当时给进步报刊写文章是不给稿费的，有时夜深了，陪他到附近小店去喝两盅白干，他就十分满意了。

这样忙碌而愉快的日子过得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环境迫使我们再一次远走高飞。他随东江游击队北撤，经老隆、曲江到了桂林。我和蔡楚生、金仲华、金山、司徒慧敏等人经澳门、台山、柳州也到了桂林。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热烈地欢迎了我们，热闹了一阵，再分头回到了重庆。我记得在雾重庆的六月，他十分严肃地问我：“够格了吧，我要求入党。”我热情地表示了欢迎。可是我把这个要求告诉徐冰的时候，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恩来同志的反对。恩来同志严肃地说：我们正需要像他那样的非党布尔塞维克，他和张道藩同台演过戏，可以当面开玩笑，潘公展也认识他，黑名单上还没有他的名字，让他在党外工作有效得多。然后对我说：告诉他，我周某人一直把他看作同志，但在这个时候还要他当“民主人士”。当我和徐冰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时候，这位铁铮铮的汉子的眼睛红润了。这之后还有一件事，当我们从香港回到重庆的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过去了，张道藩为了卖好，由他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出面，聘请了几位由港回渝的文化人为该会理事，每月致送车马费一百元。聘书发出来了，人数不少，宋之的和我都在内。当我向组织上请示的时候，恩来同志的指示是：“党员一律退聘，非党人员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拿钱当委员可以，用他们的钱，做我们的事，不吃亏。”这又是一个考验。我把这个指示通知他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周公把我看作同志，我要以这个身份要求自己。”

我们又和于伶、金山、司徒慧敏组织了一个“中国艺术剧社”，一起工作了四年。他、于伶和我合作的《戏剧春秋》，他的《春寒》都是这段时间写的。正如恩来同志所预料，为了审查剧本，为了组织作家协会， he 可以和鲁觉吾、潘公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是民主人士，国民党对他不能不留点“面子”。

重庆四年，时间不算太久，但是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把这些事都写下来肯定会觉得太啰嗦了。但，还有一件事不能不写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陈毅同志经刘晓同志转给梅益和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苏北急需大批文化工作者去工作，要阿英和我带一批作家、记者、专家……尽速前往。阿英要去，是早已确定的了，我则正在筹备复刊《救亡日报》，不能走。一九四六年春，之的到上海后，知道了这个消息，抢先向我报名，非去不可。我和梅益都表示同意。这时，他猛然把两只大手按在我的肩上，附着我的耳朵说：“一九三三年以前的事你不知道，这之后一直到今天，我在白区的工作，好的坏的，你都得给我作个鉴定！”这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党的无限忠诚，这也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从他魁梧的身体到他刚直的性格，他真可以说是一个燕赵豪侠之士，待人宽厚，律己甚严。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重庆，我们都在泥泞和荆棘中作战，我想，用“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对他是完全适用的。一九四四年冬天，有一次，老舍约我和他到姚蓬子开的书店去吃饭。舍予和之的都是酒豪，喝了几杯之后，大家就不免高谈阔论起来。当蓬子指着书架上的一

些“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籍对老舍说：“这种书是摆一年也卖不掉一本的，可是不摆着又有什么办法？”老舍用他特有的幽默刺了他一下，于是姚蓬子恼羞成怒，反唇相讥，几乎要翻脸。我看看身边的之的，他却似乎听而不闻，只管自酌自饮，我觉得很奇怪。饭后出门的时候，之的悄悄地对我说：“如何？我这个人还是粗中有细的。这种场合，老舍刺他一下，比你我打他一拳更难受。”

在一条路上一同工作、斗争了二十多年，唯一遗憾的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他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千里以外的昆明参加西南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除了向王苹同志发了一份唁电之外，连拊棺一恸也不可得，这实在是太怆痛了。假如他今年还活着，也还只有六十九岁。以他的精力、生活、健笔，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该有多少作品可以留给后世啊！

动了感情，就没法再论述他的作品了，但这些都是大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个磨灭不了的足印，它们是会永存在人们心里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卷》序

《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编第一个十年时，由于当时电影还只处于草创阶段，因此没有编入。现在编第二个十年时，专门设立了电影卷，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各国电影发展之初，都没有完整的文学剧本，中国电影起先也只有幕表，即故事梗概和剧本提纲，至于有完整的电影剧本出现，那还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的事。但作为综合艺术，文学是电影艺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无论把电影特性提到多么高的地位，总还需要建筑在一定的文学基础上。中国早期优秀电影，就其文学基础而言，自应归属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范畴，在《新文学大系》中得到历史的记录和真实的反映。

电影是发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兴艺术，它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可能应该从一九一五年格雷菲斯的《一个民族的诞生》或者一九一六年卓别林的《流浪汉》算起。和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等比较起来，它的年纪确实很轻。别的艺术有千百年的历史和传统，而电影的历史还不满一百年，如果从一八九五年法国发明电影算起，也不过八十八年。历史短，缺乏深厚的传统根基，这是它的弱点，但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可以广泛吸收多种艺术之长，为自己开拓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时，电影的发展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幕到宽幕，现在又正从银感光胶片摄影向磁带录像发展。加上电影既是艺术品，又是娱乐品和商品，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媒介，而且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有了这些条件，电影就在短时期内飞快地发展起来了。

电影诞生后不久，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很快传到了我国。先是外片来华放映，接着是外国商人来华开设影戏公司，雇员拍片牟利。至于中国人自己开始拍电影，最早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在一九〇五年拍的谭鑫培的舞台艺术纪录片《定军山》。拍故事片，能考证到的就是一九一三年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说到比较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以及具备摄影棚、洗印设备、专业的导演、演员等条件的，那是二十年代初叶的事了。粗具规模的电影厂是明星电影公司，它是一九二二年成立的。天一公司成立于一九二五年，联华公司成立于一九二九年。最早的故事片，能独立作为文艺作品的，也许是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再往前，还有一九一三年黎民伟拍的《庄子戏妻》（即《蝴蝶梦》）。因此，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电影起步不算太晚。

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政府办的电影制片厂，所有的电影公司都是私人办的。最初拍摄较多的是一些风景、时事和介绍社会见闻的纪录片，以及滑稽打闹、封建说教、怪力乱神之类的短片。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从老板到导演、演员、摄影，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演员大多由文明戏演员兼任，白天拍片，晚上演戏。影片的情节、风格往往是摹仿、照搬美国影片，而美国却是一个由许多民族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因此，美国电影没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使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气息。

二十年代初叶，中国电影事业的规模逐步开始扩大，摄制了长故事片。当时，资本家把电影看作是他们安排资本出路，解救自身危机的有利可图的

事业，纷纷进入电影领域，造成电影事业的暂时繁荣。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上海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绝大部分是封建伦理、饮食男女和神仙怪侠之类的东西。以中国电影发源地上海来说，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已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公司。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中国电影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这种形势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要求和审美趣味，反映到电影上，他们看厌了神怪武侠、鸳鸯蝴蝶、封建伦理等类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影片，而迫切希望看到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电影公司这时如果再拍过去那种荒诞离奇、情趣低劣的影片，就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厌恶，遭遇到赔本乃至倒闭的危险。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一些电影公司的主持人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制片方针，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不同程度地从脱离现实向反映现实的进步方向转变。由于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电影市场，这时一些经营电影的民族资本家也想利用制片方针的改变，加强号召力，取得观众的支持，在电影市场上占一席之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民群众和电影工作者迫切需要电影从这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跟上时代发展的重要时刻，组织和派遣力量进入电影界，具体着手进行了参加电影工作的。

党对电影事业的关注，可以说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党的领导下，在左翼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里，就提出了电影战线上斗争的纲领和方针，到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党的地下组织更抓住明星公司面临困难，要求左翼文艺工作者给予帮助的机会，由瞿秋白同志主持会议，对电影界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会议决定由阿英、郑伯奇和我三人一起参加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鉴于当时电影界的情况非常复杂，不仅有官僚资本插手，而且有种种黑暗势力的侵袭，因此秋白同志特别指示我们进去以后“要认真、要小心，先立定脚跟，搞好关系，不要急躁”。以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由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和我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在十分困难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展开了占领电影阵地的各项工作。

当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我们打进私营电影公司去，就有人指责我们和资本家合作。但当时我们是寄人篱下，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政权，所有的电影制片厂又都是资本家办的。我们参加电影工作，一方面国民党、租界工部局把住了思想政治关，另一方面，资本家掌握了经济关，你的剧本不卖座就不让开拍。秋白同志要我们记住当时所处的环境，假如我们的剧本不卖钱，或在审查时通不过，那么资本家就不会采用我们的剧本，所以要学会和资本家合作，这在白色恐怖严重和我们的创作主动权很少的情况下，是不能不这样做的。当时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也为我们和各阶层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七年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很困难的，到了民族矛盾上升时，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抗日分子成了群众拥护的人，我们这些人被认为是抗日的，老百姓就拥护，资本家也觉得不可怕，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样，我们一方面替资本家赚钱，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自己剧本和帮助导演修改剧本，在资本家拍摄的影片中加进一点进步的和爱国的内容，用这样的方法，创作出了一批进步影片。一九三三年“明星”摄制的《狂流》、《盐潮》、《春蚕》、《时代的女儿》、《上海二十四小时》、《铁

板红泪录》等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在这一年前后，田汉、阳翰笙等也在“联华”、“艺华”展开了进步电影运动。在“联华”，摄制了《共赴国难》、《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等；在“艺华”，拍摄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抗日斗志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等等。所有这些影片，都具有较为鲜明的积极主题，有着较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而且题材面较前大大开阔，多方面地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描写农村破产和城市工人斗争生活的题材，这时开始进入中国电影领域，说明电影工作者已经开始从狭小的上层社会题材圈子里走了出来，面向大众生活，接触和表现了工农生活及其斗争。此外，我们也拍摄了一些旗帜鲜明的抗日反帝影片，暴露城市贫富悬殊、阶级矛盾，以及知识青年和妇女题材的影片。也还有根据“五四”以来新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电影题材的接触现实和多样化，也促使电影工作者从实际出发去寻求电影艺术的新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形成了电影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为了拍好这些影片，进步电影工作者这时开始注意深入生活实际，到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观察、体验生活。这一切，都使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些清新面貌，促使它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与抓剧本创作的同时，党的电影小组还抓了电影队伍的组织和电影评论工作。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电影小组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影片公司去，如沈西苓、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王莹、艾霞等，都是这时参加到“明星”或“联华”、“艺华”去的。在理论工作方面，在党开始领导电影时，已经有了一支戏剧评论队伍。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成立了由剧联领导的“剧评小组”，田汉、石凌鹤、陈鲤庭、唐纳，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又扩大而成立了“影评小组”。“影评小组”先是由剧联的田汉领导的，一九三三年以后扩大成一支相当广泛的队伍。不仅成员相当广泛，而且还打进了当时公开发行的大报副刊，不仅是《申报》、《时事新报》、《大晚报》，连国民党CC派的《晨报》的电影副刊，也掌握在进步影评人的手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通过剧本创作、队伍建设和电影评论，中国的进步电影运动在一九三三年达到了高潮，当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的威吓和迫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现捣毁艺华影片公司的事件后，一九三四年，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国民党文化头目潘公展又压迫明星公司必须改组编剧委员会，这样，党的电影小组的工作也就更为艰难了。

一九三四年后，我们采取了更加灵活和隐蔽的方式，用各种笔名或用导演兼任“编剧”的名义继续为各影片公司提供剧本。这样，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我们仍对“明星”和“联华”的剧本创作起着主导作用。同年十月，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和党组织的破坏，形势更加恶化，我和阿英、郑伯奇不得不离开“明星”，以后该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就处于一个低落时期，进步影片就只有沈西苓的《乡愁》、《船家女》和洪深的《劫后桃花》等极少几部。在“联华”，进步电影工作者利用公司上层分子在这剧烈动荡形势下都想扩大自己实力引起的尖锐矛盾，团结、争取具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工作者，孤立、打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右翼势力，蔡楚生、史东山等继续拍摄了《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等进步影片。一九三四年夏，为了开辟新的阵地，继续扩大进步电影的力量，通过司徒慧敏争取了马德建、司徒逸民等人的合作，组成了电通制片公司，田汉和我以及孙师毅都参加并负责了该

公司的剧本创作。一批进步的电影、戏剧、摄影、音乐工作者如袁牧之、陈波儿、许幸之、应云卫、沈西苓、聂耳、吕骥、贺绿汀、吴印咸等，通过党的安排，也都参加到“电通”中去，充实了它的创作力量。因此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就拍出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好几部进步影片，田汉、孙师毅和聂耳、贺绿汀、任光等这时为中国电影的歌词、音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都以激越的时代感和民族气息赢得了人民的喜爱，在社会上很快传唱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进步电影运动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进步电影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有它的缺点错误，也有它的幼稚的一面。中国电影起点很低，基础很薄弱。在本世纪初，上海已有了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等，就是没有电影学院。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懂得一点电影的，只有孙瑜在美国学习过电影摄影，洪深在美国学过戏剧。至于我们这些人，所有的编、导、演，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阿英、郑伯奇和我都是从外文杂志上知道了一些外国电影的理论、剧本，就冒冒失失地摸索前进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时那些作品，就像约四五十岁的人看他幼儿时期蹒跚学步的照片，不免会感到羞赧。加上影片拍出来了，国民党和租界工部局都要检查，最后和观众见面的，就往往不是构思完整的、符合我们原来心意的东西。一岁半、两岁的孩子学步，又想跑得快一点，跌跤是难免的，跌痛了自己知道，也不觉得后悔，而旁人看来，肯定会觉得幼稚可笑的。中国进步电影是在三十年代“左”倾路线时期成长起来的，在瞿秋白同志的教导下，我们没有犯过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由于对电影这复杂的新兴艺术的特性缺乏了解，加上当时年少气盛，急功好利，不能从实际出发，多考虑一点当时的特定环境，因此往往授敌人以把柄，同时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等问题上，总的说来也还存在着偏“左”的倾向。今天从回顾中总结经验，可以明显地得出结论：一是从事电影工作，一定要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掌握这门艺术的特有规律；二是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时刻记住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写一句对话，拍一个场景，都要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都要考虑到千千万万群众的接受程度，都要考虑到电影的社会效果。不这样做，是必定失败的。

这本集子里还收入了洪深、欧阳予倩、蔡楚生、孙瑜、吴永刚、郑正秋等人的作品。他们当时是爱国的进步作家，在党的团结、领导下，接受了进步电影运动的影响，世界观逐步改变，编导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影响的影片，后人决不会忘记他们的艰辛劳绩和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

去年秋天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二十一—四十年代电影回顾展”，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专门选入了这一时期的电影文学剧本。庆幸之余，深感时代在向前发展，电影工作者总要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去发展社会主义电影繁荣兴旺的新局面。当然，现实和历史在精神和内容上总是有联系的，今天的现实必然是历史传统在新形势下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乐意让人看到我们这些外行人当年在旷野中摸索前进的足迹。

一九八四年元月

（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

忆健吾
——《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健吾猝然去世，已经快两年了，但他的名字在我记忆中闪过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事实。

人世间的事，有许多是很难解释的。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共事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乃至上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还记得，也有不少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了；或明或暗地和我较量过的人，大致还记得，而不少和我合作过、乃至感情上很融洽的人，倒反而渐渐淡忘了。奇怪的是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太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

我认识他很晚，尽管三十年代中期，我就是他的读者。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当时他住在西摩路，大概我也只去过两三次，抗战刚胜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真可以说一见如故。我读过他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咀华集》；他看过和评论过我所有的习作和戏作，其中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化生活》上的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评〈上海屋檐下〉》，对我的那篇不太成熟的试作既有过誉的肯定，又有搔到痒处的批评。由于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所以当他谈到《心防》和《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剧本是半路出家，您写评论则是科班出身。”这样，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你写了十几个剧本还说是‘试作’，那么我写评论更是‘试论’了。”我反问：“那么你的本行是什么？”他说他的专业是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接着很认真地问我：“那么你的专业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本行是新闻记者，写剧本是我的副业。”显然，这种“争论”彼此之间都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就作了结论：“我们还是同行，都可以说是杂家。”于是我说：“我承认，在这么一个时代，杂一点也不坏，但你的杂比我高明得多了。”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坦率，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几位知交也都是我的师友，例如在上海和他合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以及那时还在重庆的马宗融等等。当我提到在黑暗的时期还是笑口常开的乐观主义者“马大哥”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地问我：“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正在惦念着这位马大哥。”我说：“他是天官府郭老家的常客，又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是赵慧深介绍给我的。”这样，从赵慧深谈到了《雷雨》中的繁漪，又谈到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会在大学讲台上唱昆曲的赵景深。这样一谈，初交就成了老友，我忽然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赠李健吾》诗：“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四十年后还是如在目前的那次初见，就是这种“互不拘”的情景。

读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也好，《梁允达》、《云彩霞》也好，谁都会感觉到，剧作者是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那样的天真、坦率，有时竟天真到使我觉得他有点不合时宜。就在下一年，我在顾仲彝家里遇到他，在座的还有吴仞之，当时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内战，上海人已经把抗战胜利叫做“惨胜”，国民党的“威望”在上海也已经一落千丈，可是，当吴仞之对国民党大员的“劫收”表示愤慨时，健吾忽然说：“我

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是血缘的国民党。”仝之和仲彝都哑然无语。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么，也完全不是，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词严义正的。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尊重知识，他钦佩有真知灼见的人。我问他：要了解西方文学应读些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最好是细读亚里斯多德和狄德罗。”我后来读了一些，但我的毛病是粗，只是浏览而没有“细”读。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我认识钱钟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提到这件事，还记起一段插话，那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钟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找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〇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溘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

此书未出，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让西湖更美 ——《西湖旧踪》代序

西湖就是美。

自古以来就美，现在和将来她应该更美。

不说盛唐，南宋偏安，临安是繁华的京城，西湖是被打扮得很美的。到了清朝，乾隆数下江南，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御笔”，看来直到那个时期，西湖也还是很美的。到了十八九世纪，西湖的光景就和有清一代的国运同步衰微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这儿生活过，西湖的确是败落了，但“西湖十景”还在，春天的桃李，夏日的荷花，秋天的丹桂，冬日的梅花，乃至几处别具风格的园林，衰落了，但是她风致依稀，还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这之后，兵祸连绵，外敌入侵，西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衰落是慢性的，而人为的破坏，则可以使千百年来名胜毁于一旦。五十年代有过一个短暂复兴时期，但好心也会出坏事，好听的口号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于是工厂开到风景区来了，园林成了疗养院，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倒反而不得其门而入。“左”风往往是从愚昧的土壤上刮起来的，名胜风景是“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地方”，古迹当然属于“四旧”。早在十年浩劫之前，这儿就平过一次墓，连苏小小和武松也遭了殃。画家叶浅予说：“南屏晚钟”被“罚了几十年的禁闭”，“柳浪闻莺”也受到了“月下老人”的株连。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多讲了使人不愉快，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杭州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城，今天和将来的西湖一定要让她比过去更美。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只有短短的五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生活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精神文明是不能在脏乱差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条件、有责任复兴西湖，把她打扮得比什么时期都美。

西湖就是西湖，她不同于桂林，也不同于苏州，西湖有她自己的特色。在西湖边造摩天大楼当然不好，把九溪十八涧的曲曲折折的小径铺上柏油路面也是煞风景的事情。一九八一年我在这儿看见过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水杉，让这种世界上濒于灭绝的活化石在西湖安家，当然也可以增加覆盖面积，但我以为种树也得考虑到本地特色，多种一些香樟、石楠是不是更好一些。扬州有好几株千年银杏，山东蓬莱有一株保护得很好的“唐槐”。于是，我想起了城隍山上似乎也有一些古树，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们，但这样的事也要请教专家。交给外行人去管，为了爱护它而浇上一桶化肥，那么这些“老寿星”也就会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我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了。桃、荷、桂、梅衬托着西湖的四季，应该多种一些，让它们发挥西湖的特色。童年游孤山，那时的梅花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宋代诗人王淇说：“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我看，让诗人们继续说下去，并没有什么不好。去年不是有许多人想把它评为“国花”么，可惜的是孤山的梅，还是太单调了。梅花不仅品种多，而且有早梅、晚梅之别，早梅在冬至前开花，晚梅则可以开到清明前后。假如前山、后山都种上不同品种（雪梅、红梅、绿萼、单瓣的、复瓣的）的早梅和晚梅，那不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在孤山观赏梅花了么？这只是一个例，又如秋天，桂花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红叶？我记得过去里西湖是有枫叶的，枫树槭树之外，浙江特产的乌桕也不坏，茅盾写过一本小说《霜叶

红于二月花》，让春天的游客看到满山的映山红，让秋天的游客闻到桂花香之外还看到红叶，这不是更丰满、更富诗意了么？

色香之外，还有一个声字，不知“柳浪闻莺”还听不听得莺声？今年四月到苏州，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真有一点他乡遇故人之感。近年来用了过多的农药和化肥，据说寒山寺还能听到乌啼，但北京却不仅听不到鹃声，连麻雀也少有了，今年举行过一次“爱鸟周”，我认为让西湖令人赏心悦耳，保护鸟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要让衰落了近百年的西湖重新焕发青春，要做的事很多，而且一定要有科学的规划，要依靠风景学家、园林学家、植物和动物学家，单凭好心和积极性是不够的。让西湖更美，更有地方特色，一定要抓紧时间群策群力，听取专家意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规划。

一九八四年盛夏

《战地萍踪》代序

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原载《战地萍踪》，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未晚谈》代序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轻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一九四四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

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追念章泯 ——《章泯文集》代序

同志们，今天大家一起集会纪念章泯同志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时间过得很快，他一九七五年去世时，我还在秦城监狱，等我这年七月间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他已不在人间了。连抚棺一哭的机会也没有，深觉遗憾。

我跟章泯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候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原在北平搞戏剧运动受到迫害，才不得不离开北平转移到上海工作的。

大家知道，章泯同志在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北平参加过戏剧运动的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他就曾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在北平从事过 C.Y 的工作，也就是共青团的工作。这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听陈毅同志对我讲的。在一次集会上陈市长见到章泯同志，他就问我：“这一位是不是谢韵心啊？”我说：“是。”他说：“那他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北平，那时候陈毅同志在中国大学，他说：“那时候我领导共青团的工作，他是当时北平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章泯同志在上海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最厉害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他参加“左翼剧联”，不久之后，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被破坏，赵铭彝被捕，他就跟于伶、张庚同志一起主持“左翼剧联”的实际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

正像阳翰笙同志刚才说的一样，他导演了许多好戏。他在那种极端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之一。可以说，早在二十年代，他已经研究和介绍过苏联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了。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并且一贯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介绍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的话剧运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话剧运动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理论工作。中国虽然办有戏剧学校，但是介绍过来的绝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理论。章泯同志一方面介绍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同时又认真地学习中国自己的戏剧传统。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抗战开始，他和于伶、张庚同志一起，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他自己也从书斋走向战地，他勤奋地写作、教书，同时也不断地、热情地从事战时的戏剧宣传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演出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等剧。

章泯同志有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说空话，干实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不争名利地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性格上很严肃的人，不论剧本或排戏，都是一丝不苟，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一步，他的为人平易、可亲，待人平等，可是，对闹人事纠纷，排戏不严肃的人，他却常常会大发脾气。

解放后，章泯同志参加了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来又主持了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电影，在三十年代，虽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作出一定的

成绩，但是在电影艺术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方面还很缺乏经验。章泯同志接受、承担电影学院的工作，要是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行的。他为电影学院奠定基础，同钟敬之等同志一起为电影学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他是原电影学院的院长。这与他不讲空话，专做实事，切切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这种品质有关。我们现在纪念他，我以为应该联系到当前电影界、戏剧界的实际情况，来学习他这种诚诚恳恳、不为名利、不讲空话、专做实事的这一高贵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留下来的许多论著、剧本和翻译，我想应该由电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

一九八五年

（原载《章泯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

版。）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一九三九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逼着我写剧本，又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几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不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

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十岁，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变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工作。直到三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一九四一年的《华商报》只办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再一次在战乱中分手。他和韬奋、茅盾、胡绳等经东江游击区，我则和金仲华、蔡楚生等经澳门、台山，于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先后回到重庆。

我办了五六年报，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所以回到重庆，就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工作，可是恩来同志却说：“你可以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但主要的还是要以公开合法身分，搞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而沫沙一到重庆，恩来同志就让他进了《新华日报》。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搬到化龙桥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才又有见面的机会。四十年代中后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刻，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年解放战争，我和他有时天各一方，有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大家都忙，很少有静下心来谈心的机会。我和他都在《华商报》、《群众》和其他刊物大写政论、杂文，每天都写，笔不停挥，自己也觉得写得非常欢畅，在数量上他写的不比我多，但他除了杂文、政论之外，还写了几篇很出色的《故事新编》，如《陈胜起义》、《鹿马传》、《曹操剖柑》等等。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离开香港回到北平，随军南下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又分别了五年。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文化部，这时候他在北京市委。“隔行如隔山”，同在北京，相聚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笔名，我还是一看就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之流常常骂我们这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而工作，心心相印，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的。

我在文化部管电影和外事工作，也偶尔写一些杂文随笔之类，但和以前比，可以说写的少得多了。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同志来访，说他们要辟一个杂文专栏，目的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进知识”，并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拟定的。于是我欣然地“入了伙”，前后写了六七篇。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很坏，假大空、党八股猖獗，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之后不断地批斗知识分子，“知

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开始抬头，使我更感到愚昧无知不仅是建设之大敌、文明之大敌，而且是民主法制的大敌。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做一点匡正时弊、增进知识的工作。结果呢，谁也想不到，这个有沫沙参加的《长短录》后来竟被说成是与《三家村札记》齐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然，沫沙是“三家村”中的一家，又写过一篇《有鬼无害论》，惹了一场大祸，遭受了八九年的牢狱之灾。往者已矣，这些事说来伤心，不多讲了。

我和他前后一起工作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风雨同舟。“少年子弟江湖老”，沫沙也已经快八十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些人居然大难不死，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得到了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勉尽微力的机会。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廖沫沙的风雨岁月》的出版，祝愿他老当益壮，继续用他的如椽之笔，为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岁暮

（原载《廖沫沙的风雨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月出版。）

《章汉夫文集》代序

今年七月，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从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十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九二七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

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八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一九四二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五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九四三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月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一九四六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十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径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中

国文摘》都已出，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一九八六年十月

（原载《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戏剧卷》序

序跋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追其源，可以上溯到《书序》、《诗序》，乃至杜预的《春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等等，现在一般的说法，写在书前者曰序，写在书后者曰跋。因为按字义，序与叙通，序言相当于前言，而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者曰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王力教授在《古代汉语》中说：“古代序文是在全书的后面，综述作书的宗旨，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序传，许慎《说文解字》的叙等，皆在书末。汉代以后，书序才置于书首。”但是不论是序或者前言，是跋或者后记，都是散文的支系，写这种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或叙述著作的立意和宗旨。序跋既有作者自己写的，也有作者的师友写的，当然，序的涵义不止于此，始于唐代的“赠序”，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则是临别赠言，叙友情、发议论，不一定涉及到对方的著作。

序跋是散文的支系，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自序自跋既可以吐露写作前后的心态历程，可以抒怀、反思、释愤，也可以像司马迁用的“太史公曰”的笔法，在客观叙述之后，明确地点题，说明作意。蒲松龄写《聊斋》谈狐说鬼是暗喻，而后面加上的一段：“异史氏曰”则才是点睛之笔，也就是作者的言外所指。

替别人的著作写序跋，主要是叙述和介绍作者的为人事，使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既可以抒发友情，闲叙家常，又可以针砭世态，春秋贤者。序跋可以褒，也可以贬，序跋中对原著间有微词，也是很常见之事。文艺作品和它的作者永远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而从“五四”到一九四九，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新文艺创基立业的关键时刻，新者方生，旧者未死，作为中华民族之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旧传统包袱，忧时愤世，苦闷，彷徨，摸索，想找出一条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道路，三十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他们走过来的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却洒遍了泪水和血汗。创业艰难，年轻的探索者难免要走弯路。现在，要了解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学，可以读到许多作家的专集，也可以读到许多传记和史料，但是我还是觉得除此之外，读一点那一时期的作家们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而写的序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新时期文学工作者的心态和心声。

在中国，话剧是文苑中的一朵新花（从胡适的《终身大事》算起，还只有六十六年），它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它的生成和发展，又另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境遇。尽管事过境迁，这些都已经是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剧作家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运用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对后来者也还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很高兴写了这篇短文，作为这本现代戏剧序跋集的代序。

一九八七年春

《国际新闻社回忆》序

国际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奋斗了整整十年，于全国解放后宣告结束，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实际主持这个新闻机构的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等同志和全力支持它的胡愈之、金仲华等同志，都已相继去世。在文网周密的恶劣环境中，为了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民办通讯社的功绩，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实事求是的著述。因此，《国际新闻社回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二·九”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下，办了一份会刊《救亡日报》。参加这个刊物的新闻界同人恽逸群、杨潮、石辟澜等，为了团结新闻工作者参加救亡活动，曾和潘汉年、刘少文同志商谈，打算组织一个“新闻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对新闻界控制严密，争取各大报头面人物参加还有困难，于是就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以新闻界“少壮派”为主体的“青年记者学会”。抗日战争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的赞同。于是“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我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的时候才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沦陷之后，《救亡日报》迁穗，从那时起，就和“青记”及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同志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救亡日报》又从广州迁移到桂林复刊。这时，范长江同志和我谈起了“青记”打算办一个通讯社的问题，他说：“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是必要的，但是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要争取更多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次，这个组织一定是做一点实际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办一张报纸还有不少困难，“青记”这个小团体有人力而无财力，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他还说，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也经章汉夫请示过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赞成和欣赏。当时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实行“新闻垄断”，而我们又没有可能派记者到战地去采访，所以当长江说“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内和海外进步报刊提供战地通讯时，我就举双手表示赞成。一九三八年是一个很不平年的年头，希特勒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等正在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诱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大后方和海外侨报透露一点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一点抗日最前线的真实信息，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江同志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和桂林文化新闻界的支持，对建社方针、具体业务，长江和胡愈之、张铁生、陈此生等同志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这样，“国际新闻社”就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近千人的会员，并在延安、华北、重庆、香港等地有了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之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分社。据我记忆，“国新社”成立时只有一个小而精的办事机构，脱产的专业人员很少，绝大部分社员和社友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还为总社筹募基金。

“皖南事变”之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救亡日报》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在大后方的工作被迫停止，但是在解放区和香港的分社依然存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长江和我都到了香港，与在港的金仲华、郑森禹、胡仲持、杨潮、王纪元、张明养等同志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香港分社的工作。为传播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真实信息，反对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侨报刊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年五月，由邹韬奋、范长江、茅盾、沈志远、金仲华、于毅夫等联名发表的有名的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也是通过这个通讯社用中、英文传播到南洋和欧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化新闻界在东江纵队的大力协助下，分批经东江、澳门撤退到韶关、桂林。范长江和韬奋转道赴新四军根据地。国新社的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它的社员和社友们依旧在新闻战线上艰苦奋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新社又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宣告结束。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难地工作了整整十年，历史是短暂的，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金仲华都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建社初期的“青年记者”和一大批“小青年”，现在也已经年逾花甲、古稀，他们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诬陷和迫害。到现在，即使在新闻界，知道“青记”和“国新社”的人，可能也已经不多了。但是，范长江、孟秋江、金仲华、陈同生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青记”和“国新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不会被人忘。

《国新社回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提供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作为“国新社”的社友，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读者和其他读者，以奠故人，以励来者。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忆老友承志
——《廖承志诗文钞》代序

一大叠《廖承志诗文钞》的清样，摆在我案头已经很久。廖茗（笃笃）要我替这本书写一篇序，催过我也不止一次了。可是翻阅他的每一篇诗文，都使我感到哀伤，他走得太早了！承志比我小八岁。假如他今天还在，正好是八十岁，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

提起笔来，数不尽的往事就浮映在我的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工作。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李人一介绍给我一个刚从广东到东京的青年人，一身和服，穿着一双高高的木屐，显得更瘦长了。他向总支部报到，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入党的，还谈了一些国内情况，我给他登了记。直到他走了之后，李人一才告诉我，他就是仲恺先生的公子。那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在东京的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西山会议派砸了总支部的机关，我被警视厅传讯，接着就被迫回到上海。下一年五月，发生了济南事变，承志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组织留学生上街示威，被捕后也就被驱逐出境。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有恒路口蔡叔厚办的绍敦电机公司。这表面上是一家销售和修理家用电器的商店，实际上则是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的联络站。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留学过日本的电机工程师。青年时代就是杨贤江、胡愈之的同乡好友，所以他一九二七年入党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来的革命党人的掩护所和联络点。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蔡叔厚当时没有政治色彩，又是一个“老板”，所以从日本回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家公司当作安全的落脚点。当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也经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和开会，廖承志到绍敦公司来找我，就是郑汉先带他来的。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了，所以我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这儿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我和他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时他才二十岁，才华横溢，爱开玩笑，搞逗人的小动作，但显然还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知道日本的事情比知道中国的还要多。所以蔡叔厚一再“传授”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和搞地下工作的技巧。我也对他说，碰到外国巡捕，你最好讲日本话，冒充日本人。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飘然到欧洲去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又回到上海，依旧在绍敦公司见面。这时他老练多了，但是爱开玩笑的脾气没有变，爱吃寿司和日本酱萝卜的习惯也没有变。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蔡叔厚从特科得到消息，说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了，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正在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据说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关了不久，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就保释了。这之后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到苏区去了。关于他的被捕和保释，《诗文钞》中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一篇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给柳亚子的信；一篇是他一九八一年为悼念宋庆龄而写的《我的回忆之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到跑马地何香凝先生寓所见到了他。这时他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一方面协助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港澳及海外侨胞筹措经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东江纵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南方分局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分局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世家，仲恺、香凝先生在海外有巨大影响。他又在德国、荷兰做过海员工作。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猛吹“左”风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公言：“我这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从这时候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们在广州、桂林办《救亡日报》，在香港办《华商报》，乃至在东南亚、北美办华文报刊，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他支持和领导下办起来的。在这一段时期，他做了两件永远难忘的、也是任何人难以做到的大事：一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军民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医疗用品，动员和组织了数以万计爱国青年和文化工作者到解放区去学习和工作；二是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万分危急的环境下，和东江纵队紧密合作，舍死忘生地救出了四五百位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不但营救了中国人，也救出了大批国际友人（据《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救出了英国人二十名，美国人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七名）。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无一伤亡地进行了这一场“秘密大营救”，真是惊心动魄的创举。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终身难忘的。

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之后，一九四二年四月，因叛徒告密，他在广东乐昌被捕，在军统集中营里关了四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才获释放。同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我问他：“你一共被捕过几次？”他说：“数不清了，东京一次，德国一次，荷兰一次，这都是在外国。加上被国民党逮捕了两次，长征中被张国焘关了一次。”他扳着指头数算了一下，笑着说：“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蹲监牢的。”关于长征中遭到张国焘迫害的事。他在悼念恩来同志的文章中只说被“监禁”，但当时和他一起被捕的朱光（五十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则对我说过，有一段时期承志是带着镣铐行军的。朱光说，要不是廖承志能画宣传画，能办墙报，张国焘少不了他，否则，早就和胡迪、曾中生一起被“收拾”掉了。

写到这里，又把《诗文钞》读了一遍。第一辑是诗词。他多才多艺，能画漫画，能演戏，能写没有八股味的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还能写诗，写很不错的格律诗。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我读了之后真的吃了一惊。他欢喜画人像漫画，开会听报告的时候也画。一九六一年“秀才”们在钓鱼台写反修文章时，他还把出席莫斯科会议时画的十几幅各国大人物们的画像作了“内部展览”。他会演戏，在德国演过，在苏区也演过。我问他演什么角色？他很得意地说：“最拿手的是演反面人物，特别是丑角，假如要我演南霸天，肯定可以和陈强比高低。”他写了这么多诗，为什么一首也不发表呢？这是一个谜。读了他的诗，我深深地为他一九四二年在集中营中写的《沁园春·有感》和“文革”时期写的《六十生日自嘲》、《无题》和《一月十一日——三十年纪念也》所感动。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坎坷征途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无畏无私的战士，他爽朗、洒脱，爱开玩笑，搞小动作，这是每一个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深知的，但是他对父母的敬爱，对姐姐、妻子和儿女的柔情——像一股幽

兰似的清芬，那是只有读到他的诗词和书信，才能体会到的。

全国解放后，他除当了一个时期的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之外，主要是在周恩来、陈毅同志领导下做侨务和外事工作。这都是政策性很强、头绪纷繁，而又是“授权不多”的工作。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干得游刃有余，非常出色。

从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起，经过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设，千万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是我们党和民主力量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五十年代，侨汇还是新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硬通货收入，可是到一九五七年刮起了“左”风，侨务工作——团结华侨和保护华侨、侨眷利益，就成了他不能不做而又十分难做的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也有点焦急和不安，可是他还是顶住了干扰，埋头苦干。一九六〇年冬，有一次他请香港新闻界吃饭，席间有人发牢骚，说搞侨务工作像走钢丝，在香港办报，对三年困难说真话不准，说假话又觉得对不住良心。廖做了个手势，压低了声音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前几天我们向陈老总汇报工作，也有人诉苦，陈老总火了，拍着桌子说，不尊重华侨，不保护华侨利益，只能说我们共产党人忘恩负义。”然后举起酒杯来说：“你们放心，出了问题，统统由我廖承志负责。”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对我还是记忆犹新。

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度过了不平凡的童年。日本人说他是“知日派”，有人说他“亲日派”他也不加否认。也正由于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缔交而拒不和新中国接触的时刻，他就成了沟通中日关系的最适当的人选。谁也不会忘记，中日民间来往，是从他和高崎达之助商定民间友好贸易协议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也是郭沫若和他与中岛健藏商定的。通过民间友好贸易打开一个缺口，通过民间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滴水穿石，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洪流。在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讲了两句语重心长的话：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希望日本政府和人民认真地从惨痛的“前事”中吸取教训；二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希望两国人民不要忘记为了建设这座友好大厦而辛勤奋斗了几十年的先行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协定缔结十周年，遗憾的是这位掘井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承志在侨务和外事战线上鞠躬尽瘁地工作了数十年，于公于私，他有数不尽、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他是一个知亲好友遍天下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党魁、部长、学者、艺术家，下至贩夫走卒，他的“友谊覆盖面”是宽阔无比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同志要邹韬奋、范长江和我到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韬奋为了找不到一个在香港有身份的“督印人”而发愁了很久，可是我们办《华商报》，承志却早已经安排好了由当时任华比银行帮办的邓文田当督印人和他的兄弟邓文钊当经理。原来，这两位邓先生是他的表亲。有一次承志和我在皇后道散步，一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且都很亲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认识他的就不计其数。一问，不是他的表姐，就是他的堂兄。我当时不相信，以为他在唬人，直到后来读了他写的《我的母亲和她的画》，才知道他讲的一点也不假。这篇文章中说：“我母亲有十二个姊妹兄弟，她排行第九，即三个兄弟，九个姊妹，正是人丁兴旺。”解放后我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纳德，他递给我一张小条子：“请阁下笔下留情，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我表妹，人总是有两面性的。”

我讲了他的“友谊覆盖面”，计了他的亲戚朋友遍及全世界，为的是想告诉读者一些可能是谁也察觉不到的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卷起了一阵“出国热”，官员、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文化文艺工作者……想出国的人太多了，出国成了“美差”，成了“政治待遇”。成千上万人挤在一条窄路上，就免不了有争抢和推挤。在这股热浪中，高干子女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可是，直到他去世那一年，承志的儿女一个也没有出过国，不仅是他的儿女，连梦醒的女儿李湄，乃至李湄的儿女，也没有一个例外。他长期分管外事和侨务，他有权，他的权还相当大，他又平易宽厚，助人为乐，可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可以说严格到了难以令人置信。

再过一个星期，六月十日，是承志逝世五周年的忌日。在坎坷的征程上跋涉了七十五年，为国家民族建了功，在一代乃至几代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爱，他可以安息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哀哉，我放下了笔。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胡愈之印象记》代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当时愈之是《东方杂志》实际上的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四月十四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耽了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一九三〇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十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丏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

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一九三一年十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部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一九三三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参加了特科工作。特科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地下党不发生任何联系，所以他的入党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不知道的。这一年冬，国民党特务组织“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和良

友图书公司，我们打算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向当局提出抗议，我拿了这个名单和蔡叔厚商量。蔡叔厚对我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看胡愈之还是不列名为好，让他超脱一点，可能更有好处。叔厚是愈之的好友，先在中央特科，后来转到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所以他的这一提醒，我曾猜想到愈之可能另有其他的任务。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90%，地下党损失了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特科（王学文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一九三三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一九三三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彧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一九三七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

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欧阳予倩全集》序

今年五月，是欧阳予倩同志百岁冥诞，为了纪念这位戏剧界的元老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编纂的《欧阳予倩全集》六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值得庆幸的事情。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一百岁，洪深九十五岁，田汉九十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湉亲政，张之洞奏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设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田汉则是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一九〇七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一九一五年洪深写的《卖梨人》，一九一六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要比胡适的《终身大事》早四五年。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一九二二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怕艰险，愿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挫折，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真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然而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和争论。从一九三〇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入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

者之间。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戏剧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被称为戏剧界的“黑旋风”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他写的《咸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九四二年他写的《黄白丹青》，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不断地发生争论和分歧。现在看来，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说到底，这也就是二十年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有一点偏倚看来是难于避免的。对此，田汉后来在替予倩的文集作序的时候说得很坦率：“我们从来不是轻视技巧的，但我们更多地看重政治任务所在，我们不惜日以继夜地把戏剧突击出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突击派’，而予倩的艺术馆代表着所谓‘磨光派’。谁不愿把自己的艺术磨得更光呢？但我们不主张为磨光而磨光。我们是主张在突击中磨光的。……我们和予倩虽则在当时桂林一家三教咖啡厅楼上为艺术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观点显然慢慢地接近了，我们的矛盾很自然地解决了。”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年，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

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话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斗争，美术界有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而且演过京剧，二十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田汉在幼年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一九二七年办“鱼龙会”，就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汉、洪深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话剧界没有人反对过传统，没有出现过民族虚无主义，话剧工作者是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必多说了。

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重视台词训练，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我热诚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文集，这是中国话剧创业史的真实纪录，纪录了先驱者们的宽博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
(原载《欧阳予倩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出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标准，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这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

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原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

《陈此生诗文选》代序

岁月流逝，陈此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此生同志和我相交近四十年，但在一起工作却只有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两年，此后我就奔走于香港、新加坡、重庆、上海之间，很少有面晤的机会了。当然，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初，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在国内，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止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西欧列强对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和《救亡日报》同人赤手空拳地从广东撤到桂林，奉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广西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公开合法的传媒据点。经李克农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李任仁先生，他在广西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对《救亡日报》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就把沟通广西地方势力，联系桂林文化界的任务交给了此生同志。

此生同志和我同年，他比我大八个月，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同样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在少年时期都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主要是爱国主义和要求自由民主。他和我一样，都到过日本，住过上海的亭子间，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只是抗战之前我一直留在上海，而他则来往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由于此，他的许多朋友——如陈望道、邓初民、胡愈之、杨东莼、陈汝棠、杜君慧……，也都是我的朋友。友谊是可贵的，患难中的友谊和支持，更使人终生难忘。

不久前看了一部名叫《桂林文化城》的电视片，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影片主要是记录抗战之后桂林文化界的史事，但是，说得准确一点，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应该是早在一九三五年陈望道、施存统、马哲民、陈此生等同志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就开始了的。据杨东莼同志告诉我，广西方面和救国会，也是一九三六年春，粤桂湘三省准备联合反蒋抗日的时候，是李任仁先生请陈此生同志到南宁去接上了关系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还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民盟前身），则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和活动能力。因此，一九三六年初，广西地方势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陈此生同志的功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因为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桂林，桂林才会有“广西建设研究会”，才会有“广西建设干部学校”，才会容许《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在广西得到公开合法的地位。此生同志是一个务实的人，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为党和进步文化界在广西地方势力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写学术论文，写政论，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但从来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交游广阔，马相伯、马君武、柳亚子、郭沫若都是他的知交，茅盾、田汉、宋云彬在桂林，也和他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他“一空依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沽名钓誉，所以“你在报上（按：指《救亡日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在广西，他是最早拥护共产党，反对托派的人。从三十年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白崇禧和广西地方势力向右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救亡日报》遭到查封的时候，此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李克农同志的嘱托，做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工作。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又是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之一。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教育厅长，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这一切，在此生同志的《我的自述》和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是“语焉不详”或者一笔带过的，因此，即使在那个困难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于他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也是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的。他的那种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他对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业绩，历史是不会忘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陈此生诗文选》即将出版，此生同志的夫人盛此君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我因病拖延了好久，今年八月十七日，是此生同志逝世十周年，我就写一点对此生同志的追慕和悼念之情，把这本选集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原载《陈此生诗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

小丁今年七十五 ——《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小丁就是丁聪同志，这在文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上了年纪的人叫他小丁，和他同辈的乃至比他年轻的人也叫他小丁，他自己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小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有许多进步的画家，那时他的确是小字辈，张光宇、叶浅予都比他大一辈，他叫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这是他自己定的格。

我认识小丁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在明星电影公司当编剧，结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是胡考呢还是光宇介绍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当时已经在漫画界初露锋芒，用工笔画漫画，是他的首创，这对我印象很深，一位他的好友对我说：这是遗传，因为他的父亲丁悚，是清末民初驰誉江南的工笔画家。

我和小丁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则是在抗战之后。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也是小丁画得最勤的时期，他是艺术家而不是社会活动家，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漫画和杂文一样，是匕首式的武器，小丁就用他的妙手，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作了形象的曝光和调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

小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也还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报刊请他画画、设计封面、画人物头像，他几乎可以说有求必应，《读书》杂志上的篇头人像，都是他的手笔。

屈指算来，他从事漫画工作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了，他用妙笔给这不平凡的时代留下了记录。我非常高兴知道《丁聪漫画系列》即将出版，因为从这些画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也可以看到画家的风格和人品。我欢喜这样的人，欢喜这样的画，写此数语，表一点朋友的心意。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

（原载《丁聪漫画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四年四月出版。）

《陶晶孙选集》序

丁景唐同志告诉我，要编印《陶晶孙选集》，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虽然晶孙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我不会忘记我们相知、共事的那段岁月。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化现象，一些青年人不知道革命过程的历史，否定或厌弃革命文艺的传统。自然，这些人更不知道晶孙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回国后，就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引导下，热忱地投入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

我认识晶孙是在一九二九年。他是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投身于上海艺术剧社的创作、演出和音响等工作，主编《大众文艺》，他曾明确提出：“光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胜，已经取得领导权了，这样地一说了似乎很痛快”，但更需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作品”和“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陶弥丽（郭沫若夫人安娜的妹妹）留在上海。我和潘汉年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陶隐蔽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汉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以上这些情况，业已由陶瀛孙、陶乃煌写入《陶晶孙小传》，由陶坊资写入《回忆父亲》文中，还有我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的提问所写的一封短简中，也已为晶孙的这段历史作证。这三篇文章都刊登在一九九二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内，当会引起关心晶孙为人与文学创作的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因为过去的传言，已经造成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以后认真汲取教训，再也不能以讹传讹。

我高兴地祝贺晶孙的作品选集问世。让我们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晶孙的作品进行鉴赏，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公正的评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原载《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

深深的怀念 ——《我的父亲邓文钊》代序

欣闻《我的父亲邓文钊》即将出版，算起来文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钊在香港经商，那时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他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所以抗战前夕他多次为八路军筹集款项，在香港购买医疗用品及制作冬季棉衣棉被等事迹，他自己从来绝口不提。我认识文钊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一九四一年春在香港，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汪精卫叛国，日寇策动汪蒋合流，联合反共。而国民党则利用新闻封锁和邮检，使得香港和国外千万侨胞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被查封，我奉周恩来同志之命来到香港筹建一个对外宣传的报纸，便和正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等商量，认为在香港办一份公开的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通过这张报纸让海外千万侨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解放区的真相。

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两千港元的押金，而且还要有一位在香港有声望的人士作为“督印人”，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邓文钊先生。《华商报》这报名是廖承志同志决定的，因为在香港用“救亡”、“救国”等报名都不适当。香港是商业城市，而文钊的确从事过商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都有潜在势力，所以承担这份报纸的督印人要冒相当风险。四月间，我和范长江向邓文钊先生提出由他做督印人（董事长）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筹集一些资金，并颇有慷慨解囊之意。我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来有困难再请你帮忙。香港是个花花世界，要办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不容易。

《华商报》创刊初期，销路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先生曾委婉地对我们提出意见，要我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华商报》出版不久，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香港，当时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数百人之多，因此组织这些人离开香港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为“秘密大营救”的工作，文钊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

抗日胜利后，我先到上海，后在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四六年冬，周恩来同志要我经香港去新加坡，通过陈嘉庚先生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并为《华商报》复刊筹措经费。在香港我和文钊有过两次长谈。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我到达新加坡，那一天正是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日子，因此我给自己便增加了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内战真相的任务，并为《华商报》筹到了三万余元的叻币。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冬，我回到了香港，接到中央指示，要我留在香港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作准备接管上海和恢复出版《华商报》的工作。这样，在香港，我和文钊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华商报》复刊后，他仍担任董事长，他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我介绍他认识了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方方、林平，并请他多了解广东的政治经

济情况，为广东解放做准备。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离开香港到北京，准备接管上海，文钊则留在香港。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北京工作，广东解放后，他回到了广州，五十年代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而广东又有地方主义的内耗，对文钊来说，他过去没有政治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以后，大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五六年我送一个出国艺术团到香港，在广州又有一次和他短暂的晤谈机会，我知道他处境的困难，但他仍是非常乐观，毫不介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我则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就成了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对象，因此文钊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我是在一九七五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竟被迫害致死，教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这部《我的父亲邓文钊》去诬存真，展示传主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忠诚为党的一生。更愿人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坚持下去，使十年浩劫那样的灾难永不复现，使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事情永远绝迹。

一九九四年

原载《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

第三辑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①

皖南事变之后，我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四座位的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后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战时的空气也没有。在尖沙嘴买了份当天的晚报，尽管中日之间，英、法、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这里的报纸版面上还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

在国际新闻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廖承志同志。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现在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他一提，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还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而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通过他们各自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大肆制造“汪蒋合流”、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就成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廖承志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重庆、桂林等地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

香港是我旧游之地，九九寒天，这里还是繁花似锦。许多老朋友（金仲华、胡仲持、乔冠华、张明养等）对我说，你紧张了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可是我这个人好像命中注定了没有清闲的福气。我到香港后不久，范长江同志跟着来了，他告诉我，韬奋先生已经到了桂林，正由李任潮先生给他安排来港的机票，因为他是“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所以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这样一来，办报的筹备工作就得提前开始。据我记忆，韬奋是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平安到达香港的。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在香港办报或出期刊，都得先向香港英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香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同时还要先付港币两千元的“按金（保证金）”。对此，廖承志说，申请办报的“法人”已经商定了，这个人是他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帮办邓文田，具体事情则由邓的弟弟邓文钊负责，可以说注册问题已经解决，而《大众生活》周刊的复刊，则遇到了先得找一位出面申请注册的“法人”的问题。

^① 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5节。

第二天，廖承志同志约了邹韬奋等七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参加的人是：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我。开会的地点是邓文钊安排的，在哪一条街，我已经记忆不起了。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这张报纸的名称。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既是一个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至于办报方针，则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次，到三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党中央的一个指示，即《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于是对办报方针又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因为皖南事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所以我们也相应地考虑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在香港办报，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讲，后来还把自己办的印刷厂定名为“有利印务公司”，但也常常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忘记了这个“节”字。最近我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旧报，我自己写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节”这个分寸。

大概在三月底，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由林林、张尔华同志带队，平安地到达香港。我们又开了一系列的会，总结经验，妥善地安排了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或另谋工作，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参加侨报工作。从三月到五月，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桂林相继撤退到香港，知名人士有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等，同时于伶等人也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大批文化人的撤离蒋管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正式出版。当时，组成了一个社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编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的主要是时局问题。据我记忆，对版面之类的问题议论得很少，经理部由邓文钊负责，黎兆芳任经理，张惠通任营业主任。经济方面的事我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管。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这样，和办《救亡日报》比较起来，我肩上的担子就轻得多了。在《华商报》，韬奋也写过不少文章，开社委会的时候，他也积极参加，但是他的工作重点还在《大众生活》。为了要找一位“港绅”或者所谓“太平绅士”来作这份周刊的“督印人”，他花了不少气力。可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一位“港绅”，居然于无意中得之。关于这件事，茅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的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件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

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位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问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

这位曹先生叫曹克安，登记的周刊仍叫《大众生活》。应韬奋之约，我参加了编委会，除韬奋任主编外，编委有千家驹、茅盾、金仲华、乔木（乔冠华）、胡绳和我共七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一是《华商报》初创，而韬奋和《大众生活》在香港和东南亚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一九三五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日报周刊》；其次是《华商报》除了在政治上廖承志等同志经常有原则性指示外，说得好一点是集体领导，事实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而《大众生活》则有韬奋这样一位“主编”，而这位主编又的确抓得很紧。这个刊物雷打不动地每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大众生活》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在香港复刊的，比《华商报》晚了四十天。由于韬奋抓得紧，每次编委会上都要“派”任务，分派给我写的主要是“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我用的是夏衍和另一个笔名任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我在《大众生活》写的文章可能不比在《华商报》上写的少。这一年秋，当《大众生活》登完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之后，因为编委中除茅盾外只有我一个算是搞文艺的，于是韬奋就硬要我写一篇连载小说；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韬奋要我做的事，是难以推拒的，“打鸭子上架”，于是我写了一生中唯的中篇小说《春寒》。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小说没有写完，香港就沦陷了，所以《春寒》的后半是我回到内地后才续完的。

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也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除了《华商报》和《大众生活》之外，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都相继出版。由于叶浅予、丁聪、特伟、胡考都到了香港，所以辛辣的漫画不仅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而且还打进了《星岛日报》之类的中间偏右的报纸。

《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先后出版，正值盟军在巴尔干战败，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前夕。同时，在远东战场，日本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力图制造汪蒋合作，全力谋求结束“中国事变”。因此一报一刊的编委会，势所必然地成了讨论国内国际问题的场所。当时在香港有一张“汪记”日报，不断地向重庆伸出诱降的触角，为此在五月底，韬奋和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在我记忆中，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快的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用在这时候是最适当了。六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九月底，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不会蹈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占据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在那个时期，我不仅给《华商报》、《大众生活》写文章，也还在《笔谈》、《文艺阵地》上撰稿。

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苏德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之后，日美关系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十月底，东条英机在“翼赞会”发表演讲，说“日美谈判假如不能得到妥协，那么日本就要实践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日本要求美国妥协的条件，又有一条是迫使美国同意日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内容实质是蒋汪合流，成立中日联合反共政府）。这样，罗斯福会不会妥协？日军会不会南下？也成了《华商报》编委会上和我们日常谈话的中心。当时我和乔冠华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雄鸡饭店”楼上，为了日美谈判问题，杨刚、胡绳、于伶等同志常常到我们住处来议论。我记得很清楚，十二月一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评论，其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对这一意见，我们之间有过争论，只是由于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坚决，日本海陆军之间也还有矛盾，所以我们也认为日本还不敢冒失地发动战争。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二月六日的《大众生活》新三十号上。可是就在发表后的第三天，八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War（战争）”！原来日本不仅偷袭了珍珠港，而且战火已经波及到了香港。

我和乔冠华匆忙地赶到香港，当天上午，廖承志就召集了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能不能守住，和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了。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但是要在这个小岛上长期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东江纵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工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日本飞机已经在九龙投弹，香港可以听到枪炮声，看来港英当局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没有认真的准备，所以当天就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要作好停刊的准备。这样，《华商报》于十二月十二日停刊，《大众生活》则在十二月六日的新三十号之后就不再出版，连韬奋同志写的“暂别读者”也未能发表。十二月九日，《华商报》本来已经写好了一篇纪念“一二·九”的社论，临时压了下来，改登了《一致打倒日寇》，

十二日停刊那一天的社论是《团结动员抗拒敌寇》，加了一个副标题是“在香港纪念双十二”。

我从这天早晨离开九龙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不久，渡轮就停止了。又是一次“倾家荡产”，我在香港置备起来的衣物、书籍，连替换的衣服，也完全丢了。

在炮火声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约是十二月十二或十三日，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在延安访问过毛主席。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向廖承志同志提出，说香港当局想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这样，下一天，廖承志、乔冠华和我，和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我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保卫港九，但是英方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当时提的不过是轻武器）；这位辅政司似乎很诚恳地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要求，可是从此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事情是很清楚的，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住的，让日本占了，英美联军打败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部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十八日（？）下午，在日机猛烈轰炸之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在哥罗斯它大酒店楼下大厅，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东江纵队的先遣队已经到达九龙，因此这一天就把撤退方案和途径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需的经费。人数不少，其中也有一些人和我们关系不深，所以我还记得廖承志以严肃的态度讲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可能会碰到预料之外的险恶环境，那时，如何处理，就只能请你们自己抉择了。”幸亏布置得及时，考虑得周到，同时也亏得东江纵队的一个抢救文化人的突击队及时赶到，和工委取得了联系，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好是“圣诞节”这一天，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军投降之后不久，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诗人林庚白中流弹牺牲外），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亚子、韬奋、茅盾、胡绳、于伶……都是先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经韶关分批回到桂林和重庆；韬奋和范长江则先后经江西、浙江、上海，转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郁风、谢和赓、王莹……等，则是坐小艇经澳门、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对这一段往事，我在一九四二年写过一篇《走险记》，就不再赘述了。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新华日报》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复刊。我们已派徐迈进到上海去进行筹备，但估计国民党还会设置障碍，所以想起了《救亡日报》，昨天我已和郭老谈定，由他通知潘公展，《救亡日报》是在抗战开始时就在上海出版的，按他们的规定，可以在上海复刊。所以决定你尽快去上海，会同徐迈进赶快复刊《救亡日报》，因为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我方提的条件中，还有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条，所以我也觉得复刊的困难不大。恩来同志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我们的宣传阵地，我们会很快通知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党组织，全力支持你们；当然，这张报纸，仍旧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即使谈判有进展，也还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收录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一文，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一份电报：

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因此，那一天恩来同志要我赶快去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就是发出这一指示之前决定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问：现在交通阻塞，坐船或长途车都会耽搁时间。恩来同志看出了我跃跃欲试的神情，笑着说，这些问题你可以不管，给你安排坐飞机去，只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要组织上帮你解决？我很快回答，没有问题，孩子大了（当时沈宁十四岁，沈旦华八岁），他们可以等《新华日报》复员时同走。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好，那你赶快去作准备，接到通知随时就走，报馆的事，我今晚就和梓年他们商量，你可以不去上班了。我说：“那不行，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交代，这几天还得去上

^① 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7节。

班。” 恩来同志点点头：“最好能在两三天内准备好。”

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我可以先回上海也很高兴。说到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除了把我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了一下之外，只打算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的是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和我在桂林、重庆写的几个剧本，——对了，还有半条“骆驼牌”香烟，那是赫尔利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礼物”。

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由于恩来同志说了报馆的事由他和梓年商定，所以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没有过问，我只把要去上海的事告诉了王炳南、胡绳、乔冠华、熊复、陈家康，他们都对我的这个“好差使”表示羡慕，同时也告诫我上海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要我特别小心。

我一直等着，可是，五天，一个礼拜，一直没有消息。我又去找了恩来同志，他似乎也有点生气了，他说申请信早已交出去了，一直没有答复，我今天晚上再向张文伯交涉，再不回答，我们就在谈判时提正式抗议。这一交涉果然发生了效果，两天之后的傍晚，恩来同志要我去曾家岩，把一张美军军用机的搭乘许可证交给了我，起飞的时间就在下一天上午八时。这时，恩来同志再一次向我交代了：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办报的宗旨依旧是团结、民主、进步，但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他把到上海后联系的地点和口号告诉了我，然后说：你是“老上海”，但离开久了，凡事要听取和尊重“二刘一张”（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的意见。我已经给上海发了电报，你这次去是单枪匹马，但张登（沙文汉）、梅雨（梅益）都会帮助你的，还有先到了上海的徐迈进，但要注意，你和徐工作上要合作，但两份报的性质一定要分开，《新华日报》是党报，

《救亡日报》是民办报，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天快黑了，我打算在五十号吃晚饭，多听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同时也想和冠华、龚澎、家康等人讲几句告别的话，但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明天恰好是旧历中秋，你得回去和太太、儿女吃顿团圆饭再走。

九月二十日一早，《新华日报》派了一位同志（很遗憾，连这位总务处的同志的名字都记不起了）用一辆吉普车送我到了飞机场。这是一架双引擎螺旋桨军用机，除了美军的机上人员之外，本还可以乘四五十个人，可是乘客只有十来个国民党的公务人员，看样子，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飞机准八时起飞。这架飞机大概是运货用的，没有座位，大家就席地而坐。有雾，下面连嘉陵江也看不到，我就靠着机壁睡着了，十一点钟到了武汉，停机加油的时候我没有下机。美军的机组人员也在机舱里铺了一块地毯，像吃野餐似的在吃中饭，我啃着一块硬面包，一个好心的美军还送了我一瓶可口可乐。一小时后继续起飞，这时才看到了沿江一带被炸了的房屋，和池塘一般大的弹坑。五时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之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皇军”那种威势了。我下机后跟着那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走出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涂了防空色的大卡车，大家一起上了车，一直开到市内的一个美军机关门口，什么手续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想找一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

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毕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老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

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的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丏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丏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闯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

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重庆，我就把十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摊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看到了美军打死了一个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过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

（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

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十二天，到十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是不是陈训恂，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凶狠狠地说：“这张报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

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十月七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十二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老被特务打伤。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攻东北解放区。所以，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宣传阵地，长江局九月十四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阿英、钱俊瑞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柯灵主编，马叙伦、郑振铎、唐弢经常撰稿的《周报》，许广平等也在这刊物上写文章，我拜访马老的时候，他也要我写稿。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许多日报都在上海复刊了，在“孤岛”上耽久了的人又或多或少地对那位“六十衰翁”还有一点幻想，不在大报上打开缺口是不行的。我对梅益建议并立刻得到上海党组织的同意，我们也可以运用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和国民党当时还不敢公开要打内战和反苏反共这一弱点，团结一批爱国的、热望和平反对内战的上层知名人士和学者，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写文章，通过各种渠道打进《申报》、《时事新报》，乃至《中央日报》里去，逐步地形成一种“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我们分头走访了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宦乡、傅雷、李健吾……请他们撰写有关当前时局的专论，然后通过马骥良（唐纳）、柯灵等的关系，把这些文章在国民党办的和民办的大报上发表。由于当时正处在一个“谈谈打打”、或“明谈暗打”的特定时期，美国也还口口声声以“和事佬”自居，所以我们组织的那些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的文章，连《中央日报》也登了不止一篇。自己没有宣传阵地，而以组织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撰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设的文章，在上海各大报上以“专论”或“本报特稿”的方式陆续发表，造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舆论，我们这种作法曾受到过王若飞同志转来的长江局的表扬。据我回忆，直到一九四六年初，由于战争末期进入东北的苏军拆卸和运走了日伪所属的所有工厂设备和机器，国民党在全国规模煽起了一场反苏运动的时候，《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才不再登载我们组织的民主人士的稿件。

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双

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动大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内战在各地蔓延，为了镇压民众反内战运动，十二月初在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另一方面，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蒋介石军队并把他们运往北方，所以还派遣马歇尔到中国来进行“调解”。这一年的“圣诞节”后的一天，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希望中国各主要政党早日召开会议，解决内争。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了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这一事件和马歇尔的伪善性的“调解”合在一起，使过去一直同情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罗斯福当权时期，由于史迪威的反对蒋介石，我自己也曾由于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在《新华日报》整风时受到过董老的批评；那么现在呢？杜鲁门政府的亲蒋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呢？我和梅益商量过，都拿不定主意。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下当时在上海当苏联商务处负责人的安特列耶夫（他过去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当过武官），问他苏联是否真像英美通讯社所说的那样‘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地’搬走了所有的工厂设备？他一反过去的友好态度，居然摆出了一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外交词令”。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我请柯灵转给了《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一阵之后，才说这篇文章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马老迟疑了一阵，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就说，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该文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如前述的“两种”）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他们也和我一样，抗战时期忙惯了，闲下来是很不习惯的。吴祖光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的文艺杂志，所谓“别出心裁”，也就是尽可能地不板起面孔讲

大道理，不搞老一套，加上他们都不是专写小说或评论的，而是剧作家和画家，所以他们提的要求是“图文并茂”。我同意他们的想法，表示愿意支持，这就是同年四月出版的《清明》。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弄到了一间很漂亮的编辑室，这大概是张善琨为着要洗刷自己的汉奸嫌疑，讨好“重庆来的文化人”而无偿借给他们使用的，地点是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二楼，不仅闹中取静，陈设富丽，而且这地方大家知道是张善琨的“写字楼”，所以这一带的小流氓、小特务都不敢去干扰，于是，《清明》编辑室就成了我们这些人的落脚点。当时办杂志，并不像现在那样要有一个庞大的班子，也不需要经常“办公”，所以后来（在马思南路周公馆建立以前）这地方就成了一部分进步文化界人士碰头谈话的地方。我记得，刘长胜同志还在这个地方开过一次党的小会。在《清明》杂志，记得我只写过两篇文章，即《送鹿地荣归》和《科学与政治》。

三月下旬，或者四月初，我在朱葆三路二十五号和徐迈进聊天，有一位西装笔挺，眉目清秀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打算出一份小刊物，最好是三日刊或半周刊，要我帮忙，主要是出主意和写点文章，并说印刷发行都没有问题，同时，还说周建人、金仲华等都答应给这个刊物撰稿。这件事突如其来，梅益事先也没有和我提过，加上这位青年人衣冠楚楚，讲到办杂志也似乎并不外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愿意拿出一点钱来办份杂志玩玩的进步“小开”；直到我表示愿意支持，并谈了一些我对目前这种情况下办刊物的看法和做法之后，他才告诉我，他过去在新四军工作，这次来找我商量办刊物，是张执一和梅益的意见，这样，我才知道这位自称宋明志的漂亮的青年人就是姚溱。于是，谈的问题就具体化了，我们决定办一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派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起的作用。他完全同意了意见，《消息》这个半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消息》创刊于四月七日，这日子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就在发刊的第二天，就接到了王若飞、博古、叶挺等同志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牺牲的不幸消息。

在文网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办一张小报，一方面要争取合法，另一方面还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消息》有发行人（谢易）和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有发行所（广东路荣吉里十一号），但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宋明志就是姚溱，丁北成就是方行，而荣吉里十一号的发行所，实际上就是谢易开的一家文具店，没有编辑室，也没有总编辑，所以稿件除姚溱与作者个别联系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在“大三元”聚餐时决定的。经常写文章的有金仲华、胡绳、梅益、姚溱、方行和我，叶圣陶也给这张小刊物写过文章，此外，我们还请周予同、蔡尚思、韩述之、吴祖光等写过文章，我记得，还发表过一篇杨刚从美国寄来的通讯。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这是一种虚声恫吓，但这之后，李璜、左舜生之流也不敢再公开叫嚣反共了。

这张小刊物也和《救亡日报》一样，撰稿不付稿费，只是由于销路很好，所以一周可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姚溱和方行是《消息》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但他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张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

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上海文化界表示十分悲痛，《消息》发表了遇难情况和挽联。夏丏尊先生去世，《消息》也辟了一个悼念专栏。

《消息》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创刊，至五月二十七日被查封，一共出了十四期，历时一个半月，寿命比《建国日报》长得多，除了这是一株“小草”，不太引人注意之外，可能是我们刊登了黄炎培、朱学范的题词也有一点关系。

《消息》被禁之后，像农民失去了土地，于是我只能换了一个黎纬北的笔名，在姜椿芳、林淡秋等办的《时代》上写文章，从一九四六年四五月到同年九月，我大概写过约二十篇杂文和评论，从七月起，几乎每周都写一篇。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是很不平静的时期，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屠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上海文化界人士响应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抗议，一再掀起了反对法西斯特务残杀民主人士的抗议运动。在文化界，由于重庆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也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重新建立了戏剧、电影的阵地，话剧界演出了《捉鬼传》、《升官图》，电影方面则由蔡叔厚、任宗德、夏云瑚三人合股，创办了“昆仑电影公司”。我当时已经得到恩来同志的同意，于七月中旬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所以昆仑公司的事主要由阳翰笙同志负责。

十月初，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并悍然下令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中共驻各地代表团准备撤退。这时，恩来同志又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和散处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们失去了联系，所以要我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慰问、致意，并把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向侨领和文化界传达。这样，我就在十月十日从南京回到上海。

在我准备去新加坡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记下来作为这一段回忆的结尾。

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和乔冠华、龚澎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见恩来同志，因为他们也决定在代表团撤退后去香港工作。恩来同志是九月十二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国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团撤退后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到高长兴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一九八二年我到上海去参观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思南路周公馆，在保管着的有关情报档案中，偶然看到了下记的一段特务向市公安局的报告：

查于今日（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时零八分，周恩来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

人（并非邓颖超）乘自备汽车第一七三六〇号，向北开去，迨开过复兴中路时，中统局人员四人（其中一人姓张，不知其名）亦乘用昨日之汽车（惟将旧车照第二六六五号另换为一二一九三号）跟踪前往，惟于二时左右行经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又被周恩来发觉，即下车质问并欲令中统局人员同至吴市长处判断，惟中统局人员坚决否认认为党部人员，并称乃系普通百姓，周氏无法，乃即登车而去。

下面是“谨呈副局长俞、局长宣、分局长赵佩瑾。”具报人是：“第二股股长赵其秋，第二股股员洪大勋”。这件事很有一点喜剧性，它说明了当时反动派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监视之严，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在敌人心目中的威严，和这批特务的懦弱与无耻。

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合住；然后，于十月三十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说也很巧，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撤出了延安。因此，当天晚上，《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同志就要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

香港《华商报》、《群众》^①

一九四一年，在廖承志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在香港出版过《华商报》，那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和复刊《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于十月十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传播据点。后期《华商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开始筹备，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公司的黄定慧，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年七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十月间和潘汉年一起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领导。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张彦等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伏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后，报刊上就没有开“天窗”的事了）。但是，《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香港这个地方，它的销数一直是徘徊在一万份左右，经济上有不少困难。当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动身去新加坡的前夕，章汉夫、饶彰风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南洋展开一个“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我在三月二十日（我军撤出延安的下一天）抵星，到同年八月下旬被“礼送出境”这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集了三万多元（叻币）经费。由于抗战时期国内有不少社团到南洋向侨领们募捐，有少数人没有把捐款用途向陈嘉庚先生报告，侨领们很有意见，所以我离开香港时和方方、章汉夫、

^① 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8节。

连贯同志商定，这次筹款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并且把筹得的经费数目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筹款不向侨领们伸手，靠的是集腋成裘，因此，这笔在半年内筹集的三万几千块钱，都是一元、五毛乃至三分、五分的小数目累积起来的。有时我和陆浮到《南侨日报》经理部去接受捐款，当我收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之类的函件的时候，真的会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年冬，我收到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给我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在华南和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搞新闻史也好，写华侨史也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节衣缩食地为革命事业献出几个“斗零”的义举，是永远不该忘记的。直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还能回忆得起，当时他们交出捐款信件，又急于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一点国内解放战争情况的面影。这些侨胞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

我参加后期《华商报》，是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这一段时间。当时，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只是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近年来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段时期我分管文艺工作，并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这样说，按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时在香港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麟和冯乃超。《华商报》副刊《热风》主编是华嘉，到一九四七年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华嘉一定要我替《热风》出主意，写文章，这样我就挤出一部分时间，到编辑部参加一点工作。讲到出主意，记得起来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曾怂恿郭沫若同志写一篇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在《热风》上连载，发表后哄动一时，这就是后来整理成书的《洪波曲》；其次是当司马文森的连载小说《阻街的人》登完之后，为连载《虾球传》续篇《白云珠海》，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预告”，并刊登了谷柳给我的一封信，因此很多人认为我是《热风》的主编。谷柳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十年内乱中折磨致死，为了怀念他，我把他给我的短简抄录如下：

夏先生：送上《白云珠海》稿，请指正。今天的珠江在啜泣，从理念上去解释珠江的苦难是比较不太费力的，但我现在准备做的却是记录她的生活和抒写她的情态，这件事就不容易了。我一定尽力做去。谢谢《热风》给我刊登的机会。

由于我几乎每晚都到编辑部去，经常看到读者来信，加上那个时候正是南京小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可笑可怒可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于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病”复发，在《热风》和后来改名为《茶亭》上写了不少短文和补白。我现在只看到了一部分《热风》和《茶亭》的复印本。其中能够认明是我用笔名写的三五百字的短文和“答读者”之类的东西就很少。淮海战役前后，不仅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召开各党派的代表大会，然后陆续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不少爱国反蒋的青年人也被逼到了香港。当时的《华商报》实在已经是够“左”的了，而《热风》和《茶亭》，又必须是一个通俗的、力求为香港当地居民接受的副刊。可是编辑部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有人批评我们“态度不够鲜明”，“多有曲笔”；也有人说我们“文风太俗”，“不像一个革命文化人办的副刊”。对此，我向韬奋学习，也写了一些“读者与编者”之类的补白。举一两个例子：当时胡希明（三流）同志是这个副刊的台柱，他

用“打油诗”、“新乐府”、“心照不宣”的形式写了不少绝妙的文章。可是也有人以为不然，于是我写了一个简复：

××先生：你对本刊的爱护，十分感激。本报是人民的报纸，自然各版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凡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愤慨，人民的控诉……一定发表，甚至仅仅做到消极的暴露，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欢迎。说到表现形式，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唱本、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及不属于上述的“怪乐府”、“歪诗”，也都可以。不过我们有一点希望，就是文字尽量通俗，不拘一格，方言乃至文言，均无不可。

又如不止一次有读者批评我们的副刊上的文章太俗，乃至“俗不可耐”，我也作了“简答”：

××先生：雅与俗是相对的说法，本来这中间很难有一定的界限。譬如（一篇文章）甲看了，觉得太俗，“俗不可耐”，而乙看了觉得也还有趣。编者取稿尽可能以大多数读者的需要和趣味为标准，尽可能不让《茶亭》里有毒害的东西，至于爱吃不爱吃，那只好让广大读者去“自由选择”了。……从前《热风》编者说过：编辑像一个大杂院里的厨房，要开出来的每样菜全院子的人都爱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一点，只有请多原谅，包涵一下了。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回忆得起，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发行“金圆券”的命令和“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汇及外国货币”的条例，还派蒋经国到上海组织以“管制物价，打倒贪污”为口号的“戡乱建国大队”，一方面竭泽而渔，搜刮了总值达两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外汇，同时还演出了一场“查封扬子公司”（宋子文系的财团）和“捉放杜维屏”（杜月笙的儿子）的滑稽戏，引起了蒋管区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因此，我们除了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了大量社论、述评、专论之外，还几乎每天在《茶亭》上写杂文。当时胡希明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不仅传遍港九，而且很快地传到广州、上海。这首诗的题目是《闻道》，诗云：

闻到金圆券，无端要救穷。
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
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
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

“斗零”、“公仔”、“湿柴”、“瓜直”、“摆乌龙”等等，都是广东人口头常用语，我们这些外江人在香港办报，为了“入境随俗”，争取更多的读者，是化了不少功夫才学到的。

从这一年八月下旬起，《热风》改名为《茶亭》，我用“亭长”的笔名写了一篇开场白《请大家来歇脚》，因此，在圈内人也认为这以后的《华商报》的副刊由我主编了，其实我依旧是一个随传随到或不传自到的撰稿者，编辑工作先后是由陆浮、吕剑、华嘉等负责。当时写“今日谈”的人不少，廖沫沙、杜埃、秦牧、楼栖、胡希明都经常写稿，用的笔名也随时更换。有人问我：“你用过多少笔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好在我们这些人没有

“敝帚自珍”的习性，那些“即兴杂文”，也都是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者会客室里写的，有的甚至在从九龙到香港的渡轮上写的，一个笔名可以几个人合用，更谈不上版权和稿费的问题。也幸亏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组也不能从这些副刊中找到什么“罪行”和“把柄”。顺便提一下，因为在《茶亭》副刊上我用过“亭长”的笔名。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是很有名的，因此，我又用“汪老吉”这个笔名，在《群众》上写了不少政论，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就开辟了一个《茶亭杂话》的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我从《群众》三十一期起，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两三千字，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共大约写了十多万字。我忙于各民主党派的联络工作，这时候《华商报》的《茶亭》主要撰稿人是胡希明同志，他当时还主持办一张《周末报》，但是用“三流”笔名的文章，《茶亭》上几乎每天都有。（我在《群众》上用任晦之、汪老吉笔名写的随笔，后经顾家熙同志整理成书，题为《蜗楼随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就陆续撤退到香港，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华商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时候东北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就租雇外国轮船，来往于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从解放区把大豆、农副产品运到香港，出售后购买了医药器材、轻工用品（如纸张等）运回东北。同时，民主党派领袖们就搭乘这些持外国旗的货轮赴解放区。据我回忆，从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以及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都是经过这一途径，先到大连、烟台，然后转到解放区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首先看到解放区的报纸。于是我们就把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上发表。这时，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不单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新北平和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华商报》的销路从七八千份激增到一两万份以上。这种“本报北平专稿”或“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大部分是我自作主张地编写的。这时章汉夫已调到天津去担任外事工作，方方、林平都已经回到东江，我接替了章汉夫香港工委书记的工作，编委会同人也觉得这样做可以扩大影响。直到三月间我接到范长江从北平来信，说这种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我才停止了编写这种“特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之后，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十二月，香港警察还搜查了许涤新的住宅）。我们乘胜前进，在四月二十六日中午，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在香港大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在港中外各界名流、工商界巨子以及文化、新闻、艺术界百多人参加了酒会，情绪非常热烈。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香港文化、新闻、文艺界人士六百多人又在金陵酒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团聚餐，还表演了庆祝胜利的文艺节目。

四月下旬，中央调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人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离香港，五月六日到塘沽，我在香港的工作改由乔冠华接替。同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翌日，《华商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历

史使命，与香港同胞告别。这样，后期《华商报》一共发行了三年九个月。

